

安·拉布里奥拉著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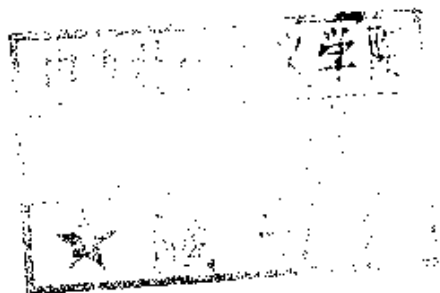
杨启清等译



28710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意〕安·拉布里奥拉著
杨启潏 孙 魁 朱中龙译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Guanyu Lishiweiwuzhuyi

〔意〕安·拉布里奥拉著

杨启滨 孙 魁 朱中龙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43,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300

书号 2001·256 定价 0.76元

出版说明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杰出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拉布里奥拉1843年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城。父亲是中学校长，学识渊博，同爱国主义者和民主派有密切联系。拉布里奥拉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幼年时期起就喜好读书，热爱祖国和自由。他十八岁时完成了宗教学校的学业，到那不勒斯上大学。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曾先后在政府机关任职和中学教书。1866年他同“加里波第”学校校长罗莎丽娅·斯普连格尔结婚。罗莎丽娅祖籍是德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不仅为拉布里奥拉分担生活上的忧愁，也协助他克服政治上和教学中的各种困难。1871年拉布里奥拉到那不勒斯翁别尔托亲王哲学院讲授哲学。1873年他离开那不勒斯到罗马，在罗马大学担任了教育学和伦理学教授，以后又讲授历史学等，直到逝世。他曾兼任社会教育部教育博物馆馆长，去德国考察过教育制度。八十年代初拉布里奥拉接近激进派小组，后来成为它的领导人之一。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他认真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90年开始同恩格斯通信。1890—1892年他为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做了很多工作。1892年社会党成立后，他更加深入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895年开始撰写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章。1901年因患喉头癌停止讲课。1904年在罗马逝世。

* * *

拉布里奥拉生活在意大利人民争取并最后达到民族独立和国

家统一的时期。意大利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赶走了奥地利、西班牙等外族侵略者，推翻了本国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也随着成长起来。但由于意大利长期处于外国掠夺者和教皇、封建主的统治下，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十分落后，无政府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意大利工人中影响很大。意大利工人阶级虽然具有争取民族解放和进行民主改革的革命传统，但是无产阶级的觉悟却不高。为了克服各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它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斗争。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发展过程正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反映。拉布里奥拉从黑格尔左派、激进民主派，最后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862年拉布里奥拉到那不勒斯，当时那里的学术界十分活跃，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那不勒斯左派黑格尔小组。这个小组的进步哲学家非常重视欧洲哲学思想的成就和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他们摒弃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主张恢复它的辩证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拉布里奥拉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不能作为新思想的基础”，主张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体系而发展它的辩证精神，并运用它去认识意大利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1873年底拉布里奥拉迁居罗马，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末，这个时期是他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阶段。这时意大利刚刚争得独立，正从专制制度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拉布里奥拉十分关注祖国的发展前途，参加了实际政治活动，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分子。他主张在意大利建立民主制国家，实行最广泛的代议制。他认为，只有代议制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否则根本谈不上国家的富强，各种制度的民主化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实际上，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未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它同过

去的反动统治者一样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压榨劳动人民。而激进民主派却逐渐放弃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力图使工人运动带上温和主义的色彩。拉布里奥拉看清了他们的妥协行径，1890年在给激进派领导人索齐的公开信中宣布同他们决裂。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拉布里奥拉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根本不能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更新整个社会机体。他于九十年代初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他决心根据意大利的特点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并推动意大利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他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文中运用渊博的历史知识，畅述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他对伯恩施坦等人的修正主义、索列尔等人的工团主义以及洛里亚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拉布里奥拉不仅是一位严肃的理论家，也是意大利的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工人小组的活动。他在集会、课堂和工人组织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参加并组织领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他从事组织意大利社会党的活动。他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建立了联系，1893年他以那不勒斯社会主义小组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并同恩格斯见了面。只是在身患重病之后，拉布里奥拉才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

恩格斯和列宁对拉布里奥拉都作了很高的评价。拉布里奥拉曾把他的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寄给恩格斯，恩格斯读后称赞他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高度评价了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章，称它是“捍卫我们的主义的卓越的著作”。

* * *

本书收进了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篇重要文章。第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写于1895年4—5月。拉布里奥拉在这里指出了《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说明《宣言》的出版“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他阐明了《宣言》产生的原因、背景和过程，认为《宣言》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宣言》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过程；他指出《宣言》的“中枢”是它“完全贯穿着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科学地论证了“新的社会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使人们确信共产主义能“结束或解决当前的阶级斗争”；他还用《宣言》问世后的历史补充了《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当时在意大利存在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流派。

第二篇文章《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于1896年发表。它是专门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性著作。拉布里奥拉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揭示任何人类发展……的真正原则和动力”，使人类历史过程的说明“客观化和在一定意义上的自然化”。他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的生命所服从的规律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的起源”，指出要正确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认识人类生存的条件，解释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和弄清事实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他批判了因素论者把人类历史看作许多独立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分析了因素论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他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批驳了庸俗经济主义力图从生产过程中直接引出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主张。他进一步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指出它的功绩和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此外，他还阐述了国家和法的起源和阶级属性，对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作了科学的回答。

* * *

本书第一篇文章根据梅林的德译文译出，第二篇文章根据1960年苏联莫斯科的俄译文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还参照了其他德译文、英译文和俄译文；第一篇文章还请李其庆同志根据法文校对一遍。书中脚注为作者所加，卷末注是译者编写的。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拉布里奥拉的思想，我们还附了梅林为第一篇文章德文版所写的序言和普列汉诺夫对第二篇文章的评论。梅林的序言是根据德文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采自三联书店中文版《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译文据原文校订，有改动。

纪念《共产党宣言》

再过三年我们就可以庆祝我们的纪念日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日子（1848年2月），标志着我们第一次无可争辩地进入了历史。我们对无产阶级五十年来的发展所作的全部审慎的评价都与这个日子有关。这个日子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正在开始，正在兴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时代正从现时代中脱颖而出，并由于后者固有的内在结构而向前发展着。因此，这个新时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即使今后可能不断发生今天还无法预见的种种变迁。

我们当中所有那些把自己事业铭记在心或渴望完全理解自己事业的人，都要想想那些曾对《宣言》的产生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和动力，想想在从巴黎到维也纳、从巴勒摩到柏林爆发革命的前夕《宣言》产生时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现代社会形态中找到正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倾向，从而能够根据这一倾向的现实存在的理由来论证它的可以预见到的胜利的必然性。

* * *

《宣言》的中枢、它的实质和它所固有的特点实际上不就在这里吗？^①

如果有人想把第二章末尾提出和建议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① 我的这篇文章不是要修改《宣言》，不是要使它适用于现代条件；我在这里也不分析和阐明《宣言》。我写这篇文章，正如文章标题所说明的，只是为了纪念《宣言》。

应采取的那些措施，或者把第四章所写的对待当时其他革命党派的那些政治指导方针，当作《宣言》的实质部分，那就肯定大错特错了。虽然这些方针和建议在它们被制定和提出的当时和条件下是值得考虑的，虽然它们对准确评价德国共产党人在1848年至1850年这一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它们不再是我们以后任何事件中都必须予以赞成或反对的全部实践观点。自国际以来，不同国家中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并把无产阶级作为直接基础的那些政党，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随着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务必使它们的纲领和策略随时适应于复杂多变的条件。但是，在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得那么紧迫，以致它们并不感到需要、渴望、或仅仅试图去重新检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措施，并决定取舍。实际上历史经验只能由历史本身来创造，人们既不能通过预见，也不能靠决断或命令来创造。公社时期就出现过这种经验。公社过去是、时至今日仍然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时从自己行动中得到的唯一直接的经验，虽然这种经验是混乱的，因为公社的爆发很突然，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此外，这一经验既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形势强加的；它曾经被英勇地付诸实施，而且今天已成为有益于我们的教训。在社会主义运动刚开始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缺乏亲身的直接经验，象在意大利常见的那样，社会主义运动把《宣言》的权威当作指令，然而实际上这是毫无意义的。

* * *

我认为，也不应当到《宣言》以文献为题来谈论其他社会主义形式的地方去寻找《宣言》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整个第三章无疑是为了通过排斥和对比、通过简短而深刻有力的特写，来阐明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形式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前者在今天通常被称之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经常被轻率使用的术

语),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无产阶级,它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只有一种除外,^①都曾一再出现,曾不止一次地复活,它们今天又在现代无产阶级运动方兴未艾的国家里重新出现和复活。《宣言》在这些国家里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履行了,而且现在还在履行它的有生命力的批判和文字拮据的职责。然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已克服了这些形式的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或者在这些形式只作为个人意见在个别情况下还幸存下来的国家,如法国和英国(且不提其他国家),《宣言》从这个角度已经完成了它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已经采取政治行动并且有规律地向前发展,《宣言》似乎只是为了纪念才记录下人们不再需要思考的那些东西。

这正是《宣言》作者独具的远见才智。他们凭借自己的思考力和根据一些经验材料,预见到了种种事件,他们只要确定清除和批判那些已被他们超越的东西。批判的共产主义¹——这是它的真实名称,没有其他名称更适合这一学说——并不是要同封建主一道留恋旧世界,而是通过同旧世界的对立来批判现代社会,因为它只着眼于未来。它不再同小资产者联合一起,想去拯救无法拯救的东西,例如被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必然和天然的机关)的令人眩晕的行动所打碎和破坏的那种小业主的小私有制或他们的宁静生活,因为现代国家由于自己的不断革命必然在自己内部引起其他新的更深刻的革命。同样,它也不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物质利益的真实对立说成是超自然的奇想、病态的忧伤或宗教的默

^① 我是指《宣言》里被讽刺地称为“真正的”或“德国的社会主义”。² 这一段论述对所有那些很不熟悉当时德国哲学、特别是它的某种已经大大退化了的流派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而在西班牙文的译文中删去这一段论述是完全合理的。

祷，正相反，它探讨了这种对立的整个平淡的现实性。它并不按照每一部分都草拟得十分和谐的计划来建立未来的社会。它对哲学神话中的两位女神——正义和平等——没有一句赞扬或叹赏、崇拜或抱怨的言辞；当人们看到多少世纪以来历史使自己成了不适当的消遣，几乎总是同自己无可非议的严峻要求相矛盾时，这两位女神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得如此可怜。此外，尽管这些共产党人根据确凿的事实认为无产者的使命就是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他们仍然尊重这个创造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形态地地道道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并且只有它才能提供新的斗争舞台，而这些斗争一定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幸福果实。人们从未写过如此宏伟壮丽的悼词。这首赞扬资产阶级的颂歌包含了某种悲剧性的幽默；有人则认为这是酒醉后的狂热颂歌。

既然对当时流行的、而且从那时直到现在还一再出现的其他种种社会主义所下的否定定义在内容、形式和它们所抱的目的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那就不要求它们提供社会主义的真正历史，而且它们也没有提供这种历史。对于那些想写这部历史的人，它们既不提供方案，也不提供准绳。实际上，历史并不是建立在真实同虚假、正义同非正义的区别上，更不是建立在可能同现实这二者更抽象的对立上，好象一方面是物，另一方面是它的影子和它在思想中的反映。历史完全是一个整体，它是以社会的形成过程和改造过程为基础；也就是说，它是按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用实证主义者的话来说，历史是一种特殊的动力学，他们非常喜爱这一类用语，常常抱着他们所首创的新词儿不放。若干世纪以来出现而又消失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其根源、表现和影响是如此不同，应当通过产生它们的社会生活的种种特殊而纷繁的关系对它们加以研究和阐明。当人们深入地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就会发现：它们不是唯一的不断发展的整体；它们

的序列多次被社会复合体的交替，传统的消失和破坏所打断。只是从大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才出现某种程度的统一，1830年以后，这种统一表现得更加明显，从那时起，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最终掌握了政权，而从国际成立以来这种统一终于变得一清二楚，几乎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在这条道路上，《宣言》象一块具有双重碑文的伟大里程碑：一方面，从那以后它是传遍整个世界的新的学说的古版书³；另一方面，指出了被它摒弃而没有提供其历史的那些形式。^①

* * *

这一著作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完全贯串着新的历史观。它赋予这一著作以生气，并在这一著作中部分地得到了阐明和发挥。由于有了这一历史观，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思念，一种回忆，一种猜想，一种出路，它第一次恰当地表现为意识到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意识到它是结束或解决当前阶级斗争的办法。这些斗争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历史则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发展。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斗争统统归结为一种斗争，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同必然要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之间的斗争。《宣言》叙述了这一斗争的形成过程，确定了它的发展节奏，预言了它的最终结果。

科学共产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归结为这种历史观。从这时起，社会主义的理论敌人不再讨论生产资料民主社会化的抽象可能性

① 我在大学开讲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来源或社会主义通史或唯物主义史研究的课程已有八年了，这使我能够掌握所有这些文献，描绘出它们的立场观点，并系统地把它们整理出来。这件事本身就很困难，而在意大利就更加困难，因为意大利没有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而且党又很年轻，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范例。本文不重复我的讲义。这些讲义不是重复它所依据的书本，发表讲义并不是写书。

了，^① 因为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根据从所谓人类本性的普遍而共同的素质中得到的结论来作出判断。今后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活动进程中那种超越我们同情心和主观赞同的必然性。在最文明的国家，社会是否已经组织成这样：一旦它具备了现代经济结构，出现了必然在它内部产生、最终将把它打碎并使之解体的那些冲突，它就会由于决定着它自身未来的规律而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从这一理论出现以来全部争论的主题。因此，也就出现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其行动中务必遵循的策略，不管这些政党只是由无产者所组成，还是在它们的队伍中也有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以及自愿加入工人阶级大军的人。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乐于接受“科学的”这个别名，只要人们并不因此而想把我们同实证主义者、有时还同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垄断“科学”一词的令人讨厌的顾客混为一谈就好了。我们并不象辩护士或诡辩家那样，试图坚持一种抽象意义的原理，而且我们也不力求证明我们目的的合理性。我们所寻求的不外是从理论上表述和从实践上阐明在检验我们中间和四周的发展时向我们提供的资料，而这种发展完全包含在以我们为主体和客体、原因和目的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关系中。我们的目的之所以合理，并不是因为它以理性的推理为依据，而是因为它产生于对事物的客观研究。也就是说，它是从阐明事物的发展中产生的，而这种发展并不是或不可能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正相反，它会战胜我们的个人意志并使之服从于它。

《宣言》作者本人早先和后来发表的一些著作，虽然从科学的

① 使用“生产资料民主社会化”这个词比使用“公共财产”这个词要好一些，因为后者会有某种理论上的错误。这是由于，第一，它用一个法律术语代替了实在的经济事实；其次，它在某些人的思想里同垄断的增强、公用事业的日益国家化或者同经常再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切其他幻想相混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作用是增加压迫者阶级手中进行压迫的经济手段。

意义来说要重要得多，但没有一本能代替《宣言》，也没有一本能起《宣言》的那种特殊作用。《宣言》以极为朴素的笔触向我们真实地描述了这样的情况：现代无产阶级在当代的历史中是作为具体的主体，作为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所必然采取的革命行动必定把共产主义当作它的必然目标——存在、生存、成长和发展的。由于这部著作作为它的预言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而且用言简意赅而又生动形象的形式表述出来，因而它就成了读者可以加以丰富和发展的思想萌芽的总汇，甚至是这种思想萌芽的取之不尽的矿藏。《宣言》保持着那种刚刚诞生而且还未脱离其诞生土壤的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真实而又原始的力量。这一评语首先是针对这样一些人的，如果他们不是吹牛大王、江湖巫医或可爱的门外汉，就是不学无术的伪君子，他们硬把各种各样的先驱、卫士、盟友和大师加给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而毫不尊重人类常识和最普通的年代顺序。他们或者把我们的唯物史观还原为普遍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新的比喻）；他们或者在这个学说中寻找达尔文主义（它只有在一定的观点上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才是一种类似的理论）的分支；他们或者盛情地要我们同实证主义的哲学（从天才的圣西门的那个堕落而反动的门徒孔德到无政府主义市侩的精英斯宾塞）结合在一起或对它加以庇护；换句话说，他们想让我们把我们最明显的对手当作盟友。

* * *

这部著作的生命力，它的强大的力量，它能用如此短的篇幅概括如此丰富的思想，都要归功于它的来源。^①

^① 我拿到二十五页（应为二十三页。——译者注）八开本的原版（1848年2月伦敦版），这要感谢恩格斯的深情厚意。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我反对做书目索引、列出参考文献和引文的想法，因为那样做我就是在写一部学术著作或一本书，而不是写一篇短文了。但愿读者相信我的话，我在整篇短文中所写的每一个隐喻，暗示和思想都是有根据的。

这是两位德国人的著作。但不论从形式或内容来说，它都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述。这里看不到所有政治流亡者和所有为了能在异国呼吸比较自由的空气而自愿离乡背井的人们所熟知的种种咒骂、忧虑和怨恨。这里也没有直接反映他们祖国的情况；当时他们的祖国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只有个别地区才能与英法两国相比。相反，他们在《宣言》里写进了哲学思想，只有这种哲学思想才把他们的祖国提到了当代历史的高峰，并保持在这个高峰上；这种哲学思想正是通过他们而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使费尔巴哈所更新的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使它能掌握和理解历史运动的最内在的原因，而这种原因曾经由于隐蔽很深和难于观察，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研究过！他们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但他们成为这样的人，既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出于热情的驱使；在他们接受委托在《宣言》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⁴制定原则和纲领之前，他们已经对经济科学进行了崭新的批判，同时他们也已经认识到海峡两岸，即英法两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联系。共产主义者同盟曾在伦敦设有总部，大陆上还有许多支部；同盟有它自己的经历和发展过程。

恩格斯已经发表过一篇批判文章，他在那里放弃了片面和主观的改良，第一次客观地从经济学本身的概念和原理的内在矛盾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还因发表了一本论述英国工人状况的书而享有盛名。这本书是把工人阶级的运动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本身发生作用的结果的一种最初尝试。^①马克思这几年在德国、巴黎和布鲁塞尔以激进的政论家著称，他已经酝酿成熟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成分。他成功地进行了理论批判，批驳了蒲鲁东学说的前提和结论，并第一次准确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说明

^① 《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刊载于《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86—114页，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则于1845年在莱比锡问世。

剩余价值是购买和使用劳动力的结果，这也就是他后来在《资本论》中连贯地和详细地加以揭示和分析的那些思想的最初萌芽。他们两人同欧洲各个国家，特别是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革命者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宣言》并不是他们个人意见的申述，而是一个政党的学说，这个政党的精神、目的和活动已经组成了工人国际。

* * *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开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区分现代社会主义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界线。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正义者同盟⁵演变而来的。正义者同盟本身又是由于明确地意识到它的无产阶级目的而逐步由各种流亡者和被驱逐者组成的。它作为一个典型组织，在其初期曾采取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形式，它经历了密谋和平等社会主义⁶的各个阶段。它曾奉行格律恩的形而上学和魏特林的空想主义。它的总部设在伦敦，它曾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宪章运动⁷；宪章运动组织松散，因为它既不是早先成熟的经验的成果，也不是一种密谋的或宗派的活动。可见要组成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多么艰苦和困难。宪章运动只是在接近尾声而实际上已结束的时候，才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倾向（琼斯和哈尼是令人难忘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处都预感到革命，这既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出现，也是由于它的本能和研究方法所驱使。当革命实际爆发时，共产主义者同盟通过《宣言》的新学说掌握了认识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斗争的武器。实际上，由于盟员的不同成分和不同国籍，尤其是由于所有盟员的本能和倾向，同盟已成为国际性的组织，因而它已在政治生活的总运动中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它已成了今天能够称作现代（如果不把“现代”这个词理解为表面的年代顺序上的简单日期，而把它理解为通过社会内部变革而在社会中完成的一种发展的标志）社会主义运动的确凿无疑的先驱。

从1852年到1864年的长期间歇，是一个政治反动的时期，同时也是各种旧的社会主义派别消失、瓦解或被消灭的时期；这个长期间歇把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这个国际同从1864年至1873年一直致力于把欧美无产阶级的斗争统一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划分开了。从不朽的国际的解散到新国际的建立，无产阶级的行动又有几次间歇，这主要是在法国，德国则例外。今天这个新国际通过不同的手段进行活动，并以不同的形式发展着，而这种手段和形式是同我们的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并且是以更成熟的经验为依据的。然而，正象1847年12月讨论并接受新学说的人们中间的幸存者重新出现在伟大国际的公开舞台上，并从那以后再次出现于新国际一样，《宣言》也不断再版，并以所有文明国家的文字传播于世——这本来是《宣言》初版时就打算做的，但那时未能如愿。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先驱。他们曾先于所有其他人早就以迅速而坚定的步伐行进在一条我们同样应当走而实际上正在走的道路上。把下面这两种人称作先驱是不合适的：一种是曾在这条道路上走过但后来又离开了这条道路的人，另一种是（直截了当地说）创立过学说或开创了运动的人，而这些学说和运动无疑可用它们所由产生的时间和环境来说明，但是从那以后它们已被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超过了。这并不是说那些学说和尝试是偶然的、无益的和多余的现象！在事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绝没有非理性的东西，因为任何东西的产生都不是无理由的，因而任何东西都不是多余的。即使在今天，我们如果不回顾那些学说，不追溯它们是如何产生并消失的，我们自己也就不能对批判的共产主义有充分的理解。实际上，由于社会生存条件的变化，同时由于更准确地认识了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这些学说不仅过时了，而且本质上也超过了。

当这些学说过时的时候，即它们本质上被超过的时候，也正是

《宣言》诞生的时候。这部著作，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第一份出生证书，只对学说作了非常一般和非常通俗的阐述，它带有自己出生的历史环境即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痕迹。它的传播和普及的范围从那以后愈来愈广泛，而且后来扩展到整个文明世界。在所有那些由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各种表现的对抗日益明显而使共产主义倾向得到发展的国家里，最初的发展形式已整个地或部分地出现了好多次。逐步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历了先驱们所开辟的那条形成道路，不过，这种发展一年年在一个个国家实现得愈来愈快，因为对抗更加明显，它的必然性也十分紧迫了。同时还因为接受一个学说和一种指南要比最初创立它们来得容易。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五十年前的志同道合者也是真正国际性的，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例子向各国无产阶级指出了应当完成的事业的总过程。

* * *

但是，在今天也象过去一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从理论上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就在于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认识它的产生方式。它的产生过程，好象在一个有限的观察场所和以一个简洁的实例反映出来那样，恰好从《宣言》的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宣言》应当是一种战斗武器，因此它本身在表面上没有它的起源的痕迹；它并不进行论证，而只作实质性的阐述。论证完全包含在必然性的命令中。不过人们能够重复这种形成过程，而重复这一过程，也就等于真正理解《宣言》的学说了。

有一种研究，它抽象地把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分解开来，并把它们破碎为构成统一整体的许多因素；但还有另一种研究，而且这是唯一能够认识历史的研究，它分析并分解各种因素，则只是为了从中再找到它们为达到最终结果而共同发生作用的那种客观必然性。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现代社会主义是正常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产物。它的政治行动开始于国际，这种行动将来可能被推迟和延缓下来，但绝不会再被完全窒息。《宣言》则比这种政治行动更早。它的学说首先是照亮无产阶级运动的光芒（其实无产阶级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并不依赖于任何学说），它还不仅仅是这种光芒而已。批判的共产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产生的，那时无产阶级运动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果，而且它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认识到这种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并预感到要使用什么手段和能够在什么意义上来实行这种改变。光说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认识这一事实的内在原因和它的整个活动将往哪儿发展。关于工人阶级这一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负的使命是继资产阶级之后成为阶级对立必将消失的新社会制度的生产力的断言，使《宣言》成为总的历史长河中十分突出的一瞬间。它是一种揭示，但不是黑暗天启或千年王国意义上的揭示。它是对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所经历的道路所作的科学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揭示。

这样，《宣言》给我们提供了它的来源的内情，从而维护了它的学说，同时阐明了这一学说的特殊影响和惊人作用。我们在这里且撇开细节不谈，只提出这样一系列的因素：它们这样有机地、缜密地结合在一起，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整个发展的萌芽。

* * *

法国和英国在1830年以后出现了工人运动，它们提供了崭新的、生动而直接的材料。这种工人运动同其他革命运动有时相似，有时则有所不同；它从本能的暴动走向政党的实际目标（譬如走向宪章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出形形色色瞬息即逝的共产主义和半共产主义，当时都被称之为社会主义。

为了从这类运动中了解新的社会实际情况，而不是一时的骚

乱现象,就需要一种阐明实际情况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是民主传统的简单补充,也不是对业已被认识的、产生于竞争经济的弊病的主观纠正(这些问题当时有许多人在专心地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的作品:他们通过对立的发展使历史形成的思想摆脱了黑格尔辩证法曾最一般地阐述过的那种抽象形式,把它运用于具体地阐明阶级斗争;过去人们认为这一历史运动是从一种思维形式向另一种思维形式的过渡,而他们则第一次认为这是从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向另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的过渡,也就是从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过渡。

这种历史观赋予新的社会革命(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无产阶级的本能意识和它的激昂的自发运动中)的需要以理论形式,而且承认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从而改变了革命的观念。那种曾被密谋团体视为个人选择、任意虚构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人们能加以促进、维护并支持的简单发展过程。革命成了一种政治的对象,社会的复杂状况为这种政治现象提供了条件;因此,革命成了一种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通过旧的暴动策略还不曾想象到的随时变换的斗争手段和组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情况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是附属物,是辅助手段,是赘瘤,是人们应从现今社会中清除掉的祸害,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是现今社会的基础,重要的条件和必然的结果,而且它也是维护并支持社会本身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也就是彻底改革生产方式,才能解放它自己。

正义者同盟在巴尔贝斯和布朗基革命(1839年)以后摆脱了密谋的象征形式,并逐步采取了政治行动和政治鼓动的手段,从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样,同盟接受和掌握的新学说也最终抛弃了密谋者的计划,并把它看作是某种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密谋者曾认为这种发展是事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成果或他们的英雄主

义的反应。

* * *

于是，在事态进程中就开始了一条新的向上发展的路线，开始了思想同计划的另一种结合。

密谋者共产主义，即先前的布朗基主义，使我们经过邦纳罗蒂，还经过巴札尔和烧炭党人一直追溯到一位古代悲剧的真正主角——巴贝夫的密谋。巴贝夫同命运发生了冲突，因为他的目标没有同当时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他还不能把一个具有广泛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推上政治舞台。人们从巴贝夫和雅各宾时期的一些不太出名的人物追溯到直观的摩莱里，追溯到独特的和多变的马布利，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追溯到牧师梅叶的杂乱无章的《遗书》⁸，即人类常识对不幸农民遭到残酷压榨所表示的一种本能的、激烈的叛逆。

这些激烈反叛的密谋者社会主义的先驱全都是平等的信徒，大多数密谋者也都是这样。他们从一种特有的但不可避免的谬误出发，把这种平等的信条当作斗争武器，从相反的角度解释它并宣传它；这种信条作为天赋人权与经济理论同时发展起来，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工具逐渐占据了它现有的地位，把特权社会变成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①根据直接的、基本上是一种纯粹幻想的推论——既然所有的人按其本性来说是平等的，那么在享受上也应当是平等的——，人们认为，诉诸理性含有全部令人信服的宣传的因素，人们应当一举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的外部工具，以便占有能把反抗

^① 近年来许多法学家认为，已在资产阶级权利的修改中找到一种改善无产阶级状况的实际手段。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要求教皇去领导自由思想者同盟呢？最可笑的是，有那么一位意大利作家，他潜心研究阶级斗争，他要求除了建立资本权利的法典以外，还要求建立另一种法典，即保证劳动权利的法典。

者导向理性的唯一手段。

* * *

可是，所有这些不平等从一种既简单又单纯的正义的概念看来显得如此非理性，它们是怎么产生和如何维持下去的呢？《宣言》令人信服地否定了那种以天真而粗鲁的方式理解的平等原则。《宣言》宣布，在将来集体生产方式的形式中阶级消灭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给我们分析了这些阶级本身的存在基础以及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指出这些阶级并不是某种抽象原则的例外和削弱，而是历史发展本身。

正如现代无产阶级是以资产阶级为前提一样，资产阶级没有现代无产阶级也不能生存。它们两者都是完全以生活必需品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以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那种发展过程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是从封建的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它是通过斗争和革命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为的是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把它们全都应用于资本的形成、发展和增殖。如果阐述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在各个不同阶段的进步，探讨它在大力发展技术和征服世界市场中取得的成就，指出随着这种征服而来的种种政治改造（它们是这种征服的表现、它的防御手段以及它的结果），那么，也就同时描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无产阶级就其现状来说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时期，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所经历的许多阶段也是这个社会本身在其枯竭前所经历的许多阶段。富人和穷人、享乐者和不幸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立，绝不是象正义的狂热者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被人忽视的偶然现象。不仅如此，在那种使雇佣劳动成为必然性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指导原则下，这种对立就是一种必然的相互关系。这种必然性是双重的。资本在它使别人无产阶级化时才能占有生产，而且资本只有在雇佣那种被它无产阶级化的人时才能继续生存、赢利、积累、增殖和改变形式。对无

产者来说则只有在他们当作劳动力出卖时才能生存和延续后代，而劳动力的使用则取决于资本占有者的爱好和仁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和谐完全在于，劳动是一种活的力量，无产者通过它使积聚于资本中的劳动发生运动并不断再生产。这种关系是一种包含了现代历史全部内在本质的发展的结果；它为理解新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思想是它的表现）的真正基础提供了钥匙，同时它本身是不能用任何伤感的抗议和任何正义的论据来解决和解释的。

正是由于我在这里尽可能简要地加以分析的理由，平等共产主义被战胜了。它在实践中的无能为力是同它在理论上的无能分不开的，它在理论上弄不清非正义和不平等的原因，却想大胆地或轻率地一举清除或消灭这种非正义和不平等。

* * *

从那以后，了解历史就成了共产主义理论家们的主要任务。为什么人们还要以一种美化了的理想来同历史的严酷现实相对抗呢？共产主义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状态，也不能把历史形成的整个过程看作是一系列的失常和谬误。通过斯巴达克式的禁欲和基督教的服从并不能达到共产主义，也不能返回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仅能够，它还必须而且一定会从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生长出来。但是，这种解体既不能人为地硬塞给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从外部强加于它。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马基雅弗利说过，将由于自身的重负而解体。它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消失，这种生产方式从自身内部产生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法的和政治的）的经常性的和不断加强的反抗，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通过产生危机的竞争、通过令人眩晕地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来强化它的必然死亡的内在条件。一种社会形式的死亡，就象另一种科学部门中的自然死亡一样，也是一条生存规律。

《宣言》并没有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这也不是它的目的。它只是指出，现代社会将如何通过它的各种力量的前进运动而解体。为了使人们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阐明资产阶级的历史，而这一点在《宣言》中是作为历史哲学的典范加以扼要说明的，对这种说明我们可以订正、发挥和补充，但不能改动。^①

尽管人们既不接受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也不接受他们的发展的一般过程，但他们却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两人都是思想家，由于别具慧眼而超越了自由主义时代。在他们看来，这个自由主义时代在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圣西门在历史研究中用经济代替了法律、用社会物理学代替了政治，尽管他有很多唯心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模棱两可的东西，但他还是差不多揭示了第三等级产生的历史。傅立叶不熟悉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或被他自己忽视了的一些细节，却以他丰富的不受约束的思想描绘出一长串历史时期，而这些历史时期是通过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指导原则中的某些特征不清楚地加以区分的。接着，他着手创建一个现存的对立理应消失的社会。他从所有这些对立中敏锐地发现了，并首先研究了“生产的恶性循环”；在这里他无意地同西斯蒙第不谋而合了，后者在同一个时期、但怀着不同的意图和通过不同的途径研究了危机，控诉了大工业和无节制的竞争的弊病，从而宣告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科学的失败。傅立叶从他那和谐的未来世界的明朗高度用明朗的蔑视态度考察了文明时代的不幸，并严峻地描绘了历史的讽刺。圣西门和傅立叶作为思想家，并不认识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严酷斗争才能消灭剥削和阶级对立，而且从个人的需要出发作出结论，一个成了设计家，一个成了空想主义者。^②但是，他

① 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加以发挥，可以把该书看作是一种历史哲学。

② 我问安来·门格尔的看法差不多是一致的：圣西门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而傅立叶和欧文却是优秀的和典型的空想主义者。

们预先认清了关于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的指导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圣西门清楚地了解在人对人的统治理应消失的社会里的技术管理，而傅立叶，除了让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任意驰骋之外，还推测、估计并预言了这个未来社会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大量重要设想：按照《宣言》的说法，在这个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圣西门主义在《宣言》问世时已经销声匿迹。相反，傅立叶主义在法国还很盛行，不过就其性质来说，它不是一个政党，而只是一个学派。当这个学派在1848年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它的空想时，巴黎的无产者已经在六月的日子里被资产阶级击败了。资产阶级由于这次胜利而造就了一个主子，这是一个占统治地位达二十年之久的头号冒险家。

* * *

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新学说，并不是作为一个学派的名称，而是作为一个政党的诺言、恫吓和意志出现的。它的创始人和拥护者并不总是在空想中设计未来，他们的思想充满了当代的经验和需要。他们同无产者结合在一起。巴黎和英国的这些无产者由自己未被经验充实的本能所驱使，缺乏深思熟虑的策略作指导，就想一举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共产党人在德国传播革命思想；他们捍卫六月的牺牲者，并把《新莱茵报》⁹作为政治机关报；该报的文章在许多年以后还经常一版再版，就是今天也仍被看作是经典之作。^①1848年把无产阶级推到前台的那种历史形势一旦消失，《宣言》的学说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和传播场所。需要经过许多年，它才

^① 数月来我弄到了一份完整的《新莱茵报》。这份读物给人的印象出乎大家的意料。大家都希望把这份难得的报纸完整地重印，或者把一些极其重要的通讯和文章发表出来。（在这期间，拉布里奥拉的第二个希望实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遗著》第3卷。——弗·梅林注）

能重新得到传播,而且也需要经过许多年,无产阶级才能通过别的途径和别的形式再一次作为政治势力登上舞台,才能使这一学说成为它的思想器官,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而,这一学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预先批判了从政变直到国际建立时盛行于欧洲、特别是盛行于法国的那种社会主义;而国际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没有时间去战胜并消除这种社会主义。这种庸俗社会主义不是靠互无联系和不成系统的材料,就是靠形形色色的理论、特别是蒲鲁东的奇谈怪论发展起来的;蒲鲁东的奇谈怪论在理论上早已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了,^①而在实践上则在公社时期才被战胜,当时它的信徒由于从事实本身中得到了教益而不得不同他们自己及其老师的教义分道扬镳。

这一新的共产主义学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委婉地批判了从路易·勃朗到拉萨尔的形形色色的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国家社会主义混杂了革命的倾向,但当时它的中心点却是对劳动权利抱着空泛的幻想。如果这个公式包含对政府的要求,哪怕这个政府本身是由革命的资产者组成的,那么这是一个狡诈的公式。如果人们想以此来消灭那种对工资波动即竞争条件有影响的失业,这在经济上是荒谬的。如果要求一种出路去安抚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者这些无秩序的群众,这可能是一种政客的手段。对于每一个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必须经历什么过程的人来说,这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以占有生产资料并使之社会化而告终,也就是说,这种革命只能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结束:在这种形态中既无商品也无雇佣劳动,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结合成一个东西,即结合成一种共同的需要:为大家劳动。

劳动权利的幻景在六月的悲剧中破灭了。后来议会对它的讨

^① 参见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和布鲁塞尔版。

论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剧。拉马丁这位爱流眼泪的演说家，这位由时机造就的大人物，宣布了他的最后一句或者是倒数第二句名言：“灾难——这是各族人民的经历”，这句话是对历史的绝大讽刺。

* * *

《宣言》写得简明扼要，而且它的风格与宗教信仰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教迥然不同。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第一次把那么多的思想加以系统化，把那些能够茁壮成长的萌芽汇集在一起。但它并不是，也不想成为社会主义的法典，或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教义问答，或无产阶级革命的手册。我们可以把《精髓》留给赫赫有名的谢夫莱先生，我们也愿意把“社会问题是一个肚子问题”这句名言留给他。¹⁰ 谢夫莱先生的肚子多年来在世界上起着相当漂亮的作用，给社会主义爱好者带来莫大的好处，使警棍感到幸运。批判的共产主义正是从《宣言》开始，它迫切需要发展，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发展。

人们习惯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来称呼的整个学说，是在1860年至1870年间才成熟的。从《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①到《资本论》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前者第一次用精确的语言指出，如何从购买和使用劳动这个商品中获得了一种超出生产费用的产品，而这就是剩余价值问题的症结所在；后者的阐述是丰富、复杂、包罗万象的，它从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整个内部经济结构入手，详尽地研究了这个时期的发生过程，并在思想上超越了这个时期，因为这一著作阐明了这个时期的过程、它的特殊规律以及使它有机地产生的和使它有机地解体的那些对立。

从1848年遭到失败的无产阶级运动到当前的无产阶级运动

^① 我说小册子，是指1834年为了宣传而赋予这本著作的形式。它是马克思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的演讲稿，最初于1849年4月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新莱茵报》上。

也前进了一大步，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经历了千辛万苦，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持续不断而慎重缓慢地发展着。直到几年以前，无产阶级的这种进展只在德国才引人注目和备受赞扬；在那里，社会民主党从 1868 年的纽伦堡工人代表大会到现在，都象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样正常地成长。而从那以后，这类现象就以各种形式在其他国家出现了。

在马克思主义取得如此广泛发展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运动以正常的政治活动形式达到如此发展水平的情况下，是否象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式所具有的那种战斗性已经改变了呢？是否出现了从革命向所谓的进化转变呢？革命的精神是否已服从于改良主义的要求呢？

这些异议和思虑，过去和现在一直出现于最激烈和最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中间，这些敌人津津乐道于个别的失误、困难和挫折，把它们进行渲染夸张，借以断定共产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 * *

谁要是把当前的无产阶级运动及其纷繁复杂的过程同《宣言》留给人们的印象加以比较（如果不掌握其他方面的知识就来读它的话），那他就会轻易地认为，在这些五十年前的共产党人满怀信心的大无畏精神中曾有过一种过于年青和早熟的因素。他们的声音象战斗的呼唤，也象某些宪章派演说家的滔滔雄辩的回响；他们似乎在宣告一个新的、但不会为新的热月政变¹¹扫清场地的九三年即将来临。

而热月政变是重演了，并且从那时起，以或多或少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不同形式多次重演了；尽管它的发起人从 1848 年以来是法国的前激进派，或意大利的前爱国者，或德国的官僚（国家这个上帝的崇拜者和实际上是金钱这个上帝的忠实奴仆），或者精通统治

决窍的英国议员，或者甚至是戴着无政府主义面具的警棍。许多人认为，热月政变之星再不会从历史的天空消失，或者说得平淡一点，自由主义，也就是说，一个人们只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极限，超出这个极限只能是一种退步。所有那些把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展当作每个进步的基础和目标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不论他们是乐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他们都认为，这里已给人类树立了海格立斯石柱。这种感觉经常不知不觉地以悲观的形式，对那些同其他蜕化分子一道帮助壮大无政府主义队伍的某些人，发生影响。

还有另一些人，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推论说，批判的共产主义所论述的东西在客观上是不足信的。《宣言》关于把阶级斗争归结为唯一的斗争就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这一论断，似乎实质上并不正确。这一学说似乎站不住脚，因为它想从对某种事实的预见中得出一种理论结论和实践策略，而这种预见在这些对手看来会成为一种可以推向和推迟到无限的纯粹理论观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冲突决不会出现，因为这种冲突在这些人看来仅仅是随着经济竞争的局部冲突而增多的无数特殊的摩擦，因为它受到政府的诡计和暴力的阻碍和干扰。换句话说，现存社会不会被摧毁和瓦解，它将不断消除它所产生的弊病。任何一次无产阶级运动，如果它不象1848年6月和1871年5月那样被暴力所镇压，就会象最终成了工联的宪章运动那样在缓慢的衰竭中死亡，而工联则是这种论据的仪仗马，是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荣誉和光荣。现代的任何一次无产阶级运动都是一种流星般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有机的东西，是一种混乱而不是一种发展，按这些批评家的看法，我们会完全违背我们的意愿，仍然是空想主义者。

* * *

人们在《宣言》的学说中所看到的、批判的共产主义从此以后

通过深入广泛的研究当前世界而加以发挥的历史预见，鉴于它所产生的环境，无疑具有一副战斗的面貌和生机勃勃的形式。但它过去和现在都不象旧的天启和预言那样，包含有一个现成的时间表，或者事先描绘出一种社会组织。

英勇的多里钦诺¹²没有出来再次发出战斗的呼号。人们没有在闵斯德¹³重新庆祝耶路撒冷王国的复活。既不再有塔博尔派¹⁴，也不再有千年王国的信徒¹⁵。这里不再有傅立叶长年抽出一定时刻在寓所等待人类代表们光临。不再有人象贝勒斯、欧文、卡贝和德克萨斯的傅立叶派（他们的行动已成了空想主义的坟墓）那样，愿意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并且人为地创造一个新组织的雏形来改造人类。不再有美洲社会主义移民区那样的宗派，为了在小范围内培育集体生活的完善思想而羞怯地退出世界。

与此相反，在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中，整个社会在它的总的发展的某一时刻揭示出它注定要前进的原因，并通过一条明显的曲线弄清了自身，从而宣布它的运动规律。《宣言》的预见并不是时间表，它既不是诺言，也不是预言，然而它预见到了对社会机体进行改造。

* * *

在日常意见交锋中充满激情的嘈杂声里，在明显的构成历史材料的意志表现之外，在我们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和政治机构以外，在远离艺术和宗教给生活指出的方向的地方，存在着那种维持其他一切事物的社会基本结构，而且这种基本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和改造。剖析这种基础结构的就是经济学。如果人类社会已一次又一次部分地或根本地改变了它的非常明显的外部形式或它的意识形态、宗教、艺术等方面的表现，那么，人们首先应当到上述基本结构的经济发展中比较隐蔽地和乍看起来不明显地发生的变化里去寻找历史学家所说的唯一改变的根据和原因。如果问题涉及要

区分清楚真正的历史时期，就应当研究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如果问题关系到阐明这些形式的连续性，即一种形式为另一种形式所代替，那就应研究正在消失的形式为什么消失和灭亡。最后，如果人们想要了解某个一定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就必须研究种种摩擦和冲突是如何从作为某一社会特征的不同派别（也就是从各个阶级、它们的阶层以及它们的交错成分）中产生的。

既然《宣言》已宣告，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只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阶级斗争是一切革命和一切反动的原因，那么，它同时就完成了下面两件事：为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新学说的因素，并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指导线索，以便从政治生活的复杂事件中认识作为其基础的经济运动的条件。

近五十年来，新的历史学说的总预见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已成为一种认识如何在各种情况下进行活动的难以掌握的艺术，因为这个新时代本身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共产主义已成为一种艺术，因为无产者已成为一个政党，或正要成为一个政党。革命精神今天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得到了体现。共产党人同无产者梦寐以求的结合终于成了既成事实。最近五十年愈来愈有力地证实了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反抗与日俱增。

我们这些“空想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只不过是对于那些还在谈论流星般的不安宁并希望这种不安宁将逐步在我们这个最后的文明时期的安宁中完全消失和溶化的人提供事实的教训。而这种教训已经够多了！

* * *

《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以前的一本著作的序言里准确而清楚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

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

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 * *

当马克思写上面这段话的时候，他退出政治斗争舞台已有好几年了，只是后来国际成立时他才重新露面。反动派在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战胜了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革命。而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也击败了无产者。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所不可缺少的种种条件已经完全消失了。拥护《宣言》的共产党人，即参加过革命以及参加过人民反叛和反抗反动派的全部行动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已经看到，他们的活动由于值得纪念的科伦审判案¹⁶而中断。运动的幸存者试图在伦敦重整旗鼓，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一些人很快就同那些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分道扬镳并退出了运动。这次危机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平静。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宪章运动，即曾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中流砥柱的那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运动，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历史暂时使革命者丢掉了幻想。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马克思在几乎全力以赴地把已经发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种种因素经过长期努力发展成熟以前，在许多著作中阐述了1848年到1850年这一革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他指出，如果当前这种形式的革命没有达到目的，并不能因此就否定革命的历史理论。^①《宣言》中所作的指示在这一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后来，阐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著作^②则是把新的历史观运用于有严格时间界限的一系列事实的第一个尝试。把表面的运动还原为实际的运动，以便揭示其内在的联系，这是非常困难的。要从激昂的、演说家的、议会的、鼓动家的以及其他的事实达到内在的社会的齿轮传动机构，并在其中发现大小资产者、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牧师和士兵、银行家、高利贷者和流氓恶棍的各种不同利益，这实际上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所有这些利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起作用，它们在相互对抗，相互排斥，相互联合，并使自己融化于文明人的不协调的生活中。

这次危机已经过去，而且恰恰是在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的历史的发祥地的那些国家里，它已经过去。批判的共产党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去认识造成反动的隐蔽的经济原因；在这时，去认识反动就是革命事业的继续。二十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在另外的条件下、以另外的形式发生了，当时马克思以国际的名义在他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著作中为公社进行了辩护，而这种辩护在客观上也是对公社的批判。

① 这些曾经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汉堡版)上的文章，不久前由恩格斯汇编成小册子(1895年柏林版)并写了序言，书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②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最初于1852年发表在纽约的一家杂志上，后来在德国多次再版，现在又有了法文版(1891年利尔德劳利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 1850 年以后离开政治生活是英勇的隐退，他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后退出国际，又是一次英勇的隐退。这两件事对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很有价值，因为它们使传记作者有可能深刻理解他的个性；实际上，思想、政治和气质在马克思身上是融为一体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件事对我们来说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批判的共产主义不制造革命，它不策划暴动，也不搞武装叛乱。它同无产阶级运动浑然一体，它注视和支持这个运动是由于它充分了解把这个运动同社会生活所有关系的总合联结起来、能够联结而且必须联结起来的那种纽带。一句话，它不是培育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参谋部的学校；它只是在认识这种革命，而且首先是认识它的困难。

* * *

无产阶级运动最近三十年来空前地壮大了。它经受了无数困难，经历了前进和倒退，逐渐具有了某种政治形式；它的方法已制定出来并逐步得到运用。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学说的神奇作用，学说是通过书面鼓动或口头鼓动的令人信服的力量来传播的。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他们是每一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愈发展和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就愈有必要和有责任通过制定纲领和参加政党的政治活动，来利用经济发展中和以这一发展为转移的政治形势中的那些不断变化的偶然事件。

在《宣言》发表以来的五十年中，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构成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以致从那时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这个运动的整体并了解这个运动的细节，把握这个运动的真实原因及其确实关系。存在于 1864 年到 1873 年间的统一国际，在完成它的任务，即把整个无产阶级不可缺少的普遍倾向和共同思想初步加以协调之后，就必然消失了，没有人可能要求而且也

不会要求重建与此类似的组织。

对无产阶级运动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起了巨大促进作用的，首先是这样两个原因：在许多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感觉到，为了保护它自身，就需要清除工业体系所造成的某些弊病；因此出现了保护工人的立法，或者是人们冠冕堂皇地称作的社会立法。也就是这个资产阶级，为了它自身的利益或者为形势所迫，在许多国家里不得不增加一般的自由条件，特别是扩大选举权。这两种情况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日常的政治斗争中，大大增加了无产阶级活动的机会；无产阶级由此获得的机智灵活使它能够在选举谈判中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正象事物的发展决定思想的发展一样，同这种实际上形式多样的无产阶级运动相适应的，是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得到了同样的发展，即它无论在理解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方法方面，还是在对经济学最核心部分所作的极其详尽的描述方面，都有所发展：一句话，它已变成了一种体系。

* * *

有些人问道：这不是违背了《宣言》的纯洁而威严的学说吗？另一些人则问道，内容丰富和范围广泛不就使它失去了力量和尖锐性吗？

在我看来，产生这些疑问是由于对当前无产阶级运动的看法不正确，以及由于对以往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革命能量和威力的大小产生了错觉。

不管资产阶级能够在经济制度方面作出什么样的让步，甚至极大地缩短工作日，然而有一点始终是千真万确的：构成现代整个社会制度基础的剥削的必要性划定了一些界线，作为私有生产工具的资本是不能超越这些界线的。如果今天有一种让步能够消除无产阶级的某种痛苦，那么这种让步本身只能导致对新的和愈来愈大的让步的需要。对工人立法的需要在英国是在宪章运动

之前出现的，后来随着宪章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这种需要在宪章运动失败后不久的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它的初步成果。对这种立法改革运动的原则和合理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评论了它的原因和目的，而后来这些原则和合理性都通过国际写进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最后，被概括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的这整个发展，同五月一日这一天成了对无产阶级大军的一种国际性检阅，成了评价它的成就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使它的作风民主化了。不仅如此，还出现了真正的民主，而这种民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能适应目前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作为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的机构，是由官僚教权制度、司法官僚制度和资本家互助协会组成的，其目的在于保卫统治权、公债的永久性利息以及地租，总之，在于保卫形形色色的资本利益。于是，在心怀不满者和吹毛求疵的批评者看来，诱使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预见是虚无缥缈的这两种事实，反而成了证实这种预见的新手段和途径。那些看起来偏离革命的东西，总而言之，倒会加速革命。

此外，人们不应夸大五十年前共产党人所抱有的革命期望的意义。如果说他们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形势下曾经有一种信念，那就是要使自己成为先驱者，而且他们确实成了先驱者；他们曾希望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政治情况会接近现代形式，后来这一点部分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如果说他们曾经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会继续发展下去。反动派铲除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抑制了已经开始的发展。它也铲除了旧的革命策略，而在最近几年来已出现了一种新的策略。整个变化就是如此。

* * *

《宣言》并不想成为别的什么东西，只想成为那种只有经验和

岁月才能加以发展的科学和实践的第一条指导线。它只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进程的方案和节奏。非常明显，共产党人曾经受到了他们目睹的两次运动——法国运动和特别是经过1848年4月10日的示威游行很快就瘫痪了的宪章运动——的经验的影响。但是，实践一次又一次表明，这个方案不会一劳永逸地确立一种斗争策略。革命家们实际上常常以教义问答的方式来阐明那些纯粹是从事物发展中必然产生的东西。

由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发展和扩大，这个方案已变得愈加广泛和复杂了。运动的节奏变得愈加缓慢和多样化了，因为工人群众已作为独特的政党出现，这样就改变了活动的方式和规模，从而也就改变了运动。

既然武器和其他防御手段的完善使暴动策略行不通了，既然现代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排除了用突然占领市政厅的办法来把少数人——不管他们多么勇敢和进步——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全体人民，那么，无产阶级群众本身也就不再遵照少数领导人的口号行动，而且他们也不根据那些认为能够在一个政府的废墟上建立另一个政府的首领们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运动。凡是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得到发展的地方，他们都已受到了而且还正在受到民主的训练，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并把代表的活动置于他们的批评之下；他们经过独立的审核，把代表向他们提出的主张和建议变成自己的东西；他们根据各国情况已经知道，或者开始了解，夺取政权不能够也不应当由别人以他们的名义去实现。特别是他们已开始了解，夺取政权不可能是奇袭的结果。一言以蔽之，他们知道或者开始了解，将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己任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几个人领导一群人行动，这种专政必然是而且将是那些由于自身的发展和长期的实践而变成了政治组织的无产者本身的事业。

资产阶级制度在最近五十年里有了迅猛而惊人的发展和扩

展，它侵蚀了古老而神圣的俄国，而且，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甚至在日本也建立起新的现代生产中心，这样一来，它就使得竞争的条件和世界市场的复杂情况更加混乱，其结果，政治变革出现了，或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同样，无产阶级的进步也是突飞猛进和超乎寻常的。政治教育使它每天都向夺取政权迈出新的一步。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反抗，活劳动对积累劳动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明显。资产阶级制度从此处于守势，并由于这种特殊矛盾而显示出它正趋向没落：太平的工业世界已变为军国主义的大兵营。同时，由于事物的捉弄，太平的工业时期已变为不断创造新的战争机器的时期。

社会主义为自己开辟了道路。那些半社会主义者，甚至那些骗子手，他们充斥于我们党的报刊和我们党的会议，并经常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把一切殷勤、风骚和虚荣一股脑儿献给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生力量。尽管科学社会主义——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会理解它——早已提供了解毒剂，但是社会问题的药剂师们纷纷出笼，他们都有包治这样或那样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土地国有化，由国家垄断谷物，民主税收，抵押国家化以及总罢工等等。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抛弃了所有这类幻想，因为无产者一旦熟悉了政治斗争舞台，他们对自身地位的认识就会引导他们去透彻地理解社会主义。他们终于理解到，他们只应着眼于一个问题，即废除雇佣劳动；理解到只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甚至必然会消灭阶级，这就是不生产商品的联合体；并理解到这种社会形式不再是国家，而是它的对立物，即对人类社会进行技术管理和教育管理，实行劳动自治。雅各宾派——一九三年的英雄好汉们和四八年对他们的滑稽模仿统统都已过去了！

* * *

社会民主主义！——但有人会问，这岂不是明显地削弱了《宣

言》中用十分坚定而响亮的词句阐述过的共产主义学说吗？

现在不是回忆下列情况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名称在1837年到1848年间在法国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意义，而所有这些意义后来都融化成为一种模糊的倾向。也没有必要来说明，德国人是怎样用上述名称来概括从现已被克服和吞没的拉萨尔插曲起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那种社会主义的、丰富而广泛的全部发展的。毫无疑问，社会民主主义能够表明、已经表明并正在表明许多东西，而这许多东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既不是批判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道路。同样肯定无疑的是，现代社会主义，甚至在进展最快的国家，也掺杂着许多糟粕，而它将会在自己的漫长道路上逐渐摆脱掉这些糟粕；最后，毋庸置疑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广泛的名称成了许多不速之客的盾牌和纹章。但是，这里的问题只在于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问题。

为了完全避免模棱两可，我们必须强调一下这个名词的第二部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是民主的，它接受和讨论新学说的方式是民主的，它参加1848年革命和参与反抗反动派进攻的起义是民主的；最后，甚至它的解散方式也是民主的。在我们这些当代政党的第一个典型中，在我们这个既广泛灵活而又得到充分发展的组织的堪称为第一个的细胞里，不仅已经意识到先驱者务必完成的使命，而且已经有了仅仅适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批先锋战士的联合方式和形式。它不再是宗派；这种形式事实上已经被克服；直接的和幻想的个人统治已被废弃。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纪律；它来源于对必然性的经验，来源于恰恰应当是反映了这种必然性的意识的那种学说。国际的情况也是这样，国际只是在那些未能使自己的权威在那里占上风的人来说才有权威。情况必然是这样，而且各工人党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凡是这一特点不存在或者表

现得还不显著的地方，无产阶级宣传——它本身还是初步的和混乱的——就只会产生幻想，只会给阴谋提供口实。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宗派分子同白痴和奸细混杂的团体；这大概就是国际兄弟协会，它象寄生虫一样附在国际的躯体上并破坏它的声誉；或者也许象合作社之类的团体，它竟蜕化为企业，把自己出卖给某个有权有势的人；也许就象一个工人党，置身于政治之外并研究市场行情，以便带着自己的罢工策略卷入竞争漩涡；最后，也许就是由心怀不满者，主要是由脱离劳动阶级的分子和小市民拼凑成的集团，这些人热衷于拿社会主义进行投机，就象拿受人欢迎的时髦的政治空话投机一样。社会民主主义在其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所有这些障碍，它不得不摆脱这些障碍，而且目前它还必须随时都这样做。说服的办法并不是往往都能解决问题的。人们过去和现在经常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态度，并期待失望的严酷磨炼会成为一种教训，这要比讲道理更能解决问题。

* * *

居心叵测、诡谲多诈的资产阶级经常加以助长和利用的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这一切困难，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历史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在经济竞争的一般条件和政权的对抗中遇到了重重障碍，而且在无产阶级大众本身所处的环境中，在他们的缓慢、多变而复杂的，经常是矛盾和对抗的运动的这种纵然不可避免，但有时却模糊不清的结构中遇到了重重障碍。这一点妨碍许多人去认识全部阶级斗争如何愈来愈归结为资本家和无产者工人之间的斗争。

《宣言》并没有有效法空想主义者去撰写未来社会的伦理学和心理学，同样也没有提供这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那种发展的结构。少数先驱者已开辟了一条为了理解和认清未来

社会而必须选择的道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人首先是试验的动物；因此，人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人创造自己的历史。

* * *

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通过经验开辟了自己的道路——遇到了农民群众。

社会主义首先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认识并检验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在本来所谓的工业生产中的对立，然后使它的活动面向“农民狭隘性”盛行的群众。争取农民是当务之急，虽然谢夫莱的《精髓》早已动员反集体主义的顽固农民来保卫秩序。资本对家庭工业的排挤和盘剥，农业愈来愈快地转入资本主义经营，抵押消灭或削减了小地产，公共牧场消失，高利贷，税收和军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开始对这些据说要支持现存秩序的顽固分子发生神奇的作用。

德国人首先进行了这种进军；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他们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一事实；他们从城市走向较小的地区，而且不可避免地到达边远的乡村。这种尝试将是长期而困难的；这一点说明了、原谅了并将会原谅已经发生的或者将会发生的错误。^①只要没有把农民争取过来，我们就会始终吃这种“农民狭隘性”的苦头。而且因为它是狭隘的，它会无意识地制造或者试图重演雾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¹⁷。

俄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可能与征服乡村的步伐齐头并进。当这个国家带着它的种种缺陷和弊病，带着五花八门纯粹现代的剥削和无产阶级化，但也带着无产阶级政治发展所提供的补偿和利益

① 我第一次写这句话时，主要是指法国社会党人。但在不久前举行的关于提交德国社会民主党审议的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情况证明，我指出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是正确的（1895年10月第二版注）。

进入自由主义时代时，社会民主主义将没有必要再害怕来自外部的意想不到的危险，同时，它将由于争取到了农民而战胜内部的危险。

* * *

意大利的例子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个国家开创了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脱离历史发展的进程已有好几个世纪。这是人们能够准确地、并按文献记载对它的各个阶段加以研究的一种典型的衰败事实。在拿破仑统治时代，它才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进入了历史。它重新获得了统一，它经历了反动和密谋的时期之后，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最后，在意大利，议会制、军国主义和现代财团这一类罪恶应有尽有，但同时却不具备现代生产方式和在同样条件下进行竞争的可能性。由于煤炭奇缺，由于铁矿贫乏，由于技术力量不足，它无法同工业先进的国家竞争；它现在期望或希望通过使用电力来弥补它失去的时间。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处于一种几乎单一农业的社会，处于一个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落后的国度，那就会更加令人普遍地感觉到各种艰难困苦。

于是就出现了各个政党的动摇性和不稳定性，出现了从蛊惑到独裁的急剧摇摆，出现了多如牛毛的政治寄生虫、策士和空想家。一种受阻碍、被延缓、受限制和不稳定的发展的社会奇观，由一种透彻的思想非常生动地阐明了，而这种思想并不总是广泛而真实的现代文化的表现和成果，但它作为千年文化的遗留物，却带有一种非常伟大而精练的思想的标记。不难理解，意大利从来不是最初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倾向的合适土壤。意大利人菲力浦·邦纳罗蒂最初是小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后来成了巴贝夫的朋友，继而在1830年之后，他又试图在法国重新创立巴贝夫主义！在意大利，社会主义在国际时期才第一次以杂乱无章和支离破碎的巴枯宁主义形式出现；而且它不是工人的运动，而是小资产者的和

从原则出发的革命者的运动。^①最近一些年来，社会主义已采取了几乎是反映社会民主主义的普遍典型的一种形式。^②这样，西西里的农民起义（大陆上其他类似的暴动已跟着或将要跟着爆发）就在意大利第一次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勃勃生机。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吗？

* * *

在概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之后，我们的思路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我们那些五十年前的先驱者那里，他们随着《宣言》的发表而在前进道路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不仅是指理论家，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两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会通过讲台或论坛，或者通过自己的著作，对政治和科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使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没有遇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是如此；他们的思想的威力就是这样大，根基就是这样深，学识就是这样渊博。但是，我打算谈谈那些用资产阶级著作的傲慢而空洞的行话来说是不知名的人物，即鞋匠鲍威尔、裁缝列斯纳和埃卡留斯、微型画家普芬德、钟表匠莫尔^③、罗赫纳等人，还谈一谈其他许多最初曾经是我们运动的有觉悟的中坚力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宣告了他们的出现，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表明了他们的工作成果。这些先驱者的本能和他们最初的推动在今天的事业中继续发生作用，因此他们值得一切社会主义者刻骨铭心的感谢。

① 德国的情况则不同。1830年以后，社会主义已经被介绍到德国；它成了一种著作流派，并在哲学上得到了改造，其主要代表是格律恩。而早在新学说出现之前，由于有魏特林的宣传和他的著作，社会主义已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特征。正象马克思1844年在《前进报》上所说的，这是摇篮里的巨人。

② 许多人把它称作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学说，政党不能借用学说的本质和名称。马克思自己也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③ 莫尔最早使同盟和马克思建立了联系，并同他讨论了起草《宣言》的问题。1849年起义时他在牟尔克河战役中牺牲。

我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更愿意回过头来谈谈现代社会主义的初期情况，因为至少对我来说，恩格斯的下列严厉忠告绝不是不重要的：“政治状态和政治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在相应的经济状态中找到说明这样一个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在1845年作出的，而是洛里亚先生在1886年作出的。至少，他曾经幸运地使他的本国人相信了这一点，自从他那本书用法文出版以后，又幸运地使某些法国人相信了这一点。直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从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把他偷来的孔雀羽毛拔光以前，他满可以在意大利大摇大摆地自称是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历史理论的创始人。”^①

* * *

我本来想到此结束了，但是还要再说几句。

各个方面和各个阵营都提出了抗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异议纷至沓来。而参加这场鼓噪的，也有最近在各处出现的社会主义者、博爱的社会主义者、温情的有时又神经质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肚子问题象警告一样又出现了。另一些人则沉湎于关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这种抽象范畴的逻辑击剑术；最后，对另一些人来说，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又总是应时而出。

* * *

道德！然而我们早就从与古典经济学同时出现的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¹⁸中熟悉了资产阶级时期的道德。这种道德的政治不是已经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位古典作家马基雅弗利（他不曾发明马基雅弗利主义，但他是它的勤奋而忠诚的秘书和编辑）用难以忘怀的精彩笔触阐明了吗？我们不是看到过从马尔萨斯牧师到不可缺少的斯宾塞这位无聊而饶舌的空谈家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① 《〈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页（这段话的前面是：“……洛里亚先生……证明。”——译者注）。

之间的逻辑比武吗？生存斗争！然而难道你们想要观察、研究和理解一种对我们来说似乎比无产阶级的宣传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斗争？或者，你们也许想要把对超自然的社会领域（人类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劳动、技术和机构创造了这个领域，同时人类本身又能够用其他形式的劳动、技术和机构来改变这个领域）中的那种斗争的解释，仅仅限于去说明植物、动物以至人类（只要他们仍然处于动物状态）在自然界内部所进行的最普遍的斗争？

* * *

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论题上来吧！

批判的共产主义过去从不拒绝、现在也不拒绝接受在认识和研究从哈尔克顿尼的法莱司到卡贝^①的形形色色共产主义中可能对它产生的丰富而多种多样的启示，即意识形态、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等方面的启示。此外，通过研究和认识这些形式才发展和巩固了这样的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已经决裂。在进行这种研究时谁不承认托马斯·莫尔是一个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著作家呢？谁不由衷地无限敬佩罗伯特·欧文最先把人们的性格和道德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条件和他们周围的环境的必然产物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原则赋予共产主义伦理学呢？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由于研究了历史，认为他们的义务是支持一切被压迫者，哪怕这些人的命运几乎总是受人压迫而且总是在取得暂时成功之后又为新压迫者的统治开辟道路。

但是，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有一点与其他一切类型和形式的旧时的、现代的或当代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迥然不同，而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① 我最后说到这个名字，是因为卡贝正好是《宣言》的同时代人。我不认为我应当继续说到贝拉米和盖尔茨基的一知半解的形式。

他们不能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没有起过作用，不能承认无产阶级过去的进攻总是由于纯粹偶然的事件、意料不到的情况和变幻莫测的形势而遭到了失败。虽然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实际上都以高度的正义感和深刻地献身于理想的精神感觉到了社会对立，即现实的阶级斗争，但是，它们公开表示，它们并不了解它们用自愿的和常常是英勇的行动奋起反抗的那些对立的真正原因和实际性质。由此就产生了它们的空想性质。我们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其他时代的压迫状况尽管更为野蛮和残忍，却没有引起当代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蓄能量、聚集力量和持续反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在大工业和现代国家内部的形成，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一种新思想的新事实。可见，批判的共产主义既不是道德家，也不是说教者，也不是预言家，也不是空想家；——它把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主义倾注于这一事业本身。

这种解释对温情主义者来说似乎太严酷了，因为它太真实、太实际了；这种解释使我们有可能追述无产阶级以及在它之前的其他被压迫者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这种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我们会弄清宪章运动的失败和平等派密谋¹⁹的失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各种起义和反抗，追溯到历次战争、著名的德国农民战争²⁰以及扎克雷起义²¹和多里钦诺起义。我们在这一切行动和事件中将发现同资产阶级的形成有关的形式和现象：资产阶级如何打碎并推翻封建制度，战胜它并从它内部发展起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但是这种阶级斗争并不那么明朗。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历史、它们的不断变化的斗争和暴动的历史都已使我们充分了解到，为什么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其他时代来说是为时太早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已发展到了极限，那么，它在一

些国家里肯定已达到了它的顶点。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使各种比较陈旧的生产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屈服于资本的活动和规律。于是，它把以往的各种阶级斗争（当时这些斗争由于非常之多而相互排斥）简化为或者竭力简化为把生活必不可少的人类劳动产品都变为商品的资本同出卖自己的甚至已变为简单商品的劳动力的那些无产阶级化群众之间的斗争。历史的奥秘被简化了。这种奥秘是平淡无奇的。正象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其他一切阶级斗争的简化一样，《宣言》也同样在理论上言简意赅地把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主张统统简化了，它这样做并不是否定这些主张，而是把它们提得更高。一切都是平淡无奇的，共产主义本身也是这样：它现在已成了一门科学。而且，《宣言》中既没有辩术，也没有抗议。它并不用哀叹赤贫来消灭赤贫。它并不为任何东西而落泪。事物的泪水已经自动地变成一种自发的革命。伦理学和理想主义从此以后就是使科学思想为无产阶级服务。如果那些多数是愚蠢而神经质的温情主义者认为这种伦理学不够道德，那么，他们可以到大主教斯宾塞那里借用利他主义。他将给他们提供它那枯燥无味、模糊不清的定义，但愿他们对这些感到心满意足！

* * *

然而，只应当用经济因素来说明全部历史吗？

历史因素！这是经验主义者的或那些重复海德的话的思想家们的一种用语。有些人说，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或有机体，他们把时间都耗费在争辩这种说法的意义及其类似的应用上了。这个综合体已经形成并且已发生了多次变化。那么，应如何阐明这种变化呢？

早在费尔巴哈致命地打击神学对历史的阐明（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以前很久，老巴尔扎克即十七世纪的巴

尔扎克就已经写过关于这种阐明的讽刺文章，把人描写成神的傀儡。维科²²不是已经承认天意并不从外部对历史起作用吗？不正是这个维科在摩尔根以前一百年就把历史归结为人类本身通过经验的逐步积累，即通过语言、宗教、习俗和法律的形 成而构成的一种发展吗？莱辛不是断言历史是对人类的一种教育吗？让·雅克²³不是已经看到思想是由需要产生的吗？圣西门在他还没有醉心于区分有机时代和无机时代时不是已经承认了第三等级产生的真实历史吗？而且他那被翻译成散文的思想不是把奥古斯丹·梯叶里变成了一个历史研究的革新者吗？

在本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1830年到1850年这一期间，阶级斗争（古代历史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以他们在城市共和国狭窄范围内开展的阶级斗争经验为依据，已对这些斗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其规模在海峡两岸愈来愈大，其存在也愈来愈明显。在大工业中产生的、由于回顾和研究了大革命而得到启发的阶级斗争，已经显而易见和富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已或多或少明确地和自觉地在各政党的纲领中找到了它的令人鼓舞的现代用语，即英国的自由贸易和谷物税等等。在法国，历史观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著作界的右翼也好，左翼也好，即从基佐到路易·勃朗直到谦逊的卡贝全都如此。社会学是时代的需要，如果说社会学曾徒劳地在一位后起的经院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身上寻找自己的理论表现，那么它已经把实际上发现了阶级的心理学的巴尔扎克看成是它的艺术家。认为阶级和阶级冲突是历史的真正对象，认为阶级的运动是历史的运动，这就是人们当时全力寻找和找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在理论上必须以确切的用语确定下来。

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在一条事先已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人类创造了历史，同时他们也

创造他们自己的条件，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一种人为的环境，他们逐渐发展自己的技能，并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积累和改造自己的活动成果。我们只有一种历史，我们不能把另一种仅仅可能的历史同这种事实上已经产生的真正历史相提并论。在哪里才能找到这种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呢？远古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然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新生的，甚至还没有在整个欧洲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带有它的起源和它的成长的萌芽痕迹，这种痕迹在日本那样一些目前刚刚出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只要这个社会借助资本把人类劳动的全部产品变为商品，以无产阶级为前提或者创造出无产阶级，并且带来不安、混乱和不断革新的动荡局面，这种社会就在一定时期内以十分清晰的、虽然是不同的方式出现。事实上，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形式：例如在意大利，它开始得最早，而后来停顿了。在英国，它是三百年的产物，在这三百年中，旧的生产形式，或者用法律学家的话来说，旧的财产形式在经济上已被消灭。在一些国家，如在德国，它是逐步产生的，它同先于它而存在的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它由于适应这些力量而受到它们的影响；在另一些国家，它用强力打碎了旧的外壳和反抗的力量，例如在法国就是这样，在那里大革命向我们提供了人所共知的、最强有力和最令人头晕目眩的历史活动的范例，于是建立起一个最大的社会学学派。

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宣言》以富有教育意义的和流畅的笔触阐述了现代历史或资产阶级历史的这种形成过程，它依次对这种历史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般的剖析：行会、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进而列举了由它们所派生的和复杂的机构和工具，即法律、各种政治形式及其他等等。这里已经间接地包含了应当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阐述历史的那种理论的基本原理。

就是这个改革了先前生产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创立了关于

它的结构的学说，即经济学，从而阐明了它自身和它的发展。它实际上并不是在原始社会所固有的无意识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完全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世界中发展起来的。

* * *

正如大家知道的，经济学最初是以片断的形式出现的，它随着经商和完成地理上的重大发现的早期资产阶级，也就是随着重商主义²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而逐步形成。而且它的形成是为了回答一些专门性问题，例如：获取利润是合理的吗？积累财富对国家和民族有利吗？它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致力于研究财富问题的各个极其复杂的方面。而且它是在从重商主义向工场手工业过渡中发展起来的，后来它在从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中发展得更迅猛。它已成了势必要征服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灵魂。它作为科学在大革命前夜几乎已经勾画出了它的庞大的总轮廓；它已变成了反抗封建主义、行会、特权、限制劳动等等旧形式的信号；一句话，它已变成了自由的信号。从先驱者格劳修斯到卢梭、康德和九三年宪法发展起来的天赋人权，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经济学的加倍发展和在思想上的完善，并且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经济学本身同它在作者的思想上和要求上的完善常常是融为一体的，我们已在重农主义者²⁵那里见过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经济学作为学说，把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的各种发展因素和形式分解开，分别加以研究，并把一切都归结为下列种种范畴：货币、货币资本、利息、利润、地租、工资等等。它信心十足，进行大量的研究，从配第前进到李嘉图。它成了自己领域里的唯一主宰，它所遇到的异议寥寥无几。它的出发点是下述两个论断（它从来没有下功夫去证明这两个论断，因为在它看来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它所阐明的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那种必然产生雇佣制度和必然使雇佣工人受屈辱的那种人类自由是同一个

东西。换句话说，它不认识它所研究的那些形式的历史性质。对于它多次徒劳地试图加以系统化时所遇到的种种对立，它力图以逻辑的方法加以排除，例如，李嘉图在反对地租的斗争中就是这样做的。

十九世纪初，危机和最初的工人运动猛烈爆发，其直接根源是失业现象严重。自然秩序的理想破灭了！财富产生了贫困！大工业变革了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增加了罪恶、病态和俯首听命；一句话，它是蜕化的根源。进步产生了倒退。为了使进步只产生进步，也就是说，给所有人统统带来丰衣足食、健康、安定、教育和智力发展，应当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包括了欧文的全部学说，他同傅立叶和圣西门的意见在下述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再想求助于禁欲和宗教，而是想解决和克服社会对立，但又不削弱、甚至还要加强人的技术能力和工业能力。欧文走上这条道路，成了共产主义者，而且他是在现代工业所创造的环境中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对立完全包含在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中。所以，这种对立在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里必定会受到遏制。欧文是一个空想家。他想用试验的方法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而且他以英雄般的毅力和无与伦比的禁欲精神献身于这一使命，同时甚至以数学的准确性具体地制定出自己的建议。

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对立一旦被发现，英国就出现了从汤普逊到布雷这一批著作家，他们的社会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空想的，但它是片面的，因为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用适量的药物来消弭已经暴露和显露出来的社会缺陷。实际上，所有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人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发现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然后毫不犹豫地提出一些天真的问题：为什么不消灭贫困？为什么不消除失业？为什么不禁止货币这个中介物？为什么不根据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来促进产品的直接交换？为什么不把工人劳动所

得的全部产品都给工人？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固执而顽强的事物归结为五花八门的推论，而且这些问题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似乎这种统治是一部机器，人们可以装卸它的各个部件、轮子和传动装置。

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同所有这些倾向最终决裂了。他们作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把它当作关于现今社会结构的学说而继续进行研究。如不事先精确地估计这个结构的种种关系和因素，如不彻底地研究阐明这一结构的学说，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在实践上、政治上以革命的方式同这一结构进行斗争。这些关系、因素和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它们构成了一种体系和一种必然性。人们怎么能够指望用一种逻辑上的否定来摧毁这样一种体系或者用推论来消除它呢？要根除赤贫吗？但它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要把工人劳动的全部产品都给工人吗？但资本的利润那时会怎么样呢？如果在货币接触到的和与之相交换的一切商品中没有这样一种商品，即能够使买到它的人得到的比他所花费的还多的这样一种商品，那么，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又在何处和如何能够增殖呢？这种商品不正是雇佣劳动力吗？经济体系并不是用各种推论编成的一件织物，而是由各种相互连贯的事实集成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产生出各种关系的复杂织物。认为统治阶级几百年来千辛万苦用暴力、诡计、天才和科学建立起来的这种事实体系，为了给穷人们收回自身权利的要求及其代言人的推论让位，竟会退出舞台并毁灭自己，那是愚蠢的。不要求摧毁其余一切东西，又怎能要求消除贫困？如果要求这个社会改变用以自卫的法律，那是一种荒唐透顶的要求。如果要求国家不再成为这个社会 and 这种法律的保卫盾牌，那就根本不懂逻辑。^①这种片面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空想主义，它从下面的假定出发：社会容许改正个别错误，而不用革命，也就是说，不用对社会本身的总的和基本

的结构进行彻底改造；这种片面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象而已。它与事实发展的严格规律之间的矛盾在蒲鲁东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英国的某些片面社会主义者，并想通过某种定义和借助某种呆板的推论来阻止和改变历史。

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承认历史有权奉行自己的使命。资产阶级时代可以被超越，而且它将被超越。但是只要它还存在，它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规律的局限性在于规律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然而这种局限性不单单是必然性的对立面，不是单纯的现象，也不是肥皂泡。这种规律能够消失，而且，一旦社会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它也会消失。但是，它不会向要求改进、宣布改革或拟订计划等等随心所欲的主张让步。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摧毁、打碎、动摇和瓦解现今的社会形式，并在这种形式中逐渐创造出新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的运动的事实本身向我们表明，这种新的关系已经出现。

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被发现。这种阶级斗争出现在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内部发展已由经济科学阐明了——的起源中和无产阶级的崛起中。经济规律的局限性已经发现，但同时人们已经了解了它的受限制的必然性。新的历史观的整个方法和理性就在这里。谁认为只要举出对历史所作的经济解释就可以理解一切，那就错了。这种做法比较适合于而且只适合于某些分析的尝试，这些尝试分别地一方面考察了经济形式和范畴，另一方面考察

① 例如，特别是在普鲁士产生了一种社会君主国的幻想，它似乎会超越自由主义时代和谐地解决所谓的社会问题。这种荒谬的想法是在讲坛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²⁶的无数变种中再生产出来的。除了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空想主义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空想主义：官僚的和国库的空想，即白痴的空想。

了例如法律、立法、政治、习俗，然后依次地研究了用抽象方式加以考察的生活中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影响。我们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有机的历史观。我们在思想上已觉察到一种统一的社会生活的整体。经济本身融化于发展的过程中，在许多形态不同的阶段上表现出来，而在每个阶段上，经济都成了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总而言之，问题不在于，象我们的对手所想象的那样，把用抽象的方法孤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因素扩展到所有其他方面去，问题首先在于历史地理解经济，并以它的变化来阐明其他变化。这是对一切不学无术的人对我们进行的各种批评的回答，也是对那些一知半解的、温情的和神经质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批评的回答。这样，我们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把《资本论》写成批判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部著作，而把它写成关于资产阶级经济的最后一部巨著。

* * *

当写《宣言》的时候，历史的视野还没有超越古代世界，即对古日耳曼时代几乎还没有进行什么研究，也没有超越不久前已被还原为全部世俗历史的圣经传说。现在我们的历史视野完全不同了，因为它已回到了古雅利安人时代，已回到了闪米特人一切传统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那种非常古老的社会形式。而且人们还进一步回到了史前历史，即回到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摩尔根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社会、也就是政治社会以前的社会，并给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借以理解后来的一切社会构成是怎样从这个社会发展起来的：一夫一妻制，父权制家庭的发展，最初是氏族的财产，后来是家庭的财产，最后是个人的财产，各氏族之间逐渐结成联盟，国家就是从联盟中产生出来的。所有这一切，在了解了发明和使用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方面的技术发展之后，在认识了这种发展对社会综合体所产生的影响之后，就一清二楚了，因为

这种发展推动社会综合体沿着一定方向前进并使它经历一定的阶段。这些发现在某些问题上还可以加以改进，特别是经过对各种特殊形式进行了研究之后更是如此，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就是按照这些形式完成了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的。但是，从现在起下述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我们已弄清了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直到复杂的结构（例如雅典和罗马，及其按财产多寡把市民划分为各个阶级的制度）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过程，而这种结构直到不久前对有文字记载的传说的历史研究来说还是海格立斯石柱。作为《宣言》前提的各个阶级，它们的形成过程后来得到了解释，而且人们已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到在我们资产阶级时代构成经济科学的范畴的各种经济理由和原因的轮廓。傅立叶想看到文明时代进入一系列长期而广泛的发展阶段的梦想已经实现。人们已经科学地解决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现象是怎样产生的问题，而让·雅克·卢梭曾经试图按照独特的辩证的理由和贫乏得可怜的事实根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人类的发展在两点上，即在对我们来说至关紧要的两点上已经十分清楚了：一点是资产阶级的起源（这一点还是如此新鲜，并且已被经济科学所阐明），另一点是划分为阶级的古代社会形式（用摩尔根的话来说）、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向文明时代（国家时代）的过渡。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的一切，都是编年史家以及本来所谓的历史学家、法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至今所研究的问题。用新历史观去观察这一整个领域并使之重新复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人们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拘泥于旧观点。人们首先必须了解每个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经济，^①以便准确地区分在每个历史时代中发展起来的各个阶级；人们必须避免不可靠的假想，并且

① 几年前，有谁相信会发现和令人信服地阐明古老的巴比伦法呢？

不要把我们所特有的情况硬塞给每一个历史时代。为此必须有一些熟练的人手。可见，例如《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的最早起源的说法，即它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出来并逐渐聚集到城市里去的这一情况，并不是普遍的。这种产生方式适用于德国和其他有过类似发展情况的国家。在意大利或法国南部或者在西班牙，即揭开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现代文明的历史序幕的地区，情况则不是这样。在这个最初阶段，人们又见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条注^①中指出了这一点。在意大利公社里可以发现具有完备形式的这个最初阶段，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史前史，而马克思通过英国发展中那么多具有特征细节论证了这种积累。但是，这一点我打算就写到这里。

无产者只能放眼未来。科学社会主义者首先要研究当前，因为未来的条件是从当前自然而然地发展和成长起来的。认识过去，实际上只是在它能促进并加深阐明当前这一点上，才是引人注目的和有益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五十年来已掌握了新的和最后的历史哲学的各种因素，这一点对目前来说已经足够了。这种观察方式很快就会实现，因为想另搞一套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发现就象哥伦布的鸡蛋一样显而易见。在大批学者运用这种观点不断阐述整个历史之前，无产阶级也许已经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就，以致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时代已经被克服，因为它将处于被克服的地步。理解就是克服（黑格尔语）。

* * *

当《宣言》在五十年前把无产者从被同情的不幸者变为资产阶级理所当然的掘墓人时，这块墓地的范围，在两位未能用严肃的笔调掩盖住自己思想上理想主义激情的作者看来，必然是很窄小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

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墓地范围当时只包括法国和英国，它几乎不涉及其他的国家，如德国。今天，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迅猛异常的发展，这个范围在我们看来已经很大了，因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反过来使无产阶级运动扩大、普遍化和多样化，并使临近的共产主义所瞩目的舞台大大扩展。这块墓地会延伸到天涯海角。魔术师唤醒的生产力愈多，他所激起并准备的反对自己的反抗力量就愈多。

一切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和空想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预言的和神秘的共产主义者，过去总是认为，正义、平等和幸福的王国应当占领整个世界。今天，世界已被文明所洗劫，同时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也可以说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到处都在发展（我们可以把日本当作例子）。神圣的柏拉图已经认识到的那种在同一个国家里两个民族共存的现象长期存在。地球不会明天就被共产主义征服。不过资产阶级世界的疆界愈广，跨越低级生产形式而拥进来的人数就愈多，对共产主义的期望也就愈加明显和强烈，特别是因为在竞争范围内和竞争斗争中，掠夺和殖民的失利情况愈来愈少了。无产者的国际（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它的萌芽）后来已成了洲际组织，而且它在每年的五月一日都证明，全世界无产者事实上已采取联合行动了。资产阶级未来的掘墓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志不忘共产主义者宣言问世的日子。

1895年4月7日子罗马

（译自《纪念〈共产党宣言〉》莱比锡1909年德文版）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一)

历史的和社会的研究,象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而且比所有其他的研究更容易遭到不小的障碍,甚至是令人讨厌的障碍,这就是只有书本知识的人所固有的通常被称之为**咬文嚼字**的恶习。这种恶习渗入到一切知识领域并在其中蔓延,然而在关于所谓道德世界即历史的和社会的科学的综合的研究中,词句的崇拜、词句的权威常常使事物的活生生的和现实的意义被曲解和化为乌有。

在某些领域,长期的观察、反复的试验、满怀信心地使用完善的工具、到处或至少局部地运用精确的计算,这一切引导人类的思想有系统地同事物及其变种打交道。在确切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领域里,情况就是这样。在这里,词句的神话和词句的崇拜已经被克服和战胜,术语最终只有从属的意义——一般符号的意义。但是,在研究人们的关系和事件时,某个学派、宗派、阶级和宗教的所有的种种激情、利益和偏见,传统文献中所滥用的思想表现方法,以及从来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不断复活的经院哲学,不是掩盖事物的真实意义,就是把它变成术语、词句、抽象的和公式化的说法。

那些公开使用“唯物史观”这个术语和公式的人应当首先认清这些困难。许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认为,不弄明白这个术语同其他概念和现象的联系,或不从起源上研究这个学说的产生的原因,^①或者最后,不从它的追随者们反驳自己的对手的异议的论战

^① 这种从起源上进行的研究是我的第一篇文章《纪念〈共产党宣言〉》的主题和对象。这篇文章也是理解所有其他问题所必需的导言。

中去弄清这个术语的意义，而简单地分析一下构成这个术语的几个词，就能自然而然地和很容易地理解这个术语的意思。咬文嚼字总是力图限于纯粹形式上的定义。它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用简单的和明显的术语和公式来表达庞大而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丝毫没有困难。它还使人相信，清楚地认识原因和结果之间纷繁而复杂的联系就象看一出戏一样，并不困难。说得更明确一点，咬文嚼字使问题失掉任何意义，因为它把这些问题仅仅看成一种名称。

* * *

其次，如果咬文嚼字在某些理论设想中得到支持，例如这样一些理论设想，它们把物质说成是某种比更崇高更高尚的、被称为精神的原则低下的东西，或某种与精神相对立的东西；或者，如果咬文嚼字同某种文字习惯（它把贬意的“唯物主义”一词跟被简称为唯心主义的一切东西对立起来，也就是跟所有的反利己主义的动机和行为对立起来）相结合，那么我们会陷入极大的困难。这样一来，有人就会对我们说，这个学说力图解释人类本质的一切特性，但只考虑物质利益，根本不重视思想利益。这个学说的某些捍卫者和传播者的无经验、无才能和匆忙急躁在颇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混乱；他们热情地急忙向别人讲解他们自己也不完全明白的东西——其实这种学说仅仅是开始形成，还需要长期发展——，冒失地把尚不完善的学说运用于最初遇到的事实或历史现象，差一点把新学说引向毁灭，把它变成科学新事物的一知半解的爱好者和其他类似的懒汉们进行浅薄批判和嘲弄的对象。

* * *

如果允许我在这里，在开头几页就批驳——暂时还只是初步地——这些偏见，并揭露抱有这些偏见的意图和倾向，那么应当记住，我们的学说的意义首先应当从它对它真正反对的那些学说所

采取的立场中，特别是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体系所采取的立场中去寻找。同时还应当记住，它的价值由于它对人类历史的连绵不断的运动所作出的最能令人接受和最合理的解释而完全得到证明。最后，应当记住，这个学说没有这样的主观偏见，这种偏见是某些任意反对他人利益的人的利益的一种属性；这个学说只是要查明任何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利益的客观协调和从属关系；同时它以一种追溯起源的过程为依据，这种过程是从条件向受制约、从事物形成的因素向已经形成的事物的过渡。

* * *

让咬文嚼字者去随意见论“物质”一词的意义吧，让他们说它是形而上学的臆造或者它令人想起这种臆造，或者它表现出自然经验的最终假定基质吧。我们在这里并不研究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问题，而只是力图弄清楚与动物生存不同的人类生存的一定条件。问题不在于根据生物学的资料作出归纳的或演绎的结论，而在于首先弄清楚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它是借助于人本身在一定的和正在改变的条件中活动的继承性和完善化而形成和发展的——的特点，在于寻找构成意志和行动的基质的种种需要的协调和从属关系。问题不在于发现人的愿望或给它们以评价，而在于设法指出事实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

人们不是由于自由选择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最初满足于某些基本需要，后来满足于比较完备的、从最初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需要；为了满足某些需要，他们发现和使用一定的工具和手段，并以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同样，唯物史观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试图借助一定的方式用思维来再现经历过若干世纪的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复杂化。这个学说的新颖之处同所有在幻想中遨游而最终艰难地到达平淡的现实领域并始终停留在现实里的那些学说的新颖之处，别无二致。

(二)

咬文嚼字这种形式主义恶习同通过不同途径在人们头脑中扎下根的另一缺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至少外表上是相似的。就这种缺点的某些最一般和最普遍的表现来看，我把它称为**堆砌辞藻**，虽然这个词还不能完全表达它的本质，也不能解释它的起源。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写历史，解释历史和评论历史。各种各样的利益——从狭隘的实际利益到纯粹的美学利益——驱使不同的作家构思并撰写这类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只是在文明萌芽、国家形成和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到——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以阶级差别和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开始出现在各个国度里。历史学家们，即使象从前希罗多德那样单纯，也总是诞生和成长在一点不单纯、反而是非常复杂和紊乱的社会里，而且是在这种复杂和紊乱的原因并不为人所知、而它们的起源又已经被人遗忘的时候。这种复杂性连同它所含有的一切矛盾——它后来暴露出这些矛盾，而且使它们在各种各样的变迁中爆发出来——在叙述者面前是一种要求解释的神秘的东西，如果历史学家想使他所叙述的事件有一定的连贯性和某种联系，他就不得不在单纯的叙述中加上一些一般的说法。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神的嫉妒**到泰恩先生的**环境**，这些无数的观念都被看成是解释所叙述的事件和补充这些事件的手段，由于叙述者的自发的思想方式，它们十分自然地出现在他们头脑中。阶级的倾向、宗教的偏见、广泛流传的成见、某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流派的影响或对这种流派的模仿、幻想领域中的遨游、渴望用艺术构思来补充人们只是片断地知道的事实——所有这一切，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原因，使得用来解释事件的多少有些幼稚的理论的基质形成了。这种理论或者暗中构成叙述的基础，或者至少可以用来点缀和美化这种叙述。

人们不是谈论**机会**或**劫运**，不是强调人类的种种事件听天由命，不是把**命运**（在马基雅弗利的严格的和常常是严厉的观念中勉强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神）这个词和概念提到首位，不是象现在十分经常做的那样推论**事物的逻辑**吗——所有这些臆想，过去和现在，都是幼稚的思想、自发的思想、不能借助批判和经验向自己说明自己的过程和结果的思想的发明和产物。对于在理解事件如何不依我们的意志和赞同而按它们自身内部的必然性来发展这一方面所存在的空白，人们努力用假定的概念（例如，**命运**）或用似乎是理论性的说明（例如，**事件的命定的进程**，这个进程后来有时在观念中同进步概念相混淆）来弥补，而这种努力就是或明或暗地广为传播的史实叙述家的哲学的原因和后果。这种哲学由于它的自发性质，只要以知识为基础的批判一出现，马上就会消失。

* * *

所有这些观念和杜撰，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只是不成熟的思想的暂时有用的辅助手段和臆想，然而却常常被有教养的人看成是理性的顶峰；它们表现和反映了人类的大部分发展过程，因此，不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无根据的杜撰或短时幻想的产物。它们是我们称之为人类精神的那种东西的一部分和它的形成因素。如果这些观念和杜撰混合在一起和结合在一起，成为有教养的人或被认为有教养的人所共同接受的看法，那么它们就最终开始构成一大堆偏见，并形成一种障碍，它会产生无知，妨碍清楚而全面地认识现实。这些偏见以其辞藻堆砌的派生物形式被形形色色的职业政客、政论家和报人所重复，并且成为所谓**社会舆论**的修辞支柱。

* * *

把现实的东西或积极活动的力量，也就是因情况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同这种非批判的杜撰和文学手法的幻景，同这些想象的偶像和假定性对立起来，然后用这样一些力量来代替这些杜

撰——这就是新学说的革命任务和科学目的。这种新学说使历史过程的说明客观化和——我可以这样说——几乎是自然化。

* * *

整个历史的基础是因素的总和。我们不妨列举出这些因素。每一个特定的民族都不是任何的个人的群体，而是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联合，被血亲的自然纽带、或者被同族和亲戚关系的人为的和习惯的规则、或者被长期邻居而形成的纽带所结合起来的人的联合。这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有一定边界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富饶的、而且只要经常进行劳动就总是有收成和总是可以得到开发的土地上；这个民族，以一定的方式散居在这块土地上，由于一定的分工而划分成各个集团，而分工又导致某种（刚刚萌芽的或发达的）阶级划分，或者导致某些阶级的毁灭和改造。这个民族，掌握某些工具——从燧石到电灯，从弓箭到弹仓式步枪，有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产品分配方式；这个民族，由于上述所有的关系构成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由于相互适应的习惯，或者由于缔结了措词明确的条约，或者由于遭到暴力行动，已经产生或形成法的和政治的联系，后来这些联系导致国家的建立；这个民族，在这样的国家组织出现之后，即它只是要巩固、维护和永远保持不平等，而且由于它所造成的新的矛盾使社会制度处于经常不稳定的状态，就引起了政治运动和革命，从而预先规定了进步和退步的原因——这个民族，在此之后，是任何历史的基础。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中包含着平淡的现实对任何幻想的和唯心主义的理论的胜利。

要想把许多世纪以来妨碍正确观察的幻影抛到一边，而照事物的真实面目看待事物，自然必须丢掉幻想。但是，现实主义学说的这一发现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要用物质的人去反对观念的人。相反，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揭示任何人类发展，包括在一定具体条件

下所有被我们称为观念的那些东西(即在包含着它们形成的原因、规律和节奏的条件下)的真正原则和动力。

(三)

如果相信那些由于许多世纪以来偏见的力量作祟而掩盖了真实情况的大量先入之见、幻想和不成熟的解释是叙述、解释和评论事件的历史学家们自己虚构和制造出来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有时就是这样:在这些偏见中有一些是个别人臆想出来的,或者是大学和学院里狭小专业圈中形成的著作流派的产物。关于这些偏见,人民毫无所知。但是,有一个事实是重要的,这就是历史本身给自己蒙上了这些复盖物,换言之,历史事件的活动者和当事人本身,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统治阶级或阶层、国家的统治者、宗派、狭窄意义上的政党——所有这些人几乎到十八世纪末(除了个别短暂的时刻之外)都意识到了自己本身的活动,只是给它蒙上了一层妨碍认清事件真实原因的唯心主义的覆盖物。早在完成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黑暗时代,即随着农业的初步改进,随着某些民族开始定居在一定的区域,随着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出现和不同氏族的最初的联盟的形成,出现了财产和国家得以发展、至少是城市国家得以发展的种种条件。简单说来,早在最早的社会革命时代,人们就已经把自己的活动看成是神和英雄的神奇业绩。因此,他们想出了对本身的活动的解释,似乎这种活动不是出于他们本身。其实他们的所做所为无非是他们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于必然性而能够做到和必然要做到的。人类行为的这种思想外壳后来在若干世纪中多次改变自己的形式、外观以及它们的种种组合和关系,从直接创造的天真神话到复杂的神学体系和圣奥古斯丁的“神之都”²⁷,从迷信奇迹到一切空想的奇迹中最了不起的奇迹——观念。按照黑格尔主义的颓废派的说

法，在历史的进程中观念自身和从自身中通过自身的否定产生出人类生活的一切彼此大不相同的变种。

现在，正是因为不久前才最后克服了对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态度，而且只是在现今时代才把实在的和实际起作用的关系的综合同它在神话中的天真反映，同它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中的比较复杂而敏锐的反映清楚地分离开来，所以我们的学说给那些想运用这个学说来深入解释以往历史的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不小的困难。

* * *

问题在于，我们的学说需要对历史资料进行新的批判。我说的不仅是对本来意义上和通常意义上的文件的批判，因为就这些文件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于职业批判家、学者和语文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非常完备的东西。我说的是直接的资料。这种资料通常没有记入文件本身，而且它在文件中得到反映和写入文件之前就存在于精神中，存在于活动的人借以说明自己的活动的动机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精神，即这种意识常常不符合我们现在能够发现和刻画的历史事件的真实原因；因此，在我们看来，活动的人掉进了幻想的狭小圈子。揭去历史事实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蒙上的那些复盖物——这就是对真正意义上而不是形式上的资料进行新的批判的关键所在；这就是最终使我们能够根据现在拥有的意识水平去理解我们已经得到的关于以往种种条件的材料，以便重新完全改造这些条件的关键所在。

但是，这种对最直接的资料的考察，是某个时候可以达到的历史自我意识的最高极限，它会成为严重错误的原因。因为我们所持的观点同历史活动家借以认识本身的活动并常常从中看到这些活动的动因和依据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只是某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某种人为的东西、最直接意义上的纯粹的幻想。例如，马丁·路德象当时

其他伟大的改革家一样，并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东西，即改革运动只是第三等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德意志民族反对罗马教廷对它的剥削的经济起义。路德之所以具有鼓动家和政治家的性格，是因为他完全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这种信念迫使他推动风潮的阶级斗争看成是真正基督教的恢复和隐藏在事件的日常进程后面的神的必然性。

研究早已发生的事件，即反对封建领主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壮大，公侯们靠削弱皇帝和教皇的跨地区和超地区的权力而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对农民运动和性质较接近无产阶级运动的再洗礼派²⁸运动的残酷镇压，研究这一切，使我们可以重新考察宗教改革运动²⁹的经济原因的真正历史，特别是使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它的必然性的主要证明——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某件事实可以抛开它发生的环境而孤立地去研究，用后来的完全主观的和简单化的分析去切断有着相互联系的情况的链条。宗教改革运动的内在原因，或者，正如我们现在可以说的那样，世俗的平凡的动因，我们在法国这块它没有最后取得胜利的地方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在尼德兰也看得比较清楚，在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斗争中，除了民族差别之外，还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矛盾；最后，在英国也看得十分清楚，在那里，通过政治暴力实现的宗教革新，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向那些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征兆的条件过渡。事后，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未能预料的后果发生之后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真正的动力——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本身也多半不理解的宗教改革的内在原因——的历史变得一清二楚了。但是，发生这一事件时的种种情况是任何带偏见的分析也改变不了的。它们的特点，在于事件正是象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了，它具有一定的形式，穿着一定的外衣，具有一定的色彩，在于这事件激发了这样的热情并得到了这样狂热的扩展。

只有同新学说普及者的狂热不可分割的、好走极端的态度才会使一些人相信，对历史研究来说，只要仅仅突出**经济原因**（常常是还不明显的，而且有时是根本没有弄清楚的）就够了，然后把其余的一切当作不需要的、然而却是人们情愿承担的负担扔掉，当作某种次要的东西，或者干脆当作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完全当作不存在的东西扔掉。

有人说，必须完整地考察历史，考察它的整个总和；历史的核心和外壳构成一个整体，按歌德的看法，这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特点。从这种说法中显然可以引出三个结论。

首先，在历史社会决定论的领域内永远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原因和结果之间、条件和它所制约的现象之间、先前的现象和后来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同样，这些关系在个人心理的主观决定论中也永远不会一眼就看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很久以来，在主观决定论的领域内，抽象的和形式的哲学由于轻视关于宿命论和自由意志的一切胡说八道，倒是能够比较容易发现意志的每一个行为的决定性原因，因为意志的行为最终决定于由某种原因支配的决心。但是，在意志的行为及其原因的背后隐藏着它们的起源，而为了再现这个起源，必须跳出意识这个狭小的框框，分析人类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一方面是社会条件造成的，另一方面却消失在人类本性所固有的生物特性（包括遗传性和返祖性）的黑暗深渊中。

在历史决定论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在这里也同样是从宗教的、政治的、美学的、激情的等等动机开始的。但是，接着应当在构成这些动机的基础的物质条件中寻找这些动机的原因。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条件的研究应当十分深入，以便不仅要彻底弄清楚它们是原因，而且还要彻底弄清楚它们怎么会具有那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它们在人们的意识中表现为动机，而这些动机的起源却常常被人遗忘。

从这一点无疑还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³⁰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这样的任务要求分析并找出最简单的因素，然后再把彼此相联系的单个因素连结起来，即综合法。

第三，由此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为了从构成基础的结构过渡到一定的具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历史过程，必须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由于找不到另外的术语，我们把这种综合称为**社会心理学**。我使用这个术语，既不是想暗示社会精神的虚幻存在，也不是想暗示关于所谓集体精神的臆造，这种集体精神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和表现出来，似乎是遵循自己的规律而并不依赖个人的意识以及他们的物质的和被规定的关系。这是最地道的神秘主义。我也不是想暗示社会心理学论文所进行的概括，它们的主要思想是：把为个人的心理学而创造的范畴和形式移植并运用于被称为社会意识的虚构的客体上面。最后，我不是想暗讽那些众多的半生理学和半心理学的名称，人们象谢夫莱那样借助于这些名称把脑髓、感觉能力、感情、意识等等强加给社会机体。我想说的是比较质朴和平凡的东西：社会意识的具体的和一定的形式。如果考察一下这些形式，某个时代的罗马平民，爆发过昌皮运动³¹那个时期的佛罗伦萨手工业者，或者产生出泰恩所说的1789年自发无政府主义的法国农民（他们后来成为自由劳动者和小所有者，或者希望得到少量财产，因而在短期内从在自己祖国之外获得胜利的人变成了反动派的盲目工具），所有这些人就会以本来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种社会心理学谁也不能把它归结为抽象的教义，因为它在大多数场合十分明显和具体，记述型的历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小说家和各种思想家一直只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各种思想的鼓动家、演说家和宣传家都求助于和诉诸于这种

心理学，因为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人们的特殊意识。我们知道，它是派生的东西，即一定的、具体的社会条件的结果。一定的阶级所处的一定的地位决定于它所执行的职能、它的从属关系或它实行的统治。这一定的阶级和所有的阶级以及它们的职能，从属关系和统治——这一切都以生活资料的某种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即特殊的经济结构为前提。这种其本质总是决定于生存条件的社会心理学，不是所谓人类精神的发展的抽象过程和一般过程的表现；它始终是特殊条件的特殊产物。

所以，我们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的形式决定他们的社会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马克思语）³²，这一论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些意识形式既然决定于生活条件，也就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历史——这不仅是社会的经济解剖，而且是蒙住和遮盖这种解剖的种种现象，包括它在幻想中的种种反映的总和。或者换言之，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而不论这种意识是以迷信或经验为基础，是以直接感受或反射为基础，是充分发展的或不彻底的，是心血来潮的或自我控制的，是幻想的或纯理论的。

（四）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我们的学说是使历史客观化和在一定意义上自然化，它不在一眼就能看清的东西，即在有目的地活动着的人的意志表现和与人的活动有关的观念中寻找对历史的解释，相反，它在意志和行为的原因和动机中寻找对历史的解释，以便然后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本过程中发现这些原因和动机的相互联系。

现在，在“自然化”这个术语中潜藏着一种巨大的诱引力，使许多人把这一类问题同另一类问题混淆起来，也就是把那些适用于和有益于研究并解释总的自然界和具体的动物界的规律和概念推广到历史方面。达尔文主义借助物种异变性的原则占领了关于事物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最后堡垒，结果是各种机体变成了真正自然历史³³的各个阶段和因素。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用那些在生存斗争的条件下，从而在没有经过劳动改造的地理环境中直接发展起来的动物的生命所服从的规律和原则，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的起源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许多年来象瘟疫一样控制着一些研究工作者和更多的律师和高谈阔论的社会学者的头脑，而且最后甚至象时髦或流行病那样影响着政治实践家的日常语言。

* * *

乍看起来，似乎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存在某种直接的明显的东西和本能的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东西，其实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滥用类比和匆忙下结论。毫无疑问，人是动物，而且由于起源和血缘的关系而同其他动物有联系。人在起源和机体的基本结构方面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人的机体的生理现象不过是一般生理现象中的个别情况。人的最初的和直接的活动地盘曾经是没有经过劳动加以人工改造的自然界；这为迫切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创造了条件，生存斗争的结果是人获得了适应自然界的不同形式。真正意义上的种族是这种适应的结果，也就是说，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种族直接以黑色或白色皮肤、卷发或直发等等这样的标志来彼此区别，所以不是派生的历史社会形成物，即民族。原始的本能和在杂婚中出现的性的选择的最初萌芽也是这种适应的结果。

我们只能通过思辨的方法，结合着猜想和设想来想象野蛮的

原始人，而无法通过经验的直观来理解原始人。同样，我们也无法确定继承性的那种间歇、即中断的起源，由于这种中断，人的生命似乎与动物的生命完全分离，并在后来提高到比后者越来越高的水平。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一切人和曾经居住在地球上、而且是相当可靠的观察对象的那些人，在自己的发展中，距离人类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动物的那个时刻，已经相当遥远了。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在已经形成一定的习俗和法规的时候，即使在我们现在知道的形式中最原始的形式里，即在有了级别划分并实行一个级别的所有男人同另一个级别的所有女人的婚姻的澳大利亚氏族那里，都使人的生活同动物的生活有了颇大程度的分离。我们再来看一看后来的阶段并考察一下母权制氏族（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典型母权制的发现对史前史的研究起了革命的作用，同时为理解历史本身的起源提供了钥匙），就会看到社会关系大大复杂化了的社会形式。甚至在我们认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原始的社会生活阶段，即在澳大利亚人那里，不仅存在使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相当复杂的语言体系（语言可以说是社会存在的条件和工具，原因和结果），而且人的活动除了使用火，在利用各种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各种人工手段方面已经专业化。氏族为了自己的活动而占据一定的地区，采用一定的狩猎方法，熟练地使用某些防卫和进攻的武器，为保存已获得的食物而制造了某种器具、装饰身体的方法等等——这一切证明，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人们在人为的、尽管是很原始的却竭力去适应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个环境最终是整个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依照这种人为的环境的发展水平，把创造这个环境并生活在其中的人称为蒙昧或野蛮阶段的人，而这种最初形成的人为的环境我们通常称为**史前史**时期。

历史（如果我们赋予这个词以书本上通用的意义），即人类发展过程中其传统深深印入各代人的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是在人为

的环境经历了很长一个发展时期才开始的。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运河系统引起了古代巴比伦国家的出现，而尼罗河的排水渠引起了最古老的哈姆语埃及的出现。生活在历史本身的萌芽期的这种人为的环境中的人同现在的人一样，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有组织的社会。这些社会象现在一样，通过分配义务（换言之，分配劳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种类的协同活动和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服从，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类关系和联系以及生活方式，同现在一样，不是在动物生存斗争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习惯的重复和固定的结果。不仅如此，它们是以发明一定的工具，驯化许多动物，加工石头和金属（包括铁），使用奴隶和类似的工具和家什（这些东西最初把各个社会集体分开，然后又把这些社会集体中的一些成员同另一些成员分开）为前提的。换言之，人们既然联合成为社会，他们的活动就会对人本身发生影响。他们的发明和发现由于创造了完全不同于自然条件的生活条件，不仅产生出习俗和习惯（穿衣、煮谷物等等），而且还产生出同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相适合和相适应的共同生存的关系和联系。

当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开始的时候，**经济**就已经存在。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在被他们的劳动大大改变了的环境中，用完全是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工具进行劳动。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为了占据使用这些人造工具的优势地位而相互斗争，换言之，他们作为奴隶和主人、臣民和君王、被征服者和征服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而相互斗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进步的情况下，在退步的情况下，以及在人们不能克服当时的社会形式而暂时出现停滞的情况下——他们从来没有再返回纯动物的生活，从来没有完全丧失人为的环境。

因此，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断定和研究人为的环境、它的起源和结构、它的变化和改造。硬说这种环境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和继续，这只是一种过于一般和抽象的、因而归根结底没有任何明确意义的思想。

人类只能生活在地球上，不能设想人类可能搬到另外的地方。人类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人的生存的最初阶段直到当代，曾经为发展劳动、即为物质文化的进步和为人本身的内部发育寻找必需的手段。这些自然条件总是必需的：过去对于为放牧而有时种地的游牧人偶然进行耕种来说，现在对于现代集约园艺栽培名贵果实来说，都是这样。这些土地的条件过去提供适于制作最初工具的各种石头，而现在提供煤炭——大工业的能源；它们过去给原始的氏族提供编织用的芦苇和柳条，而现在提供复杂的现代电机工业所需要的一切物资。

但是，进步不是表现在自然界的物资本身，而只是表现在人们通过积累的劳动即经验而在自然界中逐渐发现创造新的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形式的种种条件。这种进步根本不能归结为主观主义心理学的信奉者对进步的理解，而恰恰要归结于理性和思维的发展本身的内部变化。另外，这种人的内部发展中的进步是第二性的和派生的，因为它的前提是在人为的环境中所发生的进步，是在一定的劳动形式和分工形式的基础上发生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进步。因此，断言这一切似乎只是自然界的简单的继续，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人们想要赋予“自然界”这个词以非常广泛的意义，以致这个词不再指某种精确的和确定的东西，而是指正在发展的人的劳动活动的成果以外的任何东西。

历史是人创造的，因为人可以制造和改进自己的劳动工具并借助于这些工具创造人为的环境，然后这个环境通过复杂的途径对人本身发生影响，并且在它当时的状态下和后来的变化中成为人的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可见，没有任何理由把构成历史的人的这种创造活动归结为单纯的生存斗争。如果说生存斗争完善和改

变了动物的器官，如果说它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促使了新的器官的出现和发展，那么它也并不产生作为人类发展过程的连贯的、直线上升的和具有继承性的运动。不应当把我们的学说与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我们的学说不需要再去求助于任何形式的宿命论——神话的、神秘的或者比喻的。因为，如果说历史主要靠技术的发展的说法是正确的，换言之，如果说劳动工具的不断发明的结果是不断出现的分工种类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的类型（它们多少稳固地综合起来构成所谓社会机体）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另外的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这些工具的发明是内部生活的条件和形式的原因，同时也是其后果。这些条件和形式，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抽象范畴加以考察，可以把它们叫作想象、意识、理性、思维等等。人不断地创造各种类型的社会环境，即便于自己活动的各种人为的条件，同时也就改变了自己的本质。那种成为各种各样的幻想组合和形形色色的逻辑构成并在唯心主义者那里造成关于人类精神进步发展的观念的东西，其真正的核心、具体的理由、积极的基础正是这一点。

* * *

“使历史自然化”这个说法（如果从非常广泛的和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可以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模棱两可提供理由，而且它是以应有的谨慎和在非常相近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一个词）却言简意赅，包含了对一切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因为唯心主义观点解释历史的前提是：劳动和人的活动同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和自由愿望构成一个整体。

对神学家来说，把人类的事业和事件的整个过程归结于统一的计划或方案，是方便的和没有困难的，因为他们完成了从一定的经验向统治宇宙的假想精神的飞跃。法学家可以首先在构成他们研究对象的成规中发现某种指导线索，使人可以看到一些形式如

何明显地连续不断地代替了另一些形式，于是在过去和现在都比较容易地把关于能思想的理性（这是他们的职业）的概念拿去解释极为广泛的和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政治活动家自然是根据一定的经验行事，这些经验证明国家的统治者或者在臣民大众的同意下，或者利用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矛盾，能够提出一定的目的并实现自己的愿望、打算和计划。这些政治家喜欢把人类行动的不断扩展仅仅看作是各种各样的愿望、打算和计划。而现在我们的学说使神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假设的基础本身革命化了，确信人的劳动和活动 in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般总是同给自己提出一定目的的人的意志、事先考虑好的计划和选择手段的自由远远不相符合，也就是说，它们同能思想的理性不相符合。在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人干出来的，而除了极少的例外，历史事件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批判的选择或基于理性的意志的结果。相反，正是由于必要性，由需要和客观因素促成的人的活动创造了经验，并引起外部器官和内部器官，包括智力和理性（它们也是重复的和积累的经验的結果和后果）的发展。对走上历史发展道路的人如何得到全面发展这一问题所作的解释，已经不是假设，不是单纯的猜想，而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对产生进步的历史过程所拥有的种种条件，现在可能有种种解释，而且我们对历史发展的一切词义解释的总轮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清楚了。我们的学说坚决地和彻底地否定各种唯心主义，因为它明显地否定一切形式的唯理论，如果唯理论这个词是作为这样一种概念来理解的话，即根据这种概念，事物在它的存在和发展中或明或暗地适应一定的规范、思想、某种尺度、一定的目的。人类行为的整个过程是人们自己借助于在变化的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创造的条件的总和，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条件。但是，它既不意味着接近事先预定的目的，也不意味着放弃完美和幸福这些最初的理想。进步本身只

能带来经验论的和由种种情况所决定的关于事物的观念。目前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明确和清楚了，因为根据以往的发展，我们能够评价过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预见或预测未来。

(五)

这样就可以消除严重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危险。有人努力给自己提出这样的目标：使在运动中被考察的人类历史事件的整个总和服从于严格的和彻底的**决定论**观念，这种努力是合理的和有理由的。相反，把这种有反映的和具有复杂性质的**决定论**同直接的生存斗争——这个斗争是在不受连续的劳动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状况下进行的——的**决定论**混为一谈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对历史进行下述解释是绝对有根据和正确的，那就是从意志——它似乎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阶段都可以随意指导人类生活——的预想的行为出发，来考察意志的每一个行为的客观动机和原因，而这些动机和原因应当在环境、地域和人所掌握的工具的种种条件中、在由情况所制约的经验中去寻找。然而相反地，把那种用自动论偷换唯意志论的理论作为根据而力图根本否定意志的存在看法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归根到底，自动论象唯意志论一样，无疑都是完全荒谬的。凡是生产资料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地方，凡是人为的环境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地方，凡是社会差别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为多少巩固的或不巩固的国家组织创造了必要性、可能性和条件的地方，必定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预先的打算、政治方案、活动计划、法的体系，然后出现一般的和抽象的原则。在这些派生的、复杂的、以及我可以称作第二性的现象和过程当中，又产生出科学、艺术、哲学、教育和书本的历史。对那些现象本身，唯理论的拥护者和不了解它的真正基础的唯心主义者过去和直到现在

一直给予它一个特殊的名称，叫作**文明**。因为实际上过去和现在有一些人，特别是职业学者，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神职的人员，都发现在有反映的、第二性的文明成果的小圈子里过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能够使其余的一切服从于他们在这类状态中得出的主观看法。一切种类唯心主义的根源和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学说坚决克服了一切唯心主义教条的观点。在预先经过考虑的计划、政治方案、科学、法的体系等等可以成为解释历史的手段和工具之前，它们本身就需要说明，因为它们是一定的条件和情况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过是一种外观、肥皂泡。如果说事物产生于其他事物并由其他事物构成，那么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实际并不存在。许多世纪以来，它们曾经被不科学的意识，甚至被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科学意识看成是唯一真正存在的事物，这是不足为奇的。

* * *

但是，以上所述还不是全部。我们的学说可以赋予想象以意志，并为直接对立的新思想体系提供条件和论据。它诞生于共产主义进行搏斗的战场。它以现代无产阶级出现于政治舞台为前提，必须具备弄清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的能力，从而使我们能够批判地描述资产阶级的整个起源。它在两个方面是革命的：一是因为它发现了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道路；一是因为它对过去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达到某种紧急关头的阶级对抗中发生的一切其他的社会革命，竭力去寻找它们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另外，在这个学说看来，正是这类紧急关头构成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在两个这种关头之间的间隔时期内发生的过程可以——至少在目前——让职业叙述学者去研究。作为革命的学说，我们的学说首先是对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合理认识。按照我们的看法，在这个运动母体中早已孕

育着共产主义出现的前提。社会主义死敌反对我们的学说，把它说成是一种似乎只有科学的外表而实际上是人人皆知的社会主义空想的再版的观点，这是不奇怪的。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能发生，而实际上有时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对历史研究方法一窍不通的人的想象力和宗教狂热者的热情甚至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去寻找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并在它的基础上创立具有系统性，即概括性，换言之，具有倾向性和偏见性的新历史哲学的动因和理由。这里需要最大的谨慎。我们的智力很少安于严格的批判的研究，总是倾向于把任何一个思想发现变成刻板的因素和新的烦琐哲学。简单地说，甚至唯物主义历史观点也可以变成抽象推论的形式并使得旧的偏见以新的形式复活；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抽象的证明、解释和推理来研究历史的偏见就是这样。

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为了不再间接地和隐蔽地重现某种形式的目的论，应当弄清两个问题：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历史条件都是由具体的情况决定的；到目前为止，进步在自己的道路上总是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因此它始终是局部的和有限的。

* * *

人类只有一部分——而且直到不久前还是不大的一部分——在自己的内部发展中走过了所有的发展阶段。因此，最先进的民族已经达到了现代市民社会，并具有在科学发现基础上创立的先进技术和同这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切政治的、精神的、道德的和诸如此类的结果。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直到今天，除了英国人，还生活着象史前人那样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前者把欧洲生产手段带到新荷兰³⁴并在那里建立起工业中心，这个中心由于它的竞争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重要地位；后者则已经濒于绝种，不能适应那种没有在他们那里生根而与他们并存的文明。

在美洲，特别是在北美，导致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连串行动，始于从欧洲输入植物、家畜和农业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在古代曾经创造了许多世纪的地中海文明）；但是，这个运动在美洲仅限于征服者和殖民者后裔的小圈子，而土著人或者通过种族的自然混合而同化于外来人，或者绝种和完全从地球上消失。前亚细亚和埃及——它们在古代作为我们整个文明的摇篮开创了巨大的半政治的组织，这些组织经历了我们从可靠的传说中知道的历史的最初阶段——许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出它们保存着僵化的社会形式，不能独立向前发展和过渡到新的发展时期。它们遭受了几世纪的野蛮军营的压迫，即土耳其的统治。在这个裹足不前的人群中通过隐蔽的途径渗进了具有某种现代性质的行政制度，以及——只是为了贸易——铁路、电报这些欧洲银行征服者的有效的前哨。所有这些裹足不前的居民群众可以期望，只有推翻土耳其的统治，由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或保护通过一切可能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征服手段逐渐代替它之后，才能重新获得生命、活力和运动。落后的和停滞不前的民族的改造过程可以通过外部影响来实现和加快，这一事实在印度得到证实。这个自身还有活力的国家，现在在英国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国际活动，甚至提供自己的精神创造的成果。但是，这不是具有现代历史特点的唯一的对比。例如，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并竭力进行模仿的日本，不到三十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明，从而推动了这个国家的自身力量在后来正常地向前发展，而俄国靠强权进行扩张，把里海对岸的广大地区拖进现代工业、甚至大工业的影响范围。到最近一些年，偌大的中国及其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制度几乎一成不变，中国的任何变化都非常缓慢。同时，整个非洲由于人种和地理方面的原因，在文化方面几乎仍然是无法渗透的地方，而且直到最近试图占领它并使之殖民化的时期，只有它的沿海地区才受到文明的影响，好象我们甚至不是生活

在葡萄牙人的时代，而是生活在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的时代。

人们在自己的历史发展和史前发展道路上的这种分化，只要我们能够把它同限制劳动进化的自然条件和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是完全可以说明的。美洲的情况正是这样。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那里只有一种谷物禾本科植物——玉蜀黍，只有一种可以驯化和使役的牲畜——羊驼。我们可以感到满意的是，欧洲人不仅把自己的人和工具，而且还把犏牛、驴、马、小麦、棉花、甘蔗、咖啡、最后还有葡萄藤和橙子树运进了美洲，从而在那里建立起生产商品的新社会——这个社会以空前的速度走过了两个发展时期，即最可恶的奴隶制时期和最民主的雇佣劳动制时期。但是，在那些发展过程出现真正停顿的地方，甚至有资料证明出现退步的地方，如象前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这种停顿是不能用自然条件的特点来解释的。我们在这些地方碰到的问题，只有通过对社会制度进行直接的和深入的研究才能解决；同时，对社会制度应当从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从它的形成的内部过程，另一方面从不同民族的利益在我们通常称为历史斗争舞台的领域内的复杂交错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最文明的欧洲由于传统的连续性显示出自己发展过程的十分完满的公式，以致于到目前为止人们都按照这个模样来设计和建立一切历史哲学体系；西欧和中欧本身曾经产生资产阶级时代，过去和现在一直力图通过不同的、直接和间接的征服手段把这种社会形式普及到全世界；就是这个地方在自己的发展水平方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各种民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结合体似乎也形成多级的阶梯。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相对优越，以及某个国家同其他国家进行的经济交换具有比较有利或不利的条件，都取决于这类差别。冲突和不同的斗争形式，条约和战争以及其余的一切，即曾经研究过从文艺复兴时代和——当然，越来越可靠的说法

是——从路易十四和柯尔培尔时期起的政治历史的历史学家能够或多或少向我们讲述的东西，过去和直到现在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可见，甚至在欧洲本身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高度发展，如象英国；而其他一些地区还保留着发达的或衰败的手工业，例如从巴黎到那不勒斯，如果我们愿意从两个极端表现来看这个事实的话。有的国家农村几乎完全工业化，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农民无所事事地混日子，过着具有许多传统形式的愚昧的乡村生活，意大利和奥地利就是这样，而且奥地利比意大利更严重。有的国家政治治国——这是了解自己事业的资产阶级的平庸意识所应有的，因为它本身实际上已经赢得了它所占有的地位——是通过最可靠的方法，通过毫不掩饰的非常明显的阶级统治形式来实现的（当然，任何人都会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法国）。在另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旧的封建习俗、新教的虚伪和资产阶级的怯懦——资产阶级利用有利的经济形势，而不赋予它以革命精神和勇敢——使**现存的国家**有可能保持虚假的外表，似乎它执行着道德的使命（啊，愚蠢的顽固不化的德国哲学家在端上国家道德，而且是**普鲁士国家**的国家道德这道菜时，什么倒胃口的和难消化的佐料都用上了！）。在那些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不参加资产阶级运动的国家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也到处扎下了根，例如在不幸的波兰，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以间接的方式渗入，例如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国家。

但是，最明显的对照（它似乎是为了以扼要的形式把历史过程的一切阶段，甚至最极端的阶段提供给公众进行总的评论）是俄国。这个国家没有能够走上大工业发展的道路（大工业实际上现在才开始发展），因为它没有以它的“令人神往的”沙文主义从西欧，主要是从法国，夺取货币手段，却徒劳地竭力从自己身上，即从

有五千万农民在旧经济形式条件下无所事事地混日子的广大领土上吸取这些货币手段。目前，俄国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为了变为拥有现代经济的社会——这个社会也许会给相应的政治革命准备条件——，必须摧毁土地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残余（在这里不用去争论关于这种共产主义在它的起源上是否同原始共产主义有直接联系还是它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派生的问题），而这些残余直到最近还以非常典型的形式和如此大的规模保存着。俄国应当资产阶级化，为此，它应当首先把土地变为本身能够生产商品的商品，同时把农村的昔日的村社社员变为无产者和贫穷者。相反，我们西欧和中欧正处在俄国刚刚开始的发展过程的对立的极点上。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道路上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已经走过了自己发展的这么多的阶段，所以不是由于科学的组合而好不容易地在学者头脑中复活的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在无产阶级当中燃起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社会主义在总的轮廓上已经表现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南，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斯拉夫国家里由于确定不移的规律的支配而灭亡的东西的重复。

* * *

从我所列举的这些例子——这些例子不是我故意挑选的，而是我几乎偶然地和杂乱地想到的——，我再说一遍，从这些在论述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地理学的书籍中能够无限伸延下去的例子中，还有谁找不到明显的证据来证明历史条件完全决定于它们的发展形式呢？不仅种族、氏族、民族和国家，而且民族的一些部分和国家的不同地区、等级和阶级，似乎都处于一个很长的阶梯的各个不同的台阶上，或者处于一条表示长期的和复杂的发展过程的曲线的各个点上。历史的发展形式对一切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样的。普通的世代交替永远不是发展过程的稳固性和强度的标志。时间

作为经过大致相等的时间间隔的年代和世代相传的抽象尺度，不会提供任何标准，不会指出任何规律或过程。到目前为止，发展的形式是不同的，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发生的事件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发展形式之间，有相似之处，甚至其动因也相似，换言之，类型相似，也就是有一致的地方；因此，先进形式能够通过一般的接触或暴力来加速落后形式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弄清楚，进步——这个概念不仅是经验主义的，而且总是由种种情况所制约的，因而是有限的——并不象命运和厄运，或者作为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律，关照人类事业的进程。因此，我们的学说的目的不是把人类的整个历史描绘成一幅单一的情景，也就是随着相应的变化来重复从圣奥古斯丁到黑格尔或者从先知但以理到德·鲁日蒙先生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把整个发展过程说成是按照事先确定的道路进行的。

我们的学说并不妄想通过抽象的方法揭示出某种伟大的计划或想法，因为它只是一种研究和解释的方法。马克思说他的发现是一种指南，这不是偶然的。³⁵正是因此，这个学说同达尔文主义类似，达尔文主义也是一种方法；这个学说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适用于现代的、有利于谢林及其战友的结构和结构性自然哲学的再现。

* * *

天才的圣西门第一个指出，进步的概念本质上具有某种相对的和受种种情况制约的东西。他的这个观点反对在很大程度上由孔多塞达到顶峰的十八世纪教条。这个教条可以称作是划一的、均衡化的和形式的东西，因为它认为人类发展过程总是沿着同一条上升线进行。圣西门针对这一教条提出自己的理论，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精神的一些能力和特性总是被另一些所代替和补偿；可见，他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为了弄清进步的相对性的真正原因，需要做完全不同的事情。首先必须放弃那些认为只是各种自然条件妨碍人类的单一形式的发展的错误观点。这些障碍或者是很成问题的（我们以种族为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些种族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掌握着成为历史种族的天然特权），或者（正如从地理差别方面看到的）不能说明在同一个自然环境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原因。历史运动正是在自然障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或由于创造了下代人能够继续发展的人为环境而明显减少的时刻发生的。因此，显而易见，后来常常遇到的妨碍单一形式的进步的东西，应当在社会的社会性结构本身的内部条件中去寻找。

到目前为止，这种结构是在某种政治组织的形式中完成的。政治组织最终力图在平衡中保持经济的不平等，因此，正如我多次指出的，这样的组织具有始终不稳定的特点。自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历史就是设法建立国家或已经建成国家的社会的历史。国家意味着或者正处于白热化时刻、或者前不久被平定、或者暂时平息下来的内部斗争。国家还意味着为了征服其他民族而使其他国家殖民地化、或者到其他国家市场上抛售产品、或者输出多余人口等等所进行的外部斗争。国家意味着这样的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是因为它首先是社会的比较大的一部分与同一个社会的其余部分进行斗争的机关和工具，因为它实际上依赖于以比较直接的和明显的形式实现的人对人的经济统治。这些统治形式决定于，生产及其自然资料和人造的工具的某一个发展阶段是需要露骨的奴隶制、农奴制还是自由雇佣劳动。这种由矛盾构成的、以国家为依托的社会总是意味着——虽然它们的形式各不相同——城市和乡村之间、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无产者和主人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等等以致于无限的对立。这个社会总是通过各种复杂的和独特的道路走向教阶制度，不论是建筑在中世纪那样严格的

特权的基础之上的教阶制度，还是象现在这样的由经济竞争的自动作用所引起的而形式上却人人平等的隐蔽的教阶制度。

我可以称为精神、智力和思想的教阶制度（它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的东西是同这种经济教阶制度相适应的。换言之，从唯心主义者观点看来是进步的最终结果的文化，由于实际生活所造成的必然性，过去和现在都分配得极不平均。多数人由于本身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而变成不完整的、片面的和不能全面地和正常地发展的个人。阶级心理是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教阶制度相适应的。所以，我们认为进步的相对性质是阶级矛盾的必然后果。在阶级矛盾中包含有一些障碍，而整个社会的相对退步、直到它的退化和灭亡的可能性的原因，也就在于这些障碍。标志着科学胜利的机器，由于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矛盾，成为使千百万已经自由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无产阶级化的一种工具。在城市里创造了各种舒适生活条件的技术成就，更加突出了农民状况的卑微和可怜，使城市下层居民的状况更加恶化。知识的一切成就过去和直到现在都只能造成狭窄的学者等级的特殊化和人民群众同文化的日益分离，而人民群众却在每天不间断地劳动，从而养活着整个社会。

进步过去总是，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局部的和片面的。与进步有关的少数人硬说，这是人类的进步，而进化论的傲慢的拥护者把进步说成是人类本性的发展。整个这种局部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是在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以对抗为基础的，因此，经济矛盾造成一切社会矛盾，少数人的相对自由造成多数人受奴役，而法律成为不公正的捍卫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进步，并对它得出明确的概念，那么进步在我们看来就是人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整个物质不平等的道德的和理性的综合。

为了揭示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相对性质，必须使共产主义从最

初作为被压迫者心灵中产生的本能运动变为一种科学和政治。其次，还必须使我们的学说用特殊的评价标准来看待过去的全部历史，并在社会组织——它过去和直到现在总是由矛盾形成和构成的——的每种形式中发现在为人类的普遍和单一形式的进步创造条件方面所存在的先天性无能，换言之，发现那些使益处变为害处的障碍。

(六)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对**历史因素**的信念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用语经常出现在许多学者和哲学家的著作中，也出现在一些历史事件的评注家的著作中。他们在评论或对比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不加修饰的叙述，并把他们关于存在许多因素的论点当作一种假设来运用，认为这种假设有可能从一大堆乍看起来和最初考察起来似乎根本看不清的和十分难以分析的人类活动中找出头绪来。这种信念，这种非常普遍的论点，对好发议论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对唯理论者来说，成为一种半教条，人们近来把它作为反对唯物史观一元论的决定性论据而多次提出来。不仅如此，这个信念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这种论点已经流传很广，以至于人们只有把历史看作是各种因素的冲突和交错才能理解历史，以至于那些谈论社会唯物主义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不论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还是敌人，都相信能够消除一切困难，并说什么这种学说的实质最终在于认为**经济因素**具有主导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重要的是弄清这种信念，或这种论点，或这种半教条是怎么产生的，因为真正的和富有成果的批判主要在于弄清楚和弄明白，我们认为是错误见解的那种东西的产生原因。随便宣布某种观点是错误的，这还不能说是驳倒了它。科学上的错误产

生于对不完全的经验的某个方面的误解或者产生于某种主观上的缺点。光是否定错误见解是不够的，应当对它作出正确的说明，从而战胜它和根除它。

* * *

每一个历史学家在着手写自己的著作时，可以说，总要做一番抽象化的工作。他首先似乎应当把事件的长链条拆开，然后把各种各样的前提和先例抛到一边，甚至把错综复杂的结构加以分解和肢解。为了动手写，他还必须确定出发点、方针、自己研究的范围；例如，他可以说，我打算写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是怎么开始的，或者，我要研究一下路易十六是如何决定召开三级议会的。简单说来，讲述者要去综合已发生的事件和正在成熟的、总的说来具有一定轮廓的事件。任何一种叙述的方法和风格都取决于他所采取的这种立场，因为要着手叙述就必须从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出发，而这样才可能考察这些事件的后来的发展。

但是，对这种事实的综合必须作一定的分析，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分出事实的不同方面或相互影响的因素——它们后来在某个时候会表现为独立的范畴。它们包括：一定形式的和具有一定权力的国家；通过命令和禁止而确立一定关系的法律；向我们展现出人们的希望、需要、思维、信仰、想象的种种风俗和习惯；总之，这是生活在一起并在某种义务和职业的分配的基础上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其次，它们包括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们在共同生存的条件下和相互冲突中通过一定的途径产生和发展的思想、观念、倾向、热情、愿望和希望。任何一种正在发生的变化都从经验主义的综合的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或者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它的一切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国家扩大自己的疆界或改变它对社会所处的地位，扩大或缩小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义务的范围或改变利用它们的形式；或者法律改变自己的准则或在新的机构中得到表现和巩

固；最后，或者在外部日常习惯的变化中隐藏着属于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的人的感情、思想和志向的变化。社会的不同阶级总是互相混同，经历内部的改变，改变它们所占据的地位，融化或再生。为了理解所有这些具有我们一眼便可以看到的外部形式和轮廓的现象，只要有正常人的一般能力就够了。所谓正常人，我是指那种还没有以真正的科学为依据的人，还没有以科学来纠正和补充的人。把所有这些变化收集在一起，并把它们放进严格划定的框框里——这是朴素叙述的真正目的。这种叙述愈是专门论述某个题目，它就愈明确，愈令人信服和突出；例如，修昔的底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是这样。

社会已经以一定的方式形成，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已经非常复杂，以致于掩盖了作为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石的经济基础。对这样的社会，一般的讲述者看到的只是它的可见的和令人注目的表现，它的最明显的结果，即象政治形式、法律和党派的激情那样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标志。且不谈缺少关于历史运动的真正根源的理论，讲述者在事实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本身——他只是根据这些事实在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外形来理解它们——使他有可能只根据自己的直接的直觉把这个过程引向统一；如果他是艺术家，那么这种直觉在他的头脑里就带上了某种色彩，变为戏剧动作。如果他能够收集一定数量的事实和事件，对它们综合地进行准确的描述，使人能清楚地看到它们，就算大功告成了；同样，如果纯描写性的地理著作的作者以生动而又清晰的笔法概括了一切地理条件，例如，决定那不勒斯海湾外貌的地理条件，而不深入研究它的形成的问题，那么他也算是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这种对生动的记述型叙述的需要也是所有那些最终导致下述抽象和概括的首要原因。（这种原因是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的，我可以说是几乎带有美学性质和艺术性质的。）这种抽象和概括最终导

致一种关于各种所谓的**因素**的半学说。

这里有两个杰出的人物——格拉古兄弟。他们想停止侵占国家土地的过程，并阻止大地产的发展，因为大地产导致小私有者即自由人的阶级削弱或完全消失，而他们是古代城市的民主设施的基础和条件。格拉古兄弟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他们的目标是清楚的：他们的思想倾向、他们的出身、性格，他们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揭示了这个目标。另一些有不同利益和其他思想倾向的人反对他们。一开始，我们看到冲突是意图和激情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借助国家这种政治形式以及使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所提供的手段而发展和结束的。这些事件借以发展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城市以不同的方式统治另一些完全丧失自治权的城市和地区；在居统治地位的城市本身——罗马，居民有贫富的严格区分；最后，除了少数压迫者和有全权的人之外，还有大批正在丧失或已经丧失城市贫民所固有的意识和政治力量的无产者，因此他们容易被人引入歧途并被腐化，很快最后完全被瓦解，成为受贵族剥削者所奴役的附属品。这就是讲述者所掌握的材料；如果他不注意事实本身所处的直接条件，他就无法提出某种因素的概念。我们的视线所及的这些条件的统一性构成历史事件发展的舞台，为了把它们叙述得有声有色和有联系，并使人看得清楚，必须采用综合的方式和方法。

这也就是产生下述**抽象法**的首要原因，这种抽象法使一定社会综合体的各个不同方面一点一点地丧失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简单方面的质，并且由于它们逐渐被概括而引出一种假想因素的学说。

* * *

换言之，可以说，这些因素通过对明显的事物运动的直接方面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并且与其他一切用经验论的方法得出的概念具有同等价值。不论这些概念在什么科学部

门出现，它们都被保存下来，直到新的经验出现才化为乌有并且被消除，或被更一般的概念——它反映被概括的现象的起源和进化，并将具有辩证的性质——所吞没。

人的头脑在从事经验分析和直接研究某种一定的现象（例如热的现象）的原因和后果的时候，一开始就设想和确信：他可以并应当把这些现象说成是热，也就是这样一种主体；虽然还没有被任何一个物理学家看作是某种真正物质的东西，但是，无疑已被看作是一定的特殊力量。难道这一切不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想出来的热到了一定时刻由于有了许多新经验而在一定条件下变成了一定量的运动。另外，目前科学的思想正在走向把所有这些想出来的物理因素溶化在包罗万象的能量洪流中；同时，原子论只要是必要的和有用的，就会丧失它先前所固有的形而上学的一切痕迹。

作为研究有机生命问题的第一个阶段长期停留在研究个别器官和它们的系统化上面，难道不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没有这些看起来甚至完全是物质的和粗糙的解剖工作，这个科学部门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在那以前，在许多被分析的事实——它们的产生和结合还不为人们所知——上面耸立着生命、灵魂等等模糊不清的一般观念。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其他出路，人们在所有这些思想的产物中寻找生物学上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只是在最近才由于发现细胞的产生和内部细胞分裂的过程而找到了明显的证明。

当然，人类思想为了弄清心理生活的所有现象——从最简单的基本感觉到它的派生的最复杂的产物——的起源所必须走的道路是比较艰难的。不仅因为有理论性的困难，而且还由于有其他普遍存在的偏见，心理现象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直到赫巴特，似乎都被看成是被分离的和被分解的大量因素，即所谓的精神能力的东西。

在说明社会历史过程时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而在这里，不得不在开始时停留在对因素的初步考察上。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再来研究因素在后来的理论中出现的原因就容易了：这个原因在于记述型的历史学家已经感到，需要在他们以或大或小的艺术才能和为了作出某些有教育意义的结论而描述的事实中，去寻找研究明显的历史事件运动所能提供的直接方针。

* * *

但是，在这种明显的运动中毕竟还有一些迹象可以说明有可能走出这种历史观的框框。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些同时起作用的因素——抽象法把它们分离出来，然后把它们孤立起来——当中的任何一个因素表现出完全的独立性。相反，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式产生出关于它们相互作用的概念。此外，它们产生在一定的时刻，只是后来才具有某种历史叙述中所描写的那种形式。大家知道，国家是在一定的时候出现的。关于每一种法律制度，我们或者是根据可靠的材料知道的，或者设想它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关于许多习俗，人们都记得它们是在一定时候形成的。最后，可靠的事实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现的现象的最表面的对比，使人能够看到，整个社会，即由各个阶级构成的社会，过去和现在如何不断地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无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看不到这个作用，甚至无法写出对事实的最简单的叙述——，还是关于这些因素的产生及其后来的变化的比较精确的资料，都已经向科学研究和科学思维提出了远比伟大历史学家们——同时也是真正的艺术家们——的叙述性著作所满足的要求高得多的要求。实际上，当历史资料研究中自然产生的问题同其他理论成分相结合的时候，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所谓实际的学科。这些学科从古代到现代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并取得各种成就：从伦理学到法哲学，从政治学到社会学，从法学

到政治经济学。

其次，随着这么多的学科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同样不可避免的分工，各种观点纷纷出笼。在初步和直接分析那些通过经验获得的关于社会总体的许多不同方面的资料之前，无疑应当进行长期的局部的抽象化的劳动，而其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确立一些片面的观点。这一点，在法律学和包括法哲学在内的法的领域内从事综合的各种学科中，可以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里以更清楚和更明显的形式得到确认。由于在局部的和经验的分析时必然要进行的这种抽象化，由于分工，社会总体的不同方面和不同表现有时以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形式固定和巩固下来。人类活动的成就和结果——法、经济形式、行为准则等等——似乎得到了新的表现，并变成位于人本身之上的法律、无上命令和原则。所以人们有时不得不重新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通过一定的联系而联合成一定形式的社会的人是唯一不变的和可靠的事实，即任何单个的实践学科由以出发和援引的唯一事实。对种种历史事实和现象提供解释的各种学科最后导致必须建立一般社会科学，它可以把一切历史过程理解为完整的、统一的历史过程。这种理解的最后极限即顶峰，是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

* * *

但是，对复杂现象进行初步的和片面的分析所花费的时间，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说是浪费。我们认为由于方法上的分工才有了准确的知识，即大量经过精心挑选的、系统化的、得到说明的资料。没有这些资料，任何社会历史都必定徘徊于纯抽象的领域，只保持一种形式主义的性质，只研究术语学的问题。对设想的社会历史因素的专门研究，正象任何不超出明显的事物运动范围的经验主义研究一样，完善了我们的观察工具，并使我们能在用抽象方法人为地加以孤立的现象本身中，发现把它们同整个社会连接起

来的联系。现在当我们给自己提出任务要恢复人类过去生活的某个时期时，对各种不同的学科（关于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的假说把这些学科看成是彼此孤立的和独立的），由于它们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它们所收集的材料和所制定的研究方法，我们有必要熟悉它们。如果没有片面的语文学（它是任何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我们的历史科学可能会怎样呢？如果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无所不包的优越性的执着的信念（它不仅产生了一般法学和法哲学，而且还产生了如此大量的问题，以致于最后从中产生了社会学）不能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到何处去寻找法律制度的历史（它又是研究其他许多事实及其关系的出发点）的线索呢？

* * *

由此可见，人们在各种著作中经常谈论的历史因素归根到底是某种比真情差得多而比普通的误解（如果按平常的意思来理解这个词，可以理解为错误、幻想和错觉）强得多的东西。因素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的必然成果。想要描写这些因素的人认为人类的事业呈现出一种模糊不清的景象，而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景象中为了要弄清情况就产生了这些因素。后来这些因素作为名称、范畴、指南而为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的分工服务。直到今天，人们始终以这种分工为背景从理论上研究整个社会历史材料。在这个知识领域，也象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实际原则的统一性和形式理解的统一性从来不是从一开始，而只是在漫长的艰难的道路的尽头才揭示出来。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恩格斯把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同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相类比是非常恰当的。

* * *

如果我们不仅想要研究纯粹的理论，而且想通过亲身的研究来说明某个一定的历史时期，那么，我们即使只承认解释历史的严格的一元论原则，但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要求借助种种所谓的因

素的简单而又方便的公式来预先确定方向。由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有责任进行直接的详细的研究，我们首先必须考虑这样一些事实：只要我们没有超出直接经验的范围，我们总是把它们看成或者是最突出的，或者是独立的，或者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如果以为我们当作我们总的历史观基础的非常明确的一元论原则可以象护身符那样，总是明显地作为把庞大复杂的社会机体分解为简单的构成部分的绝对正确的手段，那是不正确的。经济结构作为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并对它们起决定性的作用，不是直接地和似乎自动地产生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的简单机体。从这个基础向其余一切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微妙的和曲折的，不是总能够被揭示出来。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社会机体的特点是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这对所有的人来说只有到了不稳定性进入我们称之为革命的尖锐时期才看得清楚。这种不稳定性同有组织的社会内部所发生的不间断斗争是分不开的，所以它使人们不可能达到长期的和持久的和谐和安宁的阶段，这个阶段似乎可能使人返回动物生存的阶段。进步的主要原因在于矛盾(马克思语)。另一种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这个必然以统治和服从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稳定的社会组织中，理智和思维不仅总是发展得不均衡，而且还极为不充分，不相称，不全面。从过去到现在，在社会中似乎一直存在着理智以及感情和思想的教阶。有人认为，人们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如何最明智地行动，这种想法等于设想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某种不存在的东西。

从过去到现在，各种法的形式、政治行动和建立某种社会制度的尝试有时成功，有时失误，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与具体现实是不协调和不适应的。历史充满着错误；这就是说，如果历史上的一

切,在人们克服了困难或解决了种种问题的一定智力发展水平上,是必要的,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么,从大发抽象议论的乐观主义者所赋予合理一词的意义上来看,并不是一切都是合理的。决定社会变化的原因即变化了的经济条件,最后迫使人们去寻找,有时是通过非常曲折的道路去寻找相应的法律形式、适当的政治制度和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社会适应手段。但是,不应当认为:能思想的动物的本能智慧曾经或正在直接地表现为对一切情况的充分而清楚的理解;我们只要简单地用演绎法从经济状况中引出其余的一切就行了。无知——这本身也是有原因的——是历史朝着不同道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无知,还应当有远没有被战胜的粗暴的动物本能,以及情欲、不公正和各种形式的道德败坏;所有这些东西曾经是和继续是按照人统治人是必然的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必然产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扯谎、伪善、无耻和下流是同这种统治分不开的。我们不会变成空想主义者,只是由于我们是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所以我们能够预见并真正预见到将来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它脱胎于现代社会,而且脱胎于它的对抗性,由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最后将摆脱阶级矛盾而达到联合。这种联合本身的功能就是调节社会生产,使生活从历史上至今以各种复杂的意外事件和事故的形式出现的盲目偶然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这是未来的事情,而不是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如果我们象我们正在做的那样把经济结构这一社会基础的形式改变(包括最简单的标志——生产工具的改变)看作是一条指南,从而打算洞察发展到现代的历史事件,那么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的一切困难,因为这不是单纯地认清事件的流向问题,而是要花最大的思考力来了解直接的经验给我们提供的复杂的丰富多采的画面,以便把它的基本因素归纳为一个起源系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坚信,如果我们从事某种具体的历史研究,我们

就必须把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彼此孤立的事实，那些五花八门的事件，一句话，那种对历史的经验主义的研究——它对后来变为半教条的因素产生了信仰——当作它的出发点。

这些实际的困难不能用关于所谓**社会机体**的假说来克服，因为这种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比喻的性质，常常允许模棱两可的解释，最终只具有类比的价值。但是，人类的思维也曾经必须经历这种后来很快就蜕化为平庸的空谈的假说。这是因为把社会比作机体会使我们接近于把历史运动理解为社会本身的内在规律所产生的运动，这样就排除了自由意志、一切先验的和非理性的东西。而这种比喻的意义也不过如此而已；只有对历史事实和现象作专门的批判研究，注意它们发展的一切条件和情况，才是全面发展经济唯物主义所必需的具体而实在的知识的唯一源泉。

(七)

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从梦中得到的。

思维方法的变化——不久前产生了一种历史学说，这种学说在本文中是我们进行初步研究和探讨的对象——是逐渐进行的。开始是缓慢的，后来当人类历史进入重大的政治经济革命时期——如果从政治形式来看，可以称它为自由主义时期，如果从其内在本质来看，由于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可以称它为生产无政府状态时期——就发展得越来越快。社会思想领域内的变化，直到建立新的思维方法，每前进一步都反映着新生活的经验。正象这种经验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革命中，随着它对本身的直接条件有了实际的清楚的理解而逐渐抛弃了神话般的、神秘的和宗教的外衣一样，从理论上总结了这种新生活的人类思想也从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假说中解放出来，并最后提出了如下的平淡要求：在说明历史时，只须研究起规定作用的条件和被它们所规定的后果之

间客观存在的联系。唯物主义观念标志着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的这种新流派的高峰,因为它不是一般社会学或一般国家的、法的和历史的哲学的一个局部,而是一种学说。这种学说驱散了研究人类历史哲学的其他形式所固有的一切模糊和怀疑,并为全面解释人类历史奠定了始基。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创造这种学说的原理)的前辈之所以很容易发现——特别是象某些庸俗浅薄的批评家所做的那样——,原因就在这里。在他们的拥护者中,即使是最严格遵循他们的观点的拥护者,有谁曾经想到要把这两位思想家当作奇迹创造者呢?另外,如果有人希望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产生的前提,他不仅必须研究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先驱的人(包括圣西门和更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研究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解剖生产商品的社会经济学家,还必须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本身,并且最后郑重地宣布,理论是它所说明的事物的再现。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近代史的事件是真正新学说的前奏。近代史从英国十八世纪末发生的工业革命,法国发生的举世闻名的社会大变革起就非常明显地和公开地显露了自己的本质。后来,这两个事件在整个文明世界不断重复,但已有相应的变化,方式有所不同,形式也没有那么尖锐。实际上,思想实质上是什么,难道不是有意识的和有系统的经验的补充?经验是什么,难道不是在我们的意志之外或作为我们的活动的结果而发生和发展的现象和过程的反映和思想上的加工?最后,天才是什么,难道不是根据经验在某个时代的许多人的头脑中产生的那种思想的特殊的、彻底的和尖锐的形式(不过这种思想在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那里是零散的、不全面的、不明确的、动摇的和局部的)吗?

* * *

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另外,它象人类活动的任何其他

成果一样，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在它的出现的条件十分成熟的时候，在某些需要的影响下和作为满足这些需要的多次努力的结果形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发现了某些证明方法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有助于思想制造的工具。要知道，思想必须以一定社会条件的存在为前提并具有自己的技巧；思维甚至也是一种劳动形式。把这两者即思维和思想同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分割开，就意味着歪曲它们的本质和意义。

我的第一篇文章的任务是要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正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两位作者个人的、可以商榷的意见，而是思维的新的胜利。这种胜利是新世界产生过程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后果。换言之，新的历史环境有相应的思维工具作为自己的补充。

如果现在想象精神活动的这一成果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这就等于在自己的科学探索中把荒谬当作常规。任意地把思想从产生它的历史土壤和历史条件移到其他任何土壤上去，就等于把某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当作自己立论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曾经产生过希腊艺术和科学以及罗马法的古代城市在保持奴隶制民主的性质的同时也可以创造和发展现代技术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呢？为什么不可以想象，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既能保持自己的死板的和停滞不前的结构，即自己的本质，而又能在缺乏不受任何限制的竞争的条件（这种竞争的条件正是随着行会的崩溃和灭亡而开始形成的）下着手征服世界市场呢？为什么不可以假定，封建领地既能保持自己的封建性质，而又能变成只生产商品的企业呢？为什么当时米凯莱·迪·兰多不应当写共产党宣言呢？为什么不可以假定现代科学的发现可以成为任何其他国家和时代的人们的思维成果，也就是说，可以出现在一定的条件产生一定的需要之前，而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求助于已经

积累的经验呢？

我们的学说的前提是：现代技术以及在对抗性竞争状况下生产商品的社会（这一社会以私人占有形式的资本积累为自己形成和进一步存在的必要条件，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无产阶级并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而不得不不断革新自身的工具以及国家和它的法律机关），获得广泛的、有一定目的的和不断的发展。这个社会由于自身运动的规律本身而暴露出它自己的内部结构，产生了起反作用的唯物主义观念。正象它产生社会主义，即自己的实际的否定一样，它使得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作为这个社会的理论上的否定而问世。如果历史之所以不是人们活动的任意产物，而是人们活动的必然的和自然的产物，正是因为人们在发展，他们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经验，而社会经验是随着人们不断改进劳动并积累和保存劳动的成果和结果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情况正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可能是最后的和最终的，而它所固有的内部矛盾构成了产生新条件的力量。因此，十八至十九世纪经济和政治大革命时期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如下的两个观念：关于历史发展过程是内在的和不间断的概念和实质上是**社会革命的客观理论**的唯物主义学说。

* * *

勿庸怀疑，深入到各个世纪的深处，有意地以思维方法重现社会思想的发展史（根据书面史料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极有教益的工作，它尤其能促使我们开始对我们的观点和行动越来越采取批判的态度。这样一种使思想转向它的历史前提的做法，如果不把我们引入渊博学识的经验主义的密林，也不诱使我们去进行未经思考的和莫名其妙的类比，无疑必定会赋予我们的科学活动的形式以灵活性和信仰的力量。由于存在几乎不间断的传统，我们现在实际上可以从我们的知识的总和中吸取不仅在新时

代,而且在以前的历史,从古希腊(因为正是从古希腊开始,整个人类思维的自觉的、一贯的和有系统的发展才无疑开始带有继承性)以来所发现和证明的一切东西中最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利用早已发现的和经验过的手段,我们在科学研究领域就一步也不能前进;逻辑学和数学所提供的手段就属最具普遍意义之列。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等于承认,每一代人都应当再返回到人类的童年,一切从头开始。

但是,无论囿于城市共和国的狭窄范围的古代作者,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永远动摇于假想返回到古代和需要从思想上理解诞生的新世界之间的作者,都注定不能达到准确分析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而无与伦比的天才亚里士多德也只能在**作为市民的人**的生活范围内指出并理解这些因素。

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越来越深入、强烈并带有多方面的性质。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同时人们还开始在不同的名称(自然法、法律精神和社会契约)之下试图分解曾经孕育过我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的那种生活的多方面的、不尽明显的画面,找出原因、因素、逻辑的和心理的现象。所有这些学说,不论它们的创造者的主观愿望和意图如何(我们可以举出保守主义者霍布斯和无产者卢梭的直接对立的观点作为例子),从其实质和后果来看,都是革命的。人们肯定可以从这些学说的基础上发现,新时代的物质需要和道德需要是促使它们形成的动力和动因。在那种历史条件下,这些需要曾经是资产阶级的需要;因此,人们应当为自由而同传统、教会、特权、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阶级即等级进行斗争,从而同曾经是它们的创造者或似乎是它们的创造者的国家以及在商业、手工业、劳动和科学方面存在的特权进行斗争。因此,它们抽象地考察人,也就是说,用逻辑的抽象方法把单个人同他们的历史联系

和必要的社会属性分割开来进行研究。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分解为许多原子，而多数人认为把社会只看作单个人的总和是很自然的。在解释所有的人的活动时，突出的或占首位的是个人心理的抽象范畴；所以，在所有这些臆造的体系中只谈恐惧、自爱、利己主义、自愿服从、追求幸福、人的善良本性、协议自由，以及道德的意识、本性或道德感和诸如此类的抽象的和一般的东西，似乎用这些东西就足以解释那个时代的具体的历史，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完全新的人类历史。

由于整个社会充满着严重的危机，对从古代继承下来的、陈旧的、传统的和许多世纪以前组织起来的東西的仇恨，对整个人类存在行将革新的预感，最终完全压倒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古代哲学家差不多已经提出过，并且在十九世纪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那个革命唯理论时期只有为数不多的信奉者，例如维科、孟德斯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魁奈。这个产生过敏锐的、机智的、毁灭性的、渗透各处的和非常普及的著作的历史环境，正是路易·勃朗不无夸张地称之为个人主义的那种东西产生的原因所在。从此以后，许多人相信，这个术语表达了人类不变的本质特性；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一点首先能够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力论据。

这是多么独特的景况，多么独特的对照！资本，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总是要破坏束缚它的桎梏，清除自己道路上的障碍，力图战胜一切先前的生产形式，也就是说，力图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在社会中争得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后来，这种情况造成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除了一切形式的现代贫困和新教阶制度之外，出现了历史上最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一方面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现在统治整个社会，另一方面是单个企业、工厂和工场的生产组织中的铁一般的专制！而

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通俗思想家只看到自由和平等！他们全都是用一种方式考虑问题，他们全都是从同一个前提出发，而不论他们是否得出结论，认为应当期望专制君主制赐给他们自由，也不论他们是民主主义者或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谁也不怀疑，只要把教会和国家粗暴专横地强加给本质善良和趋向完美的人的束缚和桎梏清除掉，普遍幸福的王国很快就会到来。这些桎梏在当时并不是人们由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它必然是对抗的，因而是摇摆的和曲折的）而无意识地陷入的那些条件和领域（我们由于客观的历史科学的胜利最后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它们只是普通的障碍，人们正确地使用理智就必定会摆脱这些障碍。在法国大革命的某些英雄们身上得到充分表现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中，包含有对整个人类的无可怀疑的进步的无限信心。关于人的观念第一次以其最完整的形式出现了，而不掺杂任何宗教的思想和假说。这些唯心主义者当中的最坚决者恰恰是极端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否认宗教幻想的一切臆造，但并不怀疑，这个地球是为幸福而创造的，只有理智为幸福开辟道路。

* * *

思想从来没有象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那样遭到平庸东西的如此恶劣的和野蛮的对待。真正的现实所提供的教训是非常严峻的，并引起不少可悲的绝望，接着在人们的思想中出现了根本的转变。简单说来，事实同一切假设相矛盾；最初，这种情况导致失望的思想家灰心丧气，但是尽管如此，它不能不引起对新的探索的追求和需要。大家知道，圣西门和傅立叶是如何坚决起来造反的：前一个人反对法学家，而后一个人反对经济学家。正是在十九世纪初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对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革命的直接结果的反动（这种反动带有超越自己时代的天才们所固有的片面性）。

实际上，那些具有先前时期特征的横在走向自由道路上的障

碍一清除，就会有另外的常常是更加严重的和麻烦的障碍取而代之。人人同样幸福的局面并没有达到，社会的政治形式仍然是维护不平等的组织。可见，社会似乎是一种独立的和自然的东西，是关系和条件的综合，它的运动的根源在它本身内部，它不理睬它的个别成员的善良的主观愿望，不理睬唯心主义者的幻想和计划！可见，社会走它自己的道路，我们能够揭示它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但是不能把这些规律强加给它！由于在思想界发生了这种转变，十九世纪宣告它不愧为历史科学和社会学的世纪。

的确，思想通过发展的原则贯串了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在本世纪里人们发现了历史规则并找到了神话起源的钥匙。在本世纪里人们发掘出史前时期的胚胎遗迹，第一次确定了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的各种政治形式和法律形式的继承性。本世纪宣告自己是以圣西门为代表的社会学的世纪。在圣西门的观点中混杂着许多矛盾倾向的萌芽，这是天才的自学者和先驱者的特点。在这一方面，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的成果，同时是科学形成的整个过程的完结；唯物史观作为结果和补充，也是整个历史科学和整个社会学的简化，因为它把我们从派生的现象和复杂的条件引向社会的基本职能。而这一切都是在重大新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发生的。

* * *

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规律战胜了一切幻想并显示自己是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原则。最初在英国启蒙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证明，如果不能把社会各阶级看成是自然的产物，那就更没有理由认为它们的出现是偶然性或自由意志的结果；它们由于社会原因，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产生于历史过程中。实际上，谁没有亲眼看到随着小私有者（小农和小手工业者）阶级的破产而出现新的无产阶级？有谁看不见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是怎么形成的，有那么多人被迫沦落到他们的地位？有谁看不见变为资本的货币如何通过吸引

自由人的劳动（因为许多具体法律条文和暴力的剥夺或间接的剥夺逐渐使得这些人不得不出卖自己以换取工资）而在短时期内取得了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谁看不见在工厂周围出现了新的城市，而在城市郊区麇集着绝望的穷困（它们现在已经不是个别人不幸的结果，而是财富的条件和源泉）？许多妇女和儿童命定要遭到这种新时代特有的穷困，他们第一次摆脱自己无声无息的愚昧生活，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不祥地展示出“平等人”的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谁不知道——即使尊敬的马尔萨斯的所谓理论没有宣布这一点——，这类经济组织可能吸收的人数经常是太多了（虽然有时对那些在生产顺利的条件下需要人手的人来说是不足的），因此他们找不到雇佣的地方并开始构成对现存制度的危险？此外，很显然，在英国进行的急剧的、猛烈的和剧烈的经济改造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对欧洲其余地区的前所未有的垄断，为了维持这种垄断，需要进行不择手段的政治。这种政治可以使一切人一劳永逸地把关于国家应当是人民的监护者和指导者的唯心主义神话翻译成平淡的语言。

直接考察新生活的这类后果曾经是从德·麦斯特到卡莱尔这些已逝的颂词作者的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悲观主义的源泉。十九世纪初，思想界和著作界充满了对自由主义的讽刺。那种以整个社会学为基础的对社会的批判开始了。首先应当战胜那种以许多关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学说作为集中表现的意识形态。应当开始面对事实，而造成生活的剧烈变化的发展的强化过程，以全新的和如此吓人的形式引起人们对这些事实的注意。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欧文。他在一切方面都是举世无双的。在解释新的贫困的原因方面，他的洞察力特别令人震惊，而他在寻找消除这种贫困的途径方面却很天真。应当客观地批判西斯蒙第以片面的和反动的形式最早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个建立新的历

史科学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期，许多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空想的、片面的或简直是幻想的）纷纷出现，并且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学说当中没有一种学说曾经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因为无产阶级或者完全没有政治觉悟，或者（如果有政治觉悟）无产阶级运动是断断续续和不经常的（1830年至1848年法国的密谋和起义就有这种特点），或者无产阶级运动建立在立即改革的实际基础上，如象宪章派。而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是空想的、幻想的和抽象的，但都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的、常常是天才的批判，而归根到底是片面的批判。这种批判需要总的历史观念作为科学的补充。

所有这些局部的、片面的和不完善的批判形式实际上都被科学社会主义所吸收。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从外部转向事物的主观批判，而是对那种包含在事物本身之内的自我批判的发现。对社会的真正的批判是社会本身。社会由于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之上，在本身内部就产生矛盾，然后通过向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矛盾。这个矛盾注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不管无产者本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正象他们的贫困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的明显的条件一样，无产阶级本身和他们的贫困则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过渡中，即从主观思想的批判（这是从外部考察事物并以为批判本身能够对事物进行纠正的批判）到对自我批判（这是社会在本身的内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的）的理解的过渡中，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吸取的**历史辩证法**。最后，如果那些只赋予“辩证法”一词以一种内容，即把它同诡辩术的巧妙手法混为一谈的著作家，以及那些本质上不能跳出只熟悉被经验主义方法所分解的个别事实的范围的学者和博学者，全都不能理解思想的这种隐蔽的和复杂的形式，那么这就不值得一提了。

* * *

但是，曾经为建立现代社会（资本的统治在其中几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提供过材料的经济大变革，如果没有法国革命的孕育着灾难的狂风暴雨充当它的明显的说明，就不可能那样快地发生作用，不可能成为那样有教益的教训。革命象悲剧一样，已经非常明显地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力量，因为这个社会通过旧的社会形式的废墟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在一个短时期内急速地走过自己产生和形成的阶段。

革命是由障碍引起的。资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来克服这些障碍，因为有目共睹，由旧的生产形式向新的生产形式（或财产形式——这是法学家必然使用的专业行话）的过渡不可能是和平的和平静的，不可能通过不断的和逐步的改革来实现。因此，革命意味着起义，意味着旧制度的一切先前的阶级的冲突和混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阶级的急速的剧烈的形成。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很短的、然而事件层出不穷的时期内，在十年内完成的。这十年在我们看来等于其他时期和其他国家的通常历史的几个世纪。从前在几个世纪内发生的事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集中爆发，显示了新的社会或现代社会的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和方面；这些特点和方面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于战斗的资产阶级已经为自己创造了思想资料和根据它的行动制定理论的机关。这种理论是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资产阶级运动的意识的反映。

暴力剥夺大部分旧财产（这部分财产是以采邑、王公的封地和掌握在死人手中的土地为形式的不动产），剥夺各种各样的土地权和个人权利（它们来源于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一切把巨大的经济资源都交到国家的手里，因为国家由于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变成拥有独特权限的威严而万能的政府。其结果，一方面建立起特殊的、以自我消灭而告终的阿西涅³⁶财政制度，另一方面出现

新的所有者，他们是靠交易所内的得手和投机倒把的走运而发迹的。在这之后，当不久前获得的稳固的所有权非常明显地以善于从已形成的幸运情况中捞取利益为依据时，谁还敢崇拜神圣的古老财产制度呢？如果许多不安的哲学家，从诡辩论者起，一度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权利是人的有利的和方便的创造，那么从此之后被人鄙视的异端者的这种设想甚至会被巴黎郊区的最下等的穷苦人看作是普通的和不言而喻的真理。难道无产者他们没有同普通人民的其他代表共同给他们在1789年4月的早期运动以革命的推动吗？难道他们后来在1795年牧月起义³⁷失败后不是似乎又重新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吗？难道他们没有让那些宣讲自由和平等的激昂的演说家踏在自己的肩上吗？难道他们没有掌握过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比立法议会和整个法国都先进的机关的巴黎公社³⁸吗？难道当他们明白了新的统治者是他们自己亲手创造的时候，最后不感到痛苦和失望吗？对这种失望的闪电般的意识曾经给了巴贝夫的密谋以直接的心理上的猛烈的推动；正因如此，密谋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本身包含着客观造成的悲剧的一切因素。

从前似乎被采邑制度和死手权³⁹束缚于某种团体、家族、封号的土地，从自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变成了充当商品生产的基础和手段的商品；土地刹那间变成十分灵活的、有弹性的和方便的商品，以致于有利于以符号的形式进行的纸币流通。这些符号同它们应当代表的物品相比膨胀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它们最终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围绕着这些符号，各种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从一切方面，在陷入穷困的最不幸的人的肩上，在曲线政策和直线政策的细微差别中繁荣起来，特别是无耻地从战争及其光荣的胜利中捞到好处。甚至技术——它的发展加速了对它的迫切需要——的高速进步已经提供了事业发展的养料和有利条件。

资产阶级经济规律是在对抗的竞争条件下的私人生产规律，

它利用一切手段、力量和狡诈疯狂地反对革命政府的唯心主义方针。革命政府是强大的，因为它坚信它可以拯救祖国，尤其是因为它抱着一种幻想：它可以永远确定平等人的自由，认为借助于断头台可以消灭投机，用关闭交易所的办法可以消灭轻易发财的念头，通过规定必需品的**最低**价格来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商品、价格和各种事业拼命争取自己的自由，反对那些想要宣扬道德或把道德强加给它们的人。

热月——不论热月党人抱有什么样的个人动机，是卑贱的、胆怯的还是受人愚弄的——，由于它的隐蔽的原因并从它的最直接的后果来看，是各种事业对民主派的唯心主义的胜利。把民主主义思想曾经能够达到的极限记载下来的1793年的宪法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由于各种情况的严酷压迫，外敌入侵的威胁，国内各种暴乱（从吉伦特党人的暴乱到万第暴乱），必然出现掌握非常权力的政权，它本身就是由恐惧而产生的恐怖。随着危局的消失，恐怖的必要性也消失了，但是民主在创造了新所有者的所有权的各种事业面前破灭了。九三年宪法把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原则神圣化了。欧洲大陆的所有立宪制度都是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这部宪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保障了新的所有制的不可侵犯性。更换所有者，拯救所有权——这句格言，这个口号，这面旗帜，从1792年8月10日起，在许多年月里引起过狂热的起义，并促使那些试图建立道德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禁欲的社会的人制定了大胆的计划。督政府就是一条使革命否定自身这种唯心主义热情的途径。正是在督政府这个公认的和自己公开承认的行贿的时期，“更换所有者，拯救所有权！”这句口号变成了现实。最后，人们感到需要一种能够在大量废墟上建设起永久性建筑物的实际力量。这个力量体现在一个有无与伦比的天才的杰出冒险家的身上，他很幸运地当上了皇帝。他是唯一有足够的力量以适当的道

德来结束这场大屠杀的人，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恪守道德的痕迹。

在这场历史大风暴中什么事不会发生！那些曾经为保卫祖国而武装起来，在法国边境之外和欧洲邻国取得胜利，并随着征服而把革命带到这些邻国的公民，他们在本国变成了压制自由的兵痞。那些曾经洋溢着压倒一切的热情的农民，1789年在封建主的土地上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变为战士、小所有者或小租佃者，他们在短暂地成为革命的先锋卫队之后，接着又回复到他们那种默默无闻而又死气沉沉的平静生活。这种生活建筑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没有事件和运动，是所谓的社会制度的牢固基础。那些昔日的行会成员、小资产者在经济竞争的条件下很快成为手工劳动的自由提供者。贸易自由要求每种产品都变成自由出售的商品；因此，它克服了最后的障碍，达到了使劳动成为自由买卖的对象。

在这个时期一切都变了。过去若干世纪被千百万沉溺于幻想的人看成是神圣的机构或上帝的使者的国家，容许人们以最平凡的方式，即用断头台处死它的君王，从而丧失了神圣的光环，并具有了世俗的性质。国家本身变成了技术性的管理机关，在那里官僚制度代替了教阶制度。因为旧的爵位再也不能给有爵位的人提供占据国家要位的特权，所以这个新国家可以成为一切想占有它的人的猎取对象；简而言之，国家被拿去拍卖，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幸运的沽名钓誉者成为财产不可侵犯性和新老所有者的可靠委托人。新的国家为了变成以胜利的军国主义为基础的有秩序的官僚制度，它需要雾月十八日，这个国家用否定革命的行动来补充革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法典，它得到的法典就是民法典——生产和出卖商品的社会的一部宝书。难怪一般的法学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把那部罗马法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维护和解释，因为它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任何生产商品的社会法的典型的经典形式，一直

到共产主义消灭了买卖商品的任何可能性为止。

资产阶级由于一系列特殊情况的巧合并有许多其他几乎很快就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阶级和阶层的参加而完成了胜利的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刻参加战斗似乎是受各种原因所驱使，受到与那些长久存在和巩固下来的冲突后果毫无共同之处的思想所鼓舞。因此，经济基础在激烈的斗争中发生的异常迅速的改变被种种思想所掩盖，被错综复杂的各种打算和计划所遮蔽，这些打算和计划可以产生非常残酷的和空前英雄主义的行为以及许多幻想和带来失望的严峻考验。人类的心灵还从来没有对进步的理想抱有这样强烈的信念。那个时期的唯心主义曾经给自己提出如下的目的：首先使人类摆脱迷信，或者甚至摆脱宗教，使每个人成为公民，使每个私人成为社会活动者，然后沿着这个纲领所指出的道路，在短时期内、在几年内完成就是今天在极端唯心主义者看来也是好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的进化。那个时期的人们为什么应当憎恶断头台的教育作用呢？

这个无疑是宏伟而并不欢快的诗篇留下了一章非常低下的散文。这是由于走运而发财的所有者的散文；金融巨头、大发横财的承包人、将军、省长、卖身的记者、艺术家和作家的散文。这是一个奇异的人的宫廷的散文。他的军事天才和残暴性格无疑使他有权把每个不赞赏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事实的人贬为理想家，因为这些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胜利的十分严峻的反面（对他本人来说就曾经是这样）。

法国大革命加速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它成为我们称为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主义（英国的虚假的模仿除外）的一切东西包括意大利的统一（它曾经是，也许仍将是革命资产阶级的最后的行动）在内的源泉。这次革命最明显地和最有教育意义地说明了社会的改革过程，说明了那些在自己的发展时期把社会成员

直到今天一直被看作是主要的或唯一的**历史主体**。

大家知道,若干世纪以来,历史著作一直把上述社会生活的种种形式看成是人类发展的本质;而且只是把这些形式的改变看成是人类的发展。若干世纪以来,历史一直被看成是与政治和法的领域,甚至主要是与政治领域有关的一种学科。研究政治史问题的学者转向研究社会还没有多久,而且不久前才刚刚得出结论,认为在这里应当使用经济唯物主义的范畴。换言之,社会学出现得比较晚,所以我希望读者将会理解,我是为了简洁起见才使用这个术语来一般地说明关于社会的职能和变化的科学,而绝对不是实证论者赋予它的狭窄的意义上使用它。

大家本来都清楚地知道,直到十九世纪初,有关习俗、道德、信仰等等的材料,甚至与自然条件——它们是基础,是社会生活的形式得以发展的环境——有关的材料,在历史政治著作中只被描写成一种趣事或者某种次要的、附加的故事。

这一切不可能是偶然的,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因而我们对认识社会历史学问世很晚的意义倍感兴趣。第一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学说可以再次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利,第二是因为我们可以以此一劳永逸地抛弃所谓的因素。

* * *

自从有文字历史以来,国家,除了个别危机时期(这时社会各阶级由于无法通过适当的办法来保持相对均势的状态而进入比较长的无政府性质的危机时期),除了历史大动乱(由于这些大动乱,有时整个世界遭到破坏,就象西罗马帝国崩溃或哈里发国家解体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总是不仅被写成社会的顶峰,而且被写成社会的基础。天真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迈出的第一步反映在这样的表述中:谁是统治者,谁就是创造者。

其次,如果撇开某些在人民这个统治者的积极参加下实现的

认国家的职能的产生、发展、减弱、改变和更替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更替。第二，必须意识到国家的存在和保留仅仅是由于它要保护一定的利益——社会的一部分人反对社会所有其余人的利益，而这个社会整个说来应当安排得使被支配的、被压迫的和被剥削的人的反抗，或者成为分散的无数的小冲突，或者由于被分到被压迫者头上的局部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利益而有所缓和。因此，有奇效的、令人赞赏的政治艺术可以归结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用暴力或暴力系统对抗整个反抗。

第一步和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能够从产生国家的社会条件出发来说明国家的存在。这些社会条件本身后来被阶级理论明确了。阶级的产生过程决定于人们由于存在分工，换言之，由于估计到在一定生产形式的条件下把人们联合和联系起来的种种关系而从事的各种活动的性质。

从那时起，人们已经不再把国家（所谓的社会创造者）这个概念当作历史发展的直接原因，因为人们已经懂得，国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形式有什么变化，都无非是一种机构，这种机构以一定阶级通过暴力而实际建立的统治为基础，或者以各个阶级的一定的相互适应为基础。后来继续从这些前提出发，最后不得不承认，政治作为为了必需的目的而施加影响的艺术，在整个历史发展中起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并且在国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着相当小的作用，因为在国家里许多事物即许多关系是由于适应的必要性，由于默契，由于经受暴力或忍受暴力，由于直观地寻找出路而产生和发展的。

无意识的统治——这是指那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本意、有意地或自由选择地去追求的一切，而是预先规定好的，是由于习惯、习俗、各种适应性等等的不断更替而发生的一切——在构成历史学对象的知识领域内是非常普遍的；至于曾经应当解释一切的政治，

现在它本身已经成为需要解释的对象。

* * *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历史为什么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

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象许多空想主义者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超级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不过是社会机体上或自由联合组织的一块息肉或附属品。如果说迄今为止社会产生了国家，那么这是因为社会本身需要这种力量和权力的补充，是因为社会是由因经济差异而不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国家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它是保持均势或者用暴力和镇压制造均势的力量体系。国家为了作为这样的力量体系存在下来，还必须具有经济威力，不论是通过掠夺或征战，即战争赔款，还是依靠直接占有领土，或者象具有所谓自动捐献的假立法形式的现代税收制度所允许的那样，通过逐渐积累资金的办法。现代国家迅速发展的这种经济威力是它们能够行动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新的分工，国家的职能决定着特殊等级即特殊阶层包括寄生阶层的产生。

具有和必然具有经济威力的国家——因为它为了保护统治阶级必须掌握资金来实行镇压、实现统治、进行管理、进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必然会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总的新的私人利益。

因此，国家为了维护由经济差别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而产生并存在，从而产生了与它的存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的集团。

由此造成了两个后果。由于社会不是某种清一色的整体，而是由各个器官构成的机体，另外，由于国家反映着敌对利益的复杂的综合体，所以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的统治者力图把自己孤立起来，而这种孤立使得它自己同整个社会相对立。其次，也常有这样的情况：最初是为一切人的福利而创造的机构和职能后来却蜕变了，只被用来为某些集体、或集团、或奸党的利益服务，出现

了种种滥用权力的现象。由此就产生了掌握政权所需要的贵族和官吏，由此就产生了王朝；所有这些东西的出现，从单纯的逻辑来看，是完全不合理的。

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国家时而加强、时而削弱自己的权力，但它始终存在，因为在因经济差别而彼此不平等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里，始终存在着种种这样的原因；需要通过暴力或掠夺来维持和保持奴隶制或垄断制，或者借助人对人的统治来维持和保持一种生产方式对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优势。因此，国家似乎成为不间断的内战的战场，这种内战一直不断地进行，虽然并不具有象马利乌斯和苏拉的战争、六月革命或美国北方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那样明显的形式。营私舞弊总是盛行于国家内部，因为如果不存在那种似乎不会遇到反抗的国家形式，也就不存在那种由于迫切的生活需要而似乎不可能蜕化为逆来顺受的反抗。

由于这种种原因，如果从普通的千篇一律的叙述出发来观察历史事件，似乎它们是几乎不变的同一个东西的重复，好象一种形象在万花筒中变来变去。难怪概念论者赫伯特和怨恨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曾经得出结论说，历史中没有真正的发展；翻译成普通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历史是一首枯燥的歌。

如果使政治历史显现出它的精髓，那么国家的平庸本质也就暴露无遗。在这里再也没有任何神学的神化的痕迹，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理想化的痕迹。这种理想化曾经在某些德国哲学家那里十分流行，他们认为，国家是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一种观念，国家是个性的充分揭示，他们还深信其他的胡说八道。实际上，国家是保证和保护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实际保卫体系，不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某一种经济生产方式还是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的结合和联合。简单地说，国家的前提或者是一种所有制体系的存在，或者是不同所有制体系的结合。这就是一切要求国家本身经

济上强大并掌握资财和手段来保证财产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的统治术的基础。当由于生产方式的剧烈的和强制的改变而不得不在所有制方面进行不寻常的和特殊的改变(例如,废除死手权和封地,废除贸易垄断)时,旧的政治机构就站不住脚了,就有必要进行革命来建立能够实现经济变革的新机关。

* * *

整个历史,除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的历史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换言之,那些对某个社会内部矛盾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由于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而总是愈来愈复杂。上面谈到的引起冲突的两个原因是相互制约的,但表现的方式总不相同。例如内部困难常常促使某个社会或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

不同社会之间的一切关系的主要动力从其产生时起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广泛意义上的贸易,即交换,不管情况象贫困的部落那样只用多余的东西去交换其他的东西,还是象今天这样,大量产品只是用来出卖,以便从一定数量的货币中得到更多数量的货币。这些在普通编年史中一个个积累和堆积起来的大量内部的和外部的的事件,使得解释和简述它们的历史编纂家不知所措,以致于显然是无所适从地无休止地试图建立人为的编年史范围和时期,并勾画出历史发展的总前景。其实,谁能够用心观察不同社会形态的内部发展过程,分析它们的经济结构,谁把政治事件看成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力量的活动的结果,他就最终能够克服由经验主义的复杂多样和模糊不清的认识所造成的混乱,他不是简单地写编年史和断代史或一般地勾画前景,而是具体说明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

* * *

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想法面前，一切以国家的道德使命的原则或任何其他类似原则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都站不住脚了。如果可以这样来表达的话，国家具有自己固定的地方，而且作为这样一种形式似乎处于社会发展的范围之内，这种形式是由其他条件造成的，而且由于它本身存在的事实自然又对其余的一切发生影响。

在这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种形式会不会有完结的时候？也就是说，会不会有无国家的社会存在？或者说，社会能否成为无阶级的社会？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将来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生产形式和这样一种劳动和义务的分配，使得造成人压迫人的一切不平等都不可能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些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因为它并不把共产主义生产阶段的来临看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目标，而认为它是历史发展内在过程的结果。

这种预见的前提在于现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本身，这一点人们已经非常清楚了。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地使生产方式社会化，使手工的和有细则规定的劳动愈来愈服从于技术的客观条件，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天天愈来愈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这些人由于成为股东或从事股票倒卖活动而愈来愈脱离直接的劳动过程，而劳动的领导权则转入知识分子的手中。随着由于自己所处的劳动条件和生存条件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逐渐地意识到这种状况，随着资本家愈来愈难以领导生产劳动，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由于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地租、利息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生产无论如何会转入集体的联合组织手中，也就是说，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生产。到那时，一切不平等都将消失，除了由于性别、年龄、气质和能力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不平等；换言之，与经济阶级的存在有联系的、甚至由这些阶级所造成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都将消失；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不再应当是人压迫

人的工具。知识分子的技术领导和教育作用那时将成为社会体制的唯一形式。

这样一来，科学社会主义——至少目前在理论上——战胜了国家，从而使这个学说的维护者有可能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国家产生的渊源和它自然消亡的原因。他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不象古代昔尼克派、斯多葛派和各种伊壁鸠鲁派、后来的宗教宗派或各种秘密协会的乌托邦，以及近代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止一次地片面地和主观地反对国家。相反，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国家，而是力图证明国家在不断地反对它自己，因为它创造了它所必需的手段，例如巨额的财政、军国主义、普选权、普及文化等，也就创造了毁灭自己的条件。社会产生了国家，又把它吞食掉，换言之，作为一定生产方式的表現的社会既然消灭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那么随着无产者和决定他们生存的种种条件的消失，人对人的任何依附也就消失了。

这样一来，国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条件——从它在经济差别开始出现的公社中产生，直到出现它消亡的苗头的时候——使我们理解到国家的本质。

国家只不过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必要补充这一观点，永远排除了它是独立的历史因素的假说。

现在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法曾经怎样上升为决定性的社会因素，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上升为历史性的因素。

首先应当记住这种关于一般法的哲学观点是怎样形成的。这种观点是把历史看作完全依赖于立法本身发展的一个过程的那种理论的主要依据。

* * *

随着封建社会早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些地区开始瓦解，同时随着作为参加公会和行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共和国的公社的

产生,罗马法就已经被袭用了。罗马法在各大学里大放光彩,而且由于它是在同野蛮人法典⁴⁰和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教会法⁴¹的对抗中产生的,它无疑反映了一种比较适应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的思维形式。

的确,罗马法与封建割据不同,与反映野蛮民族的习俗、或者等级特权、或者教皇和皇帝所恩赐的优惠权利的法不同,它似乎具有无所不包的书面理性。既然任何人都可以承担义务和责任,可以出卖、购买、出让、赏赐等等,难道罗马法不是从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关系上来考察人的个性吗?因此,虽然最后定稿的罗马法曾经是卑躬屈节的法学家按照皇帝的命令制定的,但它在在中世纪制度瓦解的条件下毕竟表现了革命力量,并作为革命力量而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进步。这部法典是包罗万象的,它掌握了推翻野蛮人法典的手段,所以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人的天性的,而且它由于反对私人权利和特权而具有自然法的性质。

自然法的意识形态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种意识形态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不过远在这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准备了一种以罗马法为基础——采用它,修改它,按照自己的观点解释它——的法学。

在自然法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当中还有另一个因素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这就是后来各个时代的希腊哲学。大家知道,善于发现象科学这样的思维的具体形式的希腊人,从自己的许多地方法律出发,不曾创立出符合于我们称之为法学的学科。然而,由于民主共和国的发展所带来的抽象思维的迅速进步,他们能够在其他民族之先很早就开始在逻辑学、雄辩术和教育学的关于法、国家、法律、惩罚的本质方面进行了非常大胆的探索;这就是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哲学中发现后来一切讨论的萌芽形式的原因。但是只是到了很晚的时期,即希腊化时代,当希腊人的生活圈子已经扩大到能够同

文明世界的生活圈子相融合的时候，即在这种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去发现人们需求的世界主义环境的条件下，产生了法的唯理论，即斯多葛派哲学所赋予的那种形式的自然法。希腊人的这种唯理论的个别形式上的因素在合理地编纂罗马法时已经使用过，而这种唯理论到十七世纪又重新出现在关于自然法的学说中。

可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和赋予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以法的形式工具，有着不同的来源。

实际上，这种法的意识形态在争取和反对法的斗争中反映着资产阶级思维的革命时期。虽然最初它的立足点，从理论观点看来，是要返回古代哲学的传统和概括罗马的法学，但是从其余方面和它的自然发展的性质来看，它是真正新的和现代的东西。

至于罗马法，那么虽然现代哲学流派对它进行了概括并作了某些修改，但终究仍是一些个别情况的汇集，这些情况并没有根据一定的早已制定的体系用演绎方法加以推论，也没有经过善于系统整理的立法者事先加以分类。除此之外，斯多葛派及其同时代者和后来者的唯理论具有直观的性质，没有在自己的周围产生革命运动。相反，最终获得了法哲学称号的自然法的意识形态却建筑在一定体系的基础之上；它总是从一般理论原理出发，此外还具有好斗的和论战的特性，甚至同正统、偏执、特权、等级作斗争；换言之，它为争取今天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自由而斗争。

在这种成为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存在的条件下，认为存在与理智构成一个整体的法的观点第一次以非常明确的具体方式出现了。人们进行斗争加以反对的那些法被看作是偏执、退步和迷误。

对唯理论的法的信仰产生了对立法者的力量的盲目信仰。这种力量在法国大革命的危机时刻具有极其狂热的性质。

由此人们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整个社会应当服从一种法，就

是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并在一定体系、逻辑和一贯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由此人们又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法可以保证人人法律上平等，能够订立任何性质的契约，享受自由。由此又产生了其他等等。有人说，真正的法胜利了，理智也必然获胜，那时用对一切人是同一的法来管理的社会将是完美的社会！

用不着去谈论这些倾向是以一些什么样的糊涂观点为依据。我们已经知道人的这种全面的解放曾经导致了什么结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信念都是在关于法的这种观念之上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个观念，法被看成是同产生它的原因完全脱节的。例如，上述思想家所要求的理智只是归结为使劳动、联合、贸易、政治形式和意识从一切限制和妨碍自由竞争的一切障碍中解脱出来。我已经谈到，我们在这方面可以从上个世纪的大革命中吸取多么有教育意义的经验。如果在我们的时代还有人顽固地证明唯理论的法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换言之，说这种法是什么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素**，而不是简单的事实，那么这就证明，他们不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和平均财产的**法典编纂**实际上标志了自然法这整个学派的终结。

* * *

在我们的世纪，终于成功地用各种方法把法从唯理论的东西变成事实的东西，从而变成同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东西。

首先应当考虑到，对历史的兴趣已经更加广泛和深刻，它促使科学的思想承认，只把理性看成法的来源，以及局限于仅仅分析罗马法，对理解法的起源都是不够的。这样，野蛮人的法典、唯理论者非常轻视的那些民族和**社会的道德和习俗**，又受到尊重（我是指**在理论方面**）。这曾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只有研究了最古老的形式，才能找到理解最新的形式如何形成的**钥匙**。

编纂成法典的罗马法是非常现代的形式。罗马法当作万能的

主体加以规定的个性是军事官僚机构压倒社会关系的世界主义的最近时期的产物。在那个书面理性被确认的世界里，没有留下人民生活无拘无束的一点痕迹，再也没有民主了。其实，这种法在被这样固定化之前，已经问世并得到了发展。如果从它的起源和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它，特别是，如果在这方面采取比较的方法，那么它在许多方面同那些被人看成是低下的社会和民族里存在的制度有相似之处。因此十分清楚，关于法的真正科学只可能是法本身的起源史。

但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民法的编纂标志着资产阶级实践理性的典型和样板已经在欧洲大陆建立的时候，英国不是已经存在着另一种独特的法形式吗？这种形式从产生它的社会的种种条件本身中产生并得到非常实际的发展，没有一定的体系，没有受有系统的唯理论的任何影响。

可见，实际存在的和具有一定价值的法，不象书面理性、统治者的理性的热心推崇者所想的那样，是非常普通的和朴素的东西；不过，可以原谅他们的糊涂，因为他们是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应当用法律设施的历史来代替意识形态。法哲学同黑格尔一起终止了；如果有人打算拿出黑格尔以后出版的书来反驳我，那么我就回答他们：已出版的哲学家的著作绝不总是思想进步的标志。例如，法哲学正在变成对法的历史的哲学解释。至于历史哲学如何导致了经济唯物主义，批判的共产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成为黑格尔学说的直接对立面，在这里用不着重复了。

* * *

这种仅仅在思想领域中进行的革命实际上只是那些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发生的革命的精神反映。

在我们的世纪，立法活动已经成为真正的灾难，占统治地位的法意识形态的理性被议会所推翻。阶级利益的矛盾在议会中以

政党的形式表现出来，各个政党支持或反对这些或那些法。这就是整个法或者被看作是普通的事实，或者被看作是有用或无用的东西的缘故。

无产阶级奋起进行了斗争，所以凡是在工人的斗争具有一定形式的地方，资产阶级的法典就显然完全站不住脚了。例如，书面理性无力使工资摆脱市场的不稳定性，使妇女和儿童免除工厂里的繁重劳动条件或找出什么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光是部分缩减工作日这一个问题就成为大规模斗争的导火线和原因。大小资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工业家、穷人的律师和积累起来的财富的辩护人、保皇派和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和反动分子——他们都力争把社会机构的活动纳入这种或那种方向，并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势和议会阴谋，以便通过解释现存的法或者建立新法来保护某些利益。这种新的法不止一次地被修改，并可以发现非常怪诞的摇摆：从通过保护穷人甚至保护动物的人道法律，到实行关于军事野战法庭的法律。法的面具被撕掉了，它已经成为最普通的东西。

我们逐渐获得了经验，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非常正确的、同时也是非常朴实的公式：每一种法过去和现在都是保护一定利益的工具——无论是通过寻常的办法，或者采取暴力手段，或者借助于司法机关；而从这里到从经济中引出法，就只差一步了。

如果说唯物主义观点在近代能够把所有这些倾向归纳为一种明确的和严格的体系，那是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规定了它的方向。无产阶级世界观既是一切人形式上平等、而社会各个成员的发展和自由的物质条件不平等的这样一个社会存在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它存在的必要条件。无产者是使积累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并变为新的财富的力量；但是他们本身不受资本的控制和从属于资本就不能活命，他们随时都可能变成失业者、穷光蛋和流亡者。他们组成社会劳动大军，但是他们的司令官却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体

现着对法的王国中的公正的否定,换言之,他们是所谓理性王国中的不合理的因素。

可见,历史不是什么必然导致理性对法的统治的过程,它曾经是、并且迄今仍然不外是压迫和奴役形式的交替和更替。因此,全部历史就是利益的斗争,而法是那些占了上风的利益的权威性的表现。当然,这些原理不允许通过直接考察法所表现的利益来说明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一个特定的法。历史现象十分复杂;但是,根据这些一般原理可以勾画出现在已经代替了法的思想体系的科学研究的性质和方法。

(九)

在这里,谈几条结论性的原理是适当的。

在发展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种种条件的基础上,第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消费品的生产方式在这种人为的环境中直接规定着社会成员的全部其余的实际活动,以及这种活动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过程中的不同形式的发展。这就是阶级的形成、冲突、斗争和消灭,法和道德领域的协调关系的相应发展,以及一些人通过暴力和强力控制另一些人的种种原因和形式,也就是所有最终构成国家的基础和本质的东西。第二,经济结构规定着艺术、宗教和科学领域中想象的和思想的方向和(一定的程度上是间接的)对象。

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产物,由于它们造成一定的利益,产生一定的习俗,把人们联合在一起并规定人们的愿望和倾向,所以具有作为独立的现象巩固下来和孤立起来的倾向;由此,开始出现了一种经验论的观点,它认为,具有自己有效力量和自己运动节奏的各种独立因素,似乎可以促进历史过程的发展,以及不断地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种种形式的发展。

历史的真正的和肯定的因素——如果只应当使用“因素”这个词的话——从原始共产主义消亡时起到我们的时代止，始终是各种社会阶级，因为它们建立在不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利益则在对抗（由此产生冲突、运动、发展过程和进步）的一定现象和形式中表现出来。

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或那种改变，初看起来明显地表现在群情激昂中，有意识地在争取或反对某种法的斗争中得到实现，并导致一定的政治制度的毁灭和崩溃，实际上它只是非常恰当地表现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中。而这种关系是随着早已在劳动生产率和人们劳动过程的条件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

最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加者的平等地位之间的这些关系，随着生产所必要的工具（广义的）改变而改变。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任何另一种发展和进步的过程的显著标志和条件。

社会对我们来说是某种相当大的东西，我们只有通过把复杂的形式化为最简单的形式、把现代形式化为最古老的形式的方法，才能把它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不过，我们这样做不能超出现存社会的范围。

历史不外是社会的历史，换言之，是从原始群体开始直到现代国家，从使用少量的和最简单的工具直接同自然斗争到以积累的劳动（资本）和活劳动（无产者）之间的两极对抗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结构的人们共同活动变化的历史。把社会现象的整个综合体归结为简单的个人，然后在自由的和任意的思维活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它，换言之，把社会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是不理解历史过程的客观本质和内在规律。

革命从广义来说，以及从具体意义来说，都意味着推翻某种政

治制度,这是历史时代的真正界石。如果从远处来看,从革命的构成因素、它的酝酿过程和它的长期表现的后果来看革命,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有种种微小变化的不断演进的一些瞬间;但是,如果从本质上来看革命,那么它是一种表现非常明显的灾难,而它只有作为一种灾难才具有历史事件的性质。

(十)

这么说来,道德也好,艺术也好,宗教也好,科学也好,因此都成了经济条件的产物吗?甚至成了经济条件的不同范畴的标志吗?换言之,成了物质利益的点缀品、辐射和反映吗?

这种用非常粗糙的和直线的方式表达的说法,早已在人们中间流传开来,并给那些把这些说法当作方便稻草人的唯物主义的敌人帮了忙。在知识分子的所谓代表中也有一些为数不少的懒汉,他们象那些为自己的无知寻找避难所的头脑简单的人一样,情愿满足于接受这些说法。它们对所有懒人和不善于思考的人来说,该是多么方便和开心的事,似乎有一天可以用几句话总结出整个认识的科学,然后通过唯一的一把钥匙就能打开生活的所有奥秘!把伦理学、美学、语言学、历史批判和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唯一的一个问题,以逃避一切需要绞尽脑汁的东西!对科学一窍不通的人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可能把整个历史降低为算术,而对但丁作出的某种新的独出心裁的解释,会给我们提供一部以机敏的佛罗伦萨商人牟取暴利出卖呢绒的账单作插图的《神曲》!

换言之,问题在于,总结某些问题的理论论断,非常容易在那些不习惯于通过系统利用相应手段来克服思维困难的人的头脑中,变成庸俗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至于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具体方面,我只能简短地作一概述,因为我的确不打算在这篇短文中描述宇宙的整个来龙去脉,不期望它成为一部百科全书。

* * *

首先，谈一谈道德问题。

我不谈宗教的或哲学的体系或教义问答。这些东西过去和现在多半存在于世俗的人类事物的通常范畴之外，正象空想站在现实事物之上一样。我也不谈从诡辩论者到赫巴特如此精细地从形式上对伦理关系进行的分析。所有这些都是科学，而不是生活；同时是形式的科学，正象逻辑学、几何学、文法一样。最后一个给这些伦理关系下过深刻定义的赫巴特非常明白，思想即道德判断的形式观点，是软弱无力的。因此，他认为，伦理学的本质在于生活环境对生活的制约和教育对性格的陶冶。如果他不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就可以把他同欧文同等相看。

我要谈的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习惯、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道德。我要谈的是那种起着作用、即激发或抑制作用，具有不同发展阶段并表现得比较明显的、而在一切人和每个单个人那里却是零散地表现出来的道德；这是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类的交往中并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自然必须思考自己的活动和别人的活动，并作出某些判断和评价以形成一般原则的最初原理。

现实就是这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多样的形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这个现实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已经理解的那样，事实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至于各种体系，不论是神学的还是唯理论的，它们跟事实不同，可以是真实的或虚假的，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了解、说明并补充现象，揭示现象同另一个事实的因果联系或把它同事实统一起来。

这样，有关解释上述现实的预断理论的某些原则，现在可以认为是已经确立了。

那种仅仅证明还没有成熟的心理分析是软弱无力的自由意志，它的发明者们认为，意志本身并不存在，而且不是任意地表现出来。意志的表现既作为有意识的行动，是心理机构的特殊表现，首先是需要的结果，然后才是在它之前存在的一切东西直到最基本的和本性上的运动的需要的结果。

道德不是自行产生和自己制造的。因此，被叫作道德意识的那种精神本质，不是各种不断改变的伦理关系的无所不包的基础，它在所有人的面前并不是同一的和单一的。这种抽象的本质，正象所有其他的类似本质一样，换言之，正象一切所谓的精神能力一样，已经被批判所推翻。而事实上，如果把概括事实本身看作是解释事实的方法，难道能够认为这种说明事实的方法是正确的？人们什么时候这样断定过：感觉、感受、直观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象的影响，换言之，它们在不断变化，因而是想象在改变它们？那种被抬高为相应伦理评价的假设的所谓道德意识，就属于这类杜撰。实际存在的道德意识，是经验主义的事实；这是一个标志，即某个个人的伦理观点的表现。如果这也应当构成科学的对象，那么这种科学不可能根据意识来说明伦理关系，而应当弄清楚这种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意志的激发和道德决定于生活条件，那么伦理学总的来说只是一定的意识形态形式，因此它的任务同教育学所面临的任务是差不多的。

有这样一种教育学——我称它为个人主义的和主观的教育学，它从关于一切人都有能力成为完人的前提出发，创造了抽象的规范，处于形成阶段的人借助于这些规范似乎就可以成为强大的、英勇的、诚实的、正直的、善良的人等等，也就是可以获得任何德行，无论是头等的或二等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种主观的教育学本身是否能建立一种社会基础使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实现呢？

如果说它在建立这种社会基础，那么这只是一种空想。

实际上，整个人类在它的整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时间和可能进柏拉图或欧文、斐斯泰洛齐或赫巴特的学校。人类干的事情是它不得不干的事情。如果从抽象的观点来看人，一切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并能够完善自己的品德。而他们确实总是尽量这样做，并且注意到发展自己活动所处的生活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一词不是比喻，“适应”这一术语不是在转义上使用。事实上，道德在我们面前始终是受制约和受限制的东西，是某种试图通过制定空想计划，或者创造超自然的教育家或神奇的补偿来制胜想象的东西。

试问，为什么奴隶应当跟他望而生畏的主人有同样的观点，同样的爱好和同样的感情呢？农民怎么能够摆脱那种不可克服的迷信呢？这种迷信是他对自然的直接从属和他所不熟悉的社会机体的从属，以及他对代替了法术师或魔法师的教士的盲目信赖所造成的。经常受穷困和奴役两层压迫的大工业城市的现代无产阶级怎么能够具有手工业行会成员（他们似乎是存在于某种天意计划的框框里）所固有的那种正常的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呢？一个向欧洲提供如此多的廉价产品的芝加哥猪肉商人，在什么样的直观的经验因素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那种曾经使雅典人具有**完美或善良**的人的品质，使**罗马公民**具有英雄的品质的开朗精神和崇高思想呢？基督教的训诫和关于驯服的号召，怎么能有力量从现代无产者的心灵中清除掉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对他们的未确定的或已确定的压迫者的仇恨呢？要知道，如果他们希望正义得胜，他们只能采取暴力行动；为了使仁爱在他们的心中成为普遍的规律，他们就应当给自己提供同目前存在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的生活条件，因为目前存在的生活条件产生仇恨，并把这种仇恨变成一种必然性——就象应还的债务一样。在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里，仇恨、高

傲、谎言、伪善、无耻、不公正和一大堆主要和次要的弊病，是对那种在一切人面前平等的道德的不幸的补充；同时又是对这种道德的讽刺。

可见，伦理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对那些促使道德发展或阻碍其发展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历史研究。只有在这个方面，即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关于道德水平同一定的社会状况相适应，即归根到底同这种或那种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说法才是有价值的。

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某个人的道德是同他的物质地位丝毫不差地相称的。这种说法不仅在经验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质上也是荒唐的。由于人类的心理具有弹性，所以决不能认为，单个人的发展只决定于他的一定的阶级归属和他的社会地位。这里所说的是大量的现象——那些构成或本来应当构成道德统计的对象的现象；这门学科迄今还不被人重视，因为它把它自己在统计案件（例如通奸、盗窃和凶杀）时制造的那些东西，而不是把类似阶级、条件和状况等等现实地即社会地存在着的东西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向人们提倡道德，而只是抽象地想象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条件——这是迄今为止一切劝善的人论证的目的和方法。承认这些条件决定于周围的社会环境——这是共产主义者同鼓吹道德者的空想和伪善的不同之处。由于他们认为，道德决不是上帝的选民的特权，大自然的赏赐，而是经验和教育的产物，所以他们有理由和论据承认人能够完善自己，而这些理由和论据，我认为比唯心主义者通常不多加思考就提出的要更道德和更接近理想。

换言之，人不是作为生来就具有一定特性（他们按照某种唯理论的节奏重复和发展这些特性）的生物而发展和形成的；他是作为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又产生了一定倾向的思想、见解、信仰、观念、意向和原则）的原因和后果、创造者和结果而形成和发展的。由

此而产生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对道德概念的概括,并使之上升为教义问答、教条和体系。因此,在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出现之后,其中的每一种形式后来经过抽象化而得到发展,这是不奇怪的;最后,人们会得出一种印象:这些意识形态形式似乎脱离了其生长的土壤,它们好象居于人们之上,成为无上的命令和典范。形形色色的神职人员和学理主义者自古以来一直吹捧这种思维的抽象化工作,并极力在人的头脑中保存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幻想。现在,当人们发现这些意识形态的真正的源泉在于生活本身的时候,任务就在于真实地说明它们是怎么产生的。既然这涉及到一切意识形态,那么具体地说来,也就涉及到其中的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它们为了使道德评价成为神诫的预示或良心普遍要求的前提,把道德评价扩展到这些评价的自然的和直接的界线之外。

所有这一切构成专门的历史研究的对象。某些道德概念和一定的具体条件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能够找到的。某个过去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对我们来说常常还是个谜。一些最普通的事物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能理解的,例如:为什么认为某些动物是不洁之物,或者为什么憎恶血缘远的人配婚。深入分析会使我们得出结论:一些个别现象产生的原因常常是我们无法说明的。无知、迷信、奇怪观念、象征——同其他许多现象一样,是在(某个民族的)习俗中常常碰到的以及现在我们尚不理解 and 无法理解的那种无意识的原因。

所有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是后来产生的,因此,造成各种观念的动因的踪迹或者消失了,或者潜藏在这些概念本身内部。

* * *

我们可以十分简单地谈一下对科学问题的理解。

长期以来,科学史写得相当幼稚。鉴于教科书和百科全书照

例是对每一门学科作单独的叙述，看来把系统材料的总和分解为逐渐形成它的各个因素，然后按编年史的方式重现已经出现的定义是非常简单的。总的设想是如此之简单：这种编年史的基础是正在发展和进步的理性。

但是，这种方法——如果可以称为方法的话——有一个小缺点，这就是：它充其量只能通过推论的办法使人了解，一种已存在的科学如何产生出另一种科学，但是它不能使人认清最初是什么具体条件促使人们发现科学，即以一定的新的形式叙述已被理解的经验。换言之，任务在于弄清楚，真正的科学史是怎么产生的，对科学的需要的根据是什么，以及是什么东西正好从根源上把社会发展总过程中的这种需要同其他的需要联系起来。

现代技术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精神本质，它们除了其他奇迹还创造了如下的一个奇迹：第一次向我们揭示了科学探索的起源（啊！不能忘怀的佛罗伦萨科学院⁴²，你从“经验”这个词中获得自己名称的时候，正是意大利昔日的强大已经没落，而它今日的社会已处在新时代——工业时代萌芽的阶段）。这样，我们就有了可能抓住一条主要的线索来猜中那个抽象地命名为科学精神的东西。现在谁也不再对下述情况感到奇怪了：所有的科学发现得到实现都象在古时候发生的那样，例如，埃及人的初等几何是从丈量每年被泛滥的尼罗河水淹没的土地的需要中产生的，而河水泛滥的周期性使得人们——还是在埃及和巴比伦——发现天体运行的最简单的规律。

大家知道，自从科学象在希腊化时期那样获得发展并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之后，学者们后来建立在抽象法、演绎法和其他认识形式的基础之上的科学探索已经具有这样的性质：从外表上看，它使得科学本身赖以产生的社会原因仍然未能发现。但是，如果我们总地考察一下标志着科学发展的各个时代，并对比一下可能被

唯心主义者称之为科学思维的进步时期和退步时期，那么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促进和阻碍科学发展的种种社会原因。

试问，比如西欧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需要拜占庭人至少在科学的物质的具体应用方面保留下来的那些古代科学，而阿拉伯人，无论是自由农，或熟练的手工业者，或生财有道的商人，都愿意促进科学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发展呢？什么是文艺复兴，难道不是要把资产阶级发展的开始阶段同再次被承认为有用的和必需的、从而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古代科学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所作的努力吗？什么是从十七世纪开始和在以后的世纪中具有如此猛烈性质的科学认识的整个发展过程呢？难道不是理智为了保证人在劳动中借助于日益完善的技术使自然条件和自然力服从于自己而根据已获得的经验来实现的许多发明吗？

因此也产生了反对蒙昧主义、迷信、教会、宗教的斗争；因此也就出现了自然主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因此也就确立了理性的统治。资产阶级发展的时代——这是智力和精神高涨的时代（维科语）。应当记住，正是督政府（它是自由主义的整个腐朽性的原型和体现者）第一个非常坚决地和庄重地把自由的科学研究方法引进大学和科学院，开辟了到达拉马克的道路！上述方法由于资产阶级形成时期所固有的条件本身的刺激作用而获得了最广泛的发展，成为共产主义从以往的世纪接收下来并无保留地加以利用的唯一遗产。

现在没有必要来考察科学同哲学的所谓对立问题。如果把同神秘主义和神学相类似的那些哲学思维形式除外，哲学绝不可能是脱离真正的和具体现实所固有的事物的科学或学说，哲学对构成经验领域的事物来说不折不扣是思维的程度、形式和阶段。因此，哲学是对科学还应当具体加以研究的那些问题的一般预见，或者是以观念的形式对各种科学已经达到的成果的总结和叙述。至

于那些怕被人看成顽固不化者而大谈特谈科学哲学的学者，那么应当说——只要不从幽默的角度上理解这个否认任何形式的神学和传统主义（纯粹的）的存在的术语——，他们简直是花花公子，以为自己似乎是一个学派或特殊的哲学流派。

我在上面表述一系列定义时已经说过：经济结构其次规定着艺术作品中以及宗教和科学所创造的东西中的想象和思维的方向，也在颇大的程度上和间接地规定着它们的对象。如果以另外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点或者超出了上述范围，那就意味着有意识地走上导致荒谬的道路。

这个定义首先驳倒了一种荒谬的唯心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宗教和科学是艺术精神、宗教精神或科学精神的主观的和历史的派生物，而这些精神似乎始终按照它本身的、由物质因素所制约（在一些条件下起促进作用，在另一些情况下起阻碍作用）的进化节奏来表现自己。

另外，这个定义强调了不可避免的相互联系的存在。由于有了这种相互联系，与艺术和宗教领域有关的一切都是一定社会条件的精神的、感情的或另外的派生的表现。如果我说“其次”，那么我这样说是为了强调上述现象同直接反映经济关系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现象之间的不同。如果我在谈到这种创造的对象时说“在颇大的程度上和间接地”，那么我这样说是为了说明两个情况，也就是：在涉及宗教或艺术领域的创造中经济条件和创造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很复杂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即使人们生活在社会中，但同时还继续生活在自然界中间，并从中吸取自己求知和想象的材料。

最后，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比较一般的公式：人类不能同时创造几种历史，所有这些臆想的各种历史（艺术、宗教等等）只是一种历史。

只有在创造新的东西的重大转折时刻，即在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时期，才能明显地看出并理解这一点。后来，由于习惯于已经创造的事物，由于传统地重复一定的类型，而关于它们起源的记忆就被冲洗掉了。

不妨让谁来试一试：把成为荷马叙事诗基础的寓言的思想内容同雅利安人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中海盆地那个历史发展时刻，即同在希腊和其他国家产生了真正叙事诗的那个高度发展阶段的野蛮时代分割开。让另一些人去满足这样一种幻想，似乎基督教是在罗马世界主义之外产生和发展的，它不是那些感到需要赎罪、启示录和天国许诺的无产者、奴隶、备受压迫和绝望的人们的创造。不妨让谁来试一试，以证明文艺复兴的极盛时期产生了浪漫主义（它的最初的标志勉强能够从托尔克瓦托·塔索的作品中看出来）；或者谁愿意，就不妨把巴尔扎克的小说说成是理查逊或狄德罗的著作吧。巴尔扎克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学者的同时代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指出了**阶级心理学**。

我们如果更远地追溯到神话观念起源的时代，就会清楚地看出，宙斯只有在父权制已经确立和那种后来导致国家建立的发展过程刚开始的时代，才获得人和神的父亲的特点。这样，宙斯已经不再是他开始时的那个形象了，也就是说，不再是单纯的神圣的（或光辉的）东西，或雷神。于是，上个世纪的许多思想家最后站在违反历史进化的观点上决定把在神话、基督教或口头创作中所反映的各种各样未被认识的和先验的东西，整个归结为一个**抽象的神**——完全是世界的主宰。人由于已经获得的经验而感到在自然界中自由得多了，感到能够了解人类社会（人只掌握了关于它的部分知识）的复杂机体。他逐渐揭穿了意识中的神奇因素，以致于唯物主义和批判主义后来不参加反对神的斗争就得以消灭先验论的最后残余。

当然，思想的历史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历史决不囿于那些自我说明的思想的恶性循环。问题在于把事物上升为思想。这是整个问题之所在；此外，这里还有许多问题，人们关于自己本身和自己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关于反映在艺术和宗教中的期待、担心、希望和失望的种种观念，是五花八门、相当复杂、性质各异和十分混乱的。方法找到了，但是要把它运用于每个具体场合却并不容易。特别应当防备烦琐哲学引诱人们用演绎方法得出艺术和宗教所反映的历史活动的成果。应当希望，象克鲁格（他用辩证的方法得出关于他所使用的笔的推理）一类的哲学家将永远被黑格尔对《逻辑学》的注解所埋葬，因为那里指出了这种荒谬的奇念。

* * *

在这里应当指出一系列困难。

第一，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的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例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经历了一定变化的社会的心理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种种本领。这一点正是下述关系的本质，即总和。这些关系——如果使用另外的术语的话——比如可以叫作埃及世界，希腊意识，文艺复兴精神，统治的观念，民族、社会或阶级的心理学。在上述关系已经形成和人们习惯于一定的概念和一定形式的信仰或想象之后，由于传统而沿袭下来的意识形态就趋向于固定化了。

于是，这些关系也成为一种反对新事物的力量，而由于这种反对是通过语言、文字、偏执、辩论和迫害等等来表现的，所以新旧社会条件之间的斗争具有思想斗争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本身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由于人类史前期、野蛮时代所传下来的遗产，还是由于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所处的从属地位、从而受屈辱的附属地位，出现了同传统制度的和解，这样一来，旧的倾向经久不衰，而且作为顽固的残余继续存在

下去。

第三，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们生活在交往中，同时也生活在自然界。当然，他们同自然界的联系与动物同自然界的联系不同，因为他们生活在人为的环境中。其实，每个人都懂得，住房不是洞穴，耕地不是自然牧场，药草不是神的咒语。但是，自然界始终是人为环境的直接基础。它包围着我们所有的人。由于有了技术，在我们这些社会动物和自然界之间出现了一系列中介物，这些中介物改变、消除或抵销自然的影响，但是技术绝不能够消灭它们的有效力量，我们经常会亲身感到这种力量。所以，正象我们每个人很自然地生下来就是男人或女人一样，正象我们几乎总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死去和在我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延续种族的本能一样，在我们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特性。教育（广义上的），即社会适应性，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些特性，但永远不能完全根除它们。这些特性很多世纪以来一代一代地在许多个人身上再现，因而构成了被称为民族性的东西。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对自然的依赖，虽然从史前期开始逐渐在减弱，但是仍然继续存在着，直到今天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象对自然界本身的直观继续产生好奇心并为我们的想象提供养料一样。因此，自然界的这种影响和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感觉，虽然有史以来就决定于某种社会条件，但总是在艺术作品中和在宗教的创造物中得到反映，而这一点加重了对一种东西（即艺术）和另一种东西（即宗教）作现实主义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的困难。

（十一）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用我们的学说当作新的研究方法、准确的理解工具和一定的观点，是否最终能够从完全新的立场上具体地叙述历史呢？

不能对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作一般性的肯定回答。实际上，如果假定，一个批判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即信仰经济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家，或象人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必要的批判修养，历史研究的习惯，以及进行合情合理的生动描写所必需的能力，那么就没有理由断言他不能写历史，而迄今为止所有其他政治学派的拥护者都写过历史。

我们用马克思作为例子，因为这个事实的证明不会有人反对。正是他作为这个学说的基本原理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创造者，很快地把这个学说变成政治理解的工具，成为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首屈一指的政论家。稍后，他在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最彻底地运用了 this 学说；就是在许多年和多次再版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这部著作——除了一些小的细节和个别的错误预言——不需要作任何修正和补充。我在这里不打算象书志学专家那样开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或者他们的直接继承人，以及社会主义的通俗化者的著作（运用这种学说来解释历史）的目录。甚至在社会主义报刊上经常可以发现一些说明现代政治事件的有价值的习作。这些作品之所以写得明确而又透彻，正是因为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这样的作品我们在那些还没有撕下历史的虚构的外衣和唯心主义的外壳的作家和政论家那里是找不到的。

在这里没有必要象律师那样为抽象的论题作辩护。但是下面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迄今为止所写的一切著作的基础都是某种倾向、原则、总的世界观，如果它们没有得到确切的表达，那么无疑这些著作的作者在无意识地贯彻它们；同样，这个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客观地研究社会制度的学说，最后必定会赋予历史研究以非常明确的方针，并引导人们全面地、清楚地和包罗一切地描述历史的过程。

* * *

当然，这种首创并不缺少辅助手段。

正象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最初曾经傲慢地幻想，似乎它本身包含了一切生产形式的绝对规律。但是，正象我们所知道的，在一定的时刻，它在现实的严酷教训的影响下进入了自我批判的时期。这种自我批判一方面开创了批判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学院主义传统的最公正、最理智和最谨慎的代表们的著作而使得**经济现象历史学派**问世了。由于这个学派的活动和采取记述的、比较的方法，我们现在才掌握了关于经济的各种历史形式（从最复杂的现象到某个修道院的管理特点或某个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特点）的非常广泛的知识。统计学的情况也同样。由于采用许多方法对资料进行对比，统计学现在才充分地确定了过去若干世纪里人口增长的近似值。

这些研究当然不是为我们的学说进行的，它们多半甚至还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敌意（不过，那些常常把**经济历史、经济历史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的、眼光狭窄的书面语言的读者发现不了这一点）。但是，这些研究除了它们所收集的和考察的实际材料之外，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们证明内部历史方面的研究每天都在进步，而这种内部历史正在逐渐排挤许多世纪来一直是学者和艺术家们的唯一注意对象的外部历史。

用这种方法收集的材料大部分不断得到新的修正。而且，在所有以经验为基础的、总是动摇于根据研究者的设想是可靠的东西、被研究者评价为可能的东西和后来应当加以补充或完全排除的东西之间的科学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那些写**经济学史**的人，或者把研究经济现象作为出发点来考察整个历史的人，他们的结论和对比并不总是那么近乎情理和令人信服，以致于还要人说：这一切都应当重新从头开始。但是，下面的事实仍然是无可

争辩的：目前，整个历史编纂学力图成为科学，或者更正确地说，成为一种社会的学科。当这个尚不明朗和具有各种形式的运动快要完成的时候，学者们和研究者们不可避免地要以承认经济唯物主义来结束自己的探索。由于出发点各不相同的学者们的努力和著作联结在一起，对整个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最终将成为决定性的思想胜利并掌握人们的头脑。这一点最后将使经济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避免陷入象党派论题讨论中的那种赞成和反对的争论。

* * *

除了上述直接辅助手段之外，我们的学说还拥有许多间接的手段。另外，它还从同其他许多学科的富有成果的比较中得到了好处。在这些学科里，由于所研究的关系非常单纯，很容易采用追溯起源的方法。语言学，特别是研究雅利安（印欧）语的那一部分语言学是典型的例子。

这类学科，特别是语言学，在分析和构拟方面所具有的明确性和说服力，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把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历史方面所缺少的。因此，在我们的时代，鉴于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任何想要写一部简要通史来考察所有的不同生产形式的发展，以便然后从中引出人类活动的其余形式，都是徒劳的。鉴于这种研究的现状，如果有人想要提供这类新文化历史的简述，那么他只能用经济学的语言来翻译一般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其他著作中，例如在赫尔瓦尔德⁴³那里，是用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来表达的。

从承认原则，到把原则完全和具体运用于整个广阔的事实领域或一长串相互依存的现象，还有不小的距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在运用我们的学说时应当局限于叙述和解释一定历史阶段的原因。最清楚的是现代史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它在各个国家不得不克服的各种障碍（我们很熟悉），

由于它同各种障碍的冲突而发生各种广义上的革命，所有这些得到同样清楚观察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弄清现今时代的实质。同样，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想象中世纪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直接史前史。例如，在佛罗伦萨城的独特发展中根据资料对种种现象作出一系列的综合，以表明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完全同政治关系相适应，并从那个已经采取世俗的方针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思想幻想的时代的思想发展中得到非常清楚的说明，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现在，从严格规定的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和说明整个古罗马历史，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对古罗马史特别是它的早期进行这样的研究，直接的资料还不充分；不过，阐明古希腊史的资料却很丰富——从民间传说、史诗和真正的法律铭文，到实用主义地解释历史和社会关系的著作。与希腊不同，在罗马争取政治权的斗争几乎总是直接反映着那些构成它的基础的经济原因；因此，某些阶级的衰败和新阶级的形成、征服的过程、法律和政治管理机关的形式的改变，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这个罗马史是严酷的和平淡的；它从来不具有构成希腊生活特征的那种思想外壳。按周密计划进行的征服和移民、为消除某些摩擦和矛盾而确立和制定的法律设施和规范，都是平淡无奇的，所有这一切使罗马史成为一连串特别清楚地相继发生的事件。

* * *

可见，真正的关键是：不在于用社会学来代替历史，似乎历史只是掩盖真正现实的外观，而相反，要通过历史的一切具体表现来充分地理解历史，并借助经济社会学来这样做；不在于把偶然的東西同本质的东西、外观同实际、现象同本质等等分割开，而不论烦琐哲学的追随者怎样称呼这些范畴；相反，应当正是按照现象和事实的本来面目来说明它们的交错和综合。问题不在于只是发现和确定社会基础，然后把人变成已经不是由天意，而是由经济范畴操

纵的傀儡。这些范畴象其他一切东西一样，过去和现在始终处于形成过程，因为人战胜、征服、改造自然条件并从中得益的能力和本领在不断变化；因为人的习惯和能力在劳动工具对人本身的反作用的影响下在不断地变化；因为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在不断地变化，从而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依赖的性质和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简单说来，要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历史的骨架子。要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不要抽象化，要记叙和解释整个的历史，而不是仅仅把它分解为一些单个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总之，始终是方法问题。

遵循经济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学者可以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例如，只分析法国革命爆发时的阶级是什么样子，以便然后转向那些由于革命而形成的和经历过革命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分析的材料名称、特征和分类大体上已经很清楚了，例如：城市和农村、手工业者和工人、贵族和农奴、免除了一切封建负担和勒索的土地和正在形成的小所有者阶级、免除了多种限制的贸易、处于积累过程中的货币、正在发展的工业等等。绝不能反对选择下述方法：它由于彻底研究胚胎形成的发展道路，因而对于准备遵循新学说来进行历史研究是必需的。^①

但是我们知道，仅仅胚胎形成还不足以形成关于动物的生命的概念，因为动物的生命不是死板的东西，而是活着的生物的生命。这些生物在进行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利用自己的力量、本能和激情。对人也同样可以说，不过说法要作相应的改变，因为人是在历史中活动。

这些具体的人被一定的利益卷入运动，受某些情欲所驱使，受一定情势的压迫，遵循一定的打算和计划、一定的愿望、自己的某

^① 我在这里是指卡·考茨基的有价值的著作《1789年的阶级矛盾》。

种幻想或他人的某种糊涂见解。这些人自己是牺牲品或使他人变为牺牲品，加入残酷的冲突并彼此相互消灭，这就是法国革命的真实历史。因为，如果任何历史都只是一定经济条件的发展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下面的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这个历史只能在人类活动的一定形式中发展，而不论人类活动是受激情还是受理智所支配，是取得成功还是无所作为，是盲目的服从于本能还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行为。

要从现象和事实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来了解它们的交错和综合；从表面深入内部，再返回表面；在分析激情和意图中发现它们的动力，从最近的动力到最远的动力，然后从激情、意图和它们的动力出发，从离它们最远的一定经济条件中引出它们——这就是唯物史观应当掌握的困难的方法。

因为我们不应当象经院哲学家那样，在海岸上教人游泳，光讲游泳的理论定义，所以我请求读者等待我以后在另外的论文中引用具体例子来论证我的思想，提供一个真正的历史的论述，也就是以书面的形式叙述若干时候以来我在自己的讲课中所谈到的那些东西。

通过这样的办法，某些次要的和派生的问题也可以弄清楚。

例如，所谓伟人的生命有什么作用。

最近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曾有许多回答，这些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走极端。一端是不妥协的社会学家，而另一端是象卡莱尔那样把英雄提到历史的首位的个人主义者。前者硬说，不赋予独裁者个人以任何意义，就完全足以说明独裁的原因。后者说，阶级和一定社会利益的产生的客观原因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有伟人才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好象有自己的主人和主宰者。经验主义类型的历史学家用最简单的方法摆脱了困境：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胡乱罗列一大堆人物和事件、客观存在的需要和主观

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社会学家和个人主义者的直接对立的观点，同时抛弃了经验主义类型的历史学家的折衷主义。

首先讲几个事实。

让我们来看拿破仑这个独裁者，他生在这样的年月，这样官运亨通，而且对他来说幸运的是，雾月十八日一举登台——这一切同事件的一般过程相比完全是偶然的因素。事物的一般过程促使在斗争中成为胜利者的新阶级去拯救它必须拯救的革命成果。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军事官僚政府，而为了建立这个政府，必须找出一个合适的人或集团。但是，如果说这一切事实上是以我们所知道的一定的方式，而不是以另外的方式发生了，那么这是因为这项业绩正是由拿破仑，而不是由那个可怜的蒙克或荒唐的布朗热来实现的。从这时开始，正因为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给事件以深刻的影响，并赋予它们某种外观，规定它们将如何发展，于是偶然性不再是偶然性了。

矛盾、对立、斗争、战争构成整个历史的基础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一定的人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人既不是社会机体中的偶然的和无足轻重的因素，也不是社会缺了他们就根本建立不起来的神奇的创造者。错综复杂的对立条件本身导致某些天才的、英雄的、走运的和罪恶的个人在危急的时刻应运而生，说出决定性的话。当各个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十分尖锐，以致于所有参加斗争的政党相互平衡的时候，那时为了使政治机体运行，就需要一定的个人的个人意识。

那些使任何人类社会变为不稳定的组织的社会矛盾，赋予历史——特别是当人们从表面上和从最一般的特征来考察历史的时候——以悲剧的性质。这出悲剧在社会对社会、民族对民族、国家对国家的关系上一再重演，因为内部的不平等同各国之间的外部

差别相结合，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产生一切战争、征服、条约、殖民化等等的原因。在这出悲剧中，总会有一些所谓英杰或伟人登上社会舞台充当领袖，而他们登上舞台促使经验主义者得出结论：这些人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从一般原因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条件中引出对他们出现的解释，这是同我们的学说的原理完全相吻合的任务；同时象客观社会学的某些不调和的信奉者喜欢干的那样，试图把杰出人物的作用从历史学家的视野内清除掉，是十分荒唐的。

* * *

最后应当指出，正在着手叙述和描述事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避免公式化。

历史总是具有一定的形式、某种外形，它充满无数的偶然性而且非常复杂多样。它以最奇异的方式把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前景。

事先抛开因素的假说是不足取的，因为写历史的人不断地接触那些初看起来似乎没有内在联系而彼此不相干的和完全独立的现象。困难在于理解现象和事实的整个总和本身，并从中发现彼此有联系的事件的固定的相互关系。

历史是一个紧跟着一个出现的和彼此有密切联系的事件的总和；换言之，这是我们关于我们作为社会生物的存在、而不单纯作为动物的存在所知道的一切。

(十二)

这样一来，有些人会发问，难道不断发展的历史事件的总和、所有这些事件所固有的必然性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作用了吗？当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需要作出恰当的回答，不论这种回答来自唯心主义者阵营还是出自最谨慎的批评家之口。

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产生进步（即容纳和包罗了整个人类

发展过程的思想) 这个概念的直观的和理性的前提, 我们就会看到, 所有这些前提的基础是我们头脑中所固有的一种需要, 即需要赋予一系列历史事件以一定的意义和一定的作用。对任何细心研究进步这个概念的特殊本质的人来说, 这个概念始终包含着评价的因素; 因此, 不能把它同单纯发展这个狭隘概念混为一谈, 因为单纯的发展这一概念根本不包括价值增长的思想, 而这种思想使我们判断某种事物在进步。

* * *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而且我以为是详细地说过, 进步不是站在人类世代的自然的和直接的更替之上的命令或指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就象同一时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人民、民族和国家同时共存一样, 也象不能否认目前一些民族比其他比较落后的民族相对优越一样; 最后, 也象在历史过程中多次出现局部的和相对的退步是无可争辩的 (意大利几个世纪来曾经是退步的例子) 一样。此外, 如果确实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为什么不应当把进步理解为直接发生作用的法律, 或者采用更强烈的说法, 不可违反的、不可避免的法律, 那么这样的证明就是: 社会发展, 由于那些构成整个发展过程的基础的原因本身, 常常出现退步。另一方面, 显而易见和无可怀疑的是, 无论进步的能力或退步的可能性, 首先都不能构成直接的特权, 也不能构成某个种族的先天的缺点, 其次, 它们都不是一定的地理条件的直接后果。因为问题不仅在于古代的文明中心各不相同, 不仅在于它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迁移到了别的地区, 而且在于一定的已经发达的文明的工具、发明、成果和动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被一切人无止境地接受。总而言之, 进步和退步同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节奏是不可分割的。

* * *

因此, 相信十八世纪如此声势浩大的进步具有万能的性质, 其

根源在于这样一个实证的事实：当人们没有碰到外部情况所造成的障碍，没有遇到他们本身在社会环境中活动所造成的阻碍的时候，他们无例外地都能够进步。

其次，构成人类历史的假想的或想象的统一性（由于这种统一性，不同社会的发展过程似乎是进步的一个环节）的基础的，还有其他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创造许多虚幻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动因和原因。虽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以同样的速度前进，甚至某些民族或者在自己的发展中停滞下来，或者开始退步；虽然社会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同样的节奏和同样的强度，但是不容怀疑的是，随着历史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从一个民族转移到另一个民族，开始走下坡路的民族已经取得的有益成果被那些登上历史舞台和正在上升的民族所接受。这主要不是指感情和想象的产品（不过，它们也作为文学传统被保存下来和世代相传），而是指思想成果，特别是技术工具的发明和生产，因为它们一经发明就开始直接传播，并从一个民族传给另一个民族。

难道需要提醒人们，虽然发明文字的民族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人类绝不会失去文字。难道需要提醒人们，我们总是随身带着巴比伦刻度盘的怀表，我们正在使用阿拉伯人创造的代数，而阿拉伯人的历史活动后来象沙漠的砂子一样被历史进程卷走了。用不着再没完没了地罗列偶然的例子，因为只要想一想工艺的发展过程和广义上的发明史，就足以从中清楚地看出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继承性几乎是不间断的。

最后，那些称为《通史》的初步概论，虽然在它们的编写者的意图和叙述中总是令人感到有某种勉强和人为的性质，然而，如果彼此更替的事件不给经验论的讲述者提供某种哪怕是很细的线索，使他们有可能抓住历史过程的不间断性，那么这种概论也永远不可能被设想和撰写出来。

我们可以以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为例：它无疑是在走下坡路，但同时它把自己的智力武器转交给落后的欧洲。但是不仅这个武器成为后来发展的文明的财富，世界市场也是在意大利商人、旅行家和海员所完成的地理发现和航海领域的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他国家在意大利不仅学会了作战的方法和巧妙而又灵活的政治权术（虽然这是学者们唯一注意的东西），而且也学会了具有精心创立的商业学的明显形式的那种发财窍门；此外，它们逐渐地掌握了作为现代技术基础的科学的萌芽，首先是经常灌溉田地的方法和水力学的一般规则。这一切是如此正确无误和无可怀疑，以致于每个好提出设想的人都会想到下面的问题：如果威尼斯元老院（1504年）关于修建苏伊士运河的种种措施的方案实现了，如果意大利舰队正是在历史活动重心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洋（这为意大利的衰落创造了前提）的时候能够在印度洋直接同葡萄牙人竞争，那么意大利在这个现代资产阶级时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幻想的题外话已经说得够多了！

* * *

可见，某种带有经验主义性质和由情况制约的文明工具在历史上无疑是不间断地传递下来和连续发展起来。尽管这个事实排除了关于预先确定的计划、关于预先筹划的或隐蔽的最终目的、关于先定的谐和的多种思想，以及其他一切虚构的思想（关于这种思想，人们考虑得非常抽象），但是并不排除可以充当我们评价人类发展过程的一定尺度的进步思想。不应当怀疑，进步在物质上不包括所有的世代更替，进步这一概念不包含任何绝对的东西，因为有时还可以看到个别社会的退步。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思想不能成为弄清历史过程的意义的引线和依据。那些可怜的不调和的进化论者丝毫不懂得无论对使用特殊的概念还是对运用这些概念的方法，都应当采取这种批判的、谨慎的态度。他们想成

为学者而又不运用语法和逻辑学的规则，然而科学没有它们就是不可思议的。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甚至那些在某些时候是由信仰产生的、似乎与一定的条件没有联系而以形而上学的形式产生的思想，也总是指出了它们同它们力图或试图给予说明的大量事实之间的联系。进步的思想，作为统一的原则，在历史上强有力地表现出来，并在十八世纪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英雄主义时期具有庞大的规模。正象资产阶级在实践活动的领域内开创了我们知道的一切历史时期中最紧张的时期一样，它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的以进步的概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当时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唯一能够遍及全球并使整个人类具有到处都一致的生存条件的生产形式。如果现代技术能够到处渗透，如果整个人类出现在统一的竞争性斗争舞台上，而全球成为统一的市场，那么，作为这种现实的精神反映的思想体系，断言目前的历史性的统一是先前的一切所准备好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你们把关于所谓准备的观念转变为关于**清楚的、被证明的和连续不断的发展阶段**的观念，在你们面前就会展现一条从以进步的概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这样，你们就会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后一个对抗的生产方式的论断。

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发展过程的统一方面所创造的奇迹是史无前例的。整个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它们全都同我们一样！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竭力效仿欧洲的远东和被征服的其他非洲地区也象欧洲一样！在这种统一性和这种世界主义面前，克尔特人和伊比利安人吸取罗马文化、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吸取罗马拜占廷基督教文化是一种完全不足道的现象。这种逐渐加强的统一倾向日益增多地反映到欧洲的政治机体上来；因为这个

机体是以对其他洲的经济征服为基础的，所以它现在随着地球最边远地区的涨潮和退潮而动荡不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影响下，日中战争——它是借助于按照欧洲模式创造的或直接从欧洲技术抄袭的手段进行的——在欧洲外交关系中长久地留下深刻的痕迹，并给交易所的活动——反映社会意识变化的镜子——打上了更明显的痕迹。在统治着世界其余地区的欧洲，由于德兰士瓦起义和意大利军队最近几天^①刚刚在阿比西尼亚遭到的失败，⁴⁴不久前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出现了动荡。

在资产阶级生产的经济统治酝酿成熟和逐渐采取现代形式的几个世纪过程中，从总的观点来考察历史，把统一性带进历史的企图也加强了。进步的思想作为许多历史哲学和文化历史的著作的基础，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和理由。到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的统一，即许多世纪来资产阶级一直追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统一，在历史统一观念中所得到的反映，要比罗马帝国的狭隘世界主义或天主教会的片面世界主义在人类思想方面所能够做到的更令人信服和显著。

* * *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而造成的社会生活的统一，最初乃至现在，都不是按照事先拟定的规则、计划和预定的方案发展的，相反，是通过斗争和冲突（它们总和起来构成一大堆矛盾）来发展的。外部战争和内部战争，民族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和构成各个民族的人们的集团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同时，这么多的竞赛者、竞争者和对手，他们的行为和行动的交错是如此之复杂，以致于往往很难发现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使人忽视这些事件的协调。目前在人们之间发生的冲突，各民族之间和每个民族

^① 我记得此书的第一版上写的日期是1896年3月10日（再版注）。

内部用各种方式进行的各种斗争——这一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在过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如果说力图建立单一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宣告了人类的进步，那么不夸夸其谈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相反的现象：直到目前为止，矛盾是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动力。

所以，整个的历史运动在我们看来是摇摆的运动，或者更正确地说，如果说得更恰当些，我们认为，它是按照这样一条线发展的：它经常改变方向并重新中断，有时似乎向后转，有时又向前伸展，并远远离开了自己的出发点，总之，是一条真正的曲线。

如果注意到每个社会的复杂的内部结构和许多社会在竞争领域的冲突（从原始的斗争形式——逃跑、掠夺和海盗到高级方法——交易所里的表面上彬彬有礼的暗斗），那么十分自然的是，用个人评价的唯一主观尺度来衡量每一个历史结果的时候，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偶然的東西；然后从理论上加以考察，就会使人感到它比流星的偶然出现更复杂和更不可理解。

因此，历史充满着讽刺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如果不存在从天上嘲笑人类事务的伊壁鸠鲁神，那么在地上，人类事务本身会被编写成神的喜剧。

* * *

这种对人类命运的讽刺何时会消失，将为人类能力的充分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使后来的历史过程具有真正的实在的进化性质的联合形式何时能出现？所有象豪言壮语的爱好者那样讲话的人都能成为人道主义者吗？到了共产主义生产消除目前作为经济差别的原因和后果的矛盾的时期，人类劳动是否真的会在合作劳动的过程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和强度，而同时每一个单个人是否真的会发挥自己的干劲并获得表现自己个人才能的充分自由？

批判的共产主义关于未来所说的一切，即它对未来所作的预言，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它这样做，并不是在讨论某种抽象的可能性或者力求在实际上去实现它所希望和热切希望的那种状况。它谈论未来并预言未来，是因为它宣告一个由于历史发展——目前人们正在从本质上，即从它的**经济基础**来考察和研究它——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而必然来临的事情。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①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②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③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同上书，第491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同上书，第13卷第9页。

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①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是爱说漂亮话的人,如果他们的思想没有通过经常地和细心地使用和运用科学方法而养成最伟大的谨慎,如果经常同许多密谋者和幻想家接触没有使他们厌恶一切乌托邦(他们反对它是非常认真的),那么这些说法可能是一些回避了批判的研究的天才怪论。但是,这些原理就象结论一样,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它们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把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的直接结果**。

这些论断包含着对未来的唯一可能的预见——不过它们是会发展的,我将有机会在另外的地方指出这一点——,而这种预见不是,也不希望是小说和乌托邦。正是这些论断对本章开头提出的关于许多历史事件归根到底是否真的有某种意义和作用的问题作了非常充分的和最终的回答。

就此停笔了,因为我认为,以上所述对初步说明来说是足够了。

1896年3月10日于罗马

(译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308页。

附 录

《纪念〈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

弗兰茨·梅林

我们把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关于《共产主义宣言》的论文翻译出来供德国工人阅读，这首先是由于它具有实际价值。

1895年春天，当拉布里奥拉用意大利文和法文第一次出版他的著作时，他本人原来只想就《宣言》问世即将五十周年之际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他既不打算对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进行分析，也不想对它进行评论。不过，由于他在阐述《宣言》产生过程的同时又谈到了它的影响，因此，他把两件事都做了：既进行了分析，又进行了评论。就通俗易懂而又透彻明了地介绍《宣言》的丰富思想这一点来说，他的著作可以同恩格斯那本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小册子媲美，而在其他方面还有其独到的见解。

这两篇著作并不重复，也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作为《宣言》作者之一的恩格斯有许多问题不便谈，拉布里奥拉都恰如其分地着重指出了。不过他的观察方法有所不同。拉布里奥拉完全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来再现这一理论的。这样一来，他就难免听到这样或

那样的非难；或者说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他饶有风趣地回答说：“我不是马克思的干将，我接受所有的批评；我本人就是我所写的一切东西的批评者，我不否认这样的格言：理解就是克服。但是，我看还必须加上一句：克服是已经理解到了。”修正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从来没有受到比这更温和而更彻底的批驳。

拉布里奥拉象少数人那样，已经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他非常熟悉德国的著作，特别是德国的哲学。当他第一次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甚至使德国读者都有些伤脑筋的《神圣家族》时，他就象欢迎一位老朋友一样地欢迎它；读了这部著作，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在那不勒斯的黑格尔派中间度过的青年时代。在他去世时，连资产阶级报纸都赞扬说：“他的去世引起了我们德国人的特别关注，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位把德国精神推荐给意大利的满腔热忱和学识渊博的介绍人。”不过，拉布里奥拉首先是社会主义领域的这样一位介绍人。

他充分估计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罗曼语的困难。1897年5月他这样写道：“三十七年来我一直在阅读德国著作，而且我总觉得，如果我们这些操拉丁语的人来翻译这种文字，我们就会莫名其妙地丧失说话和写作的能力。在德语里非常有力、明确和引人入胜的东西，而在例如意大利语里，却往往变得冷漠平淡，并且在许多场合甚至成了无稽之谈。”因此，拉布里奥拉本来想完全让德国人去出版并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们两人虽然是国际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思维形式、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观察方法的结构、他们的科学修养以及他们的哲学，都是德国文化的丰硕成果。”拉布里奥拉向罗曼语国家推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阐明它们本国的历史，他本人就是以无与伦比的信心对这种方法运用自如的；这种信心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也是一种牢固

的精神纽带。尽管拉布里奥拉非常善意地断言我们德国人的语言是明确而有力的，但我们在这方面却往往做得不如人意。

他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他本人冲破了由民族差别，首先是由妨碍国际无产阶级紧密合作的德意志民族与罗曼语国家精神生活的差别所造成的限制。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几乎能够从任何一个方面来叙述由此而给它造成的重重障碍。在已经和正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些国家，它们的经济差别日益消失；在这些国家，严酷的事实威力经常使各国无产者碰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但是，要清除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本身极不相同的那些传统的思维形式，并把它们改造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维形式，就困难得多，因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是用一把非常奇特的钥匙，即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打开的。

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拉布里奥拉也是从这种哲学达到社会主义的。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不准备探讨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只要指出他在埋头工作和艰苦斗争中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够了，虽然或者勿宁说，因为这一点在他的社会主义著作中丝毫未曾透露过。那种透彻的明确性，那种占有材料的可靠性并不是垂手而得的。但是，正因为这些著作并不是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生活的经历，从而以其栩栩如生的魅力吸引着读者。这是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纯正的葡萄酒，但是它已改换成罗曼语的表达形式和思维形式，已完全摆脱了德国思维形式难于摆脱的那种咬文嚼字的学究气。

拉布里奥拉在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之后，仍然在罗马大学里当教授。在这块古老的文明土地上，同新暴发户德国的妄自尊大的爱国主义完全相反，即使科学成果同统治阶级的有利可图的眼前利益相抵触，但科学还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他在官方的职位上也懂得如何维护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尊严，这对拉布里奥拉来说

是一张荣誉证书。至少从 1895 年起，即从这篇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论文发表起，他就成了遐迩闻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并不是那种承认马克思主义但又在学术上有某种保留或似乎有保留的人。他直言不讳地维护马克思主义。

诚然，他决不是一个多产作家，因而他的社会主义著作也不是包罗万象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纪念文章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文章（这两篇作品被他冠以同一个标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论述哲学和社会主义的一批书信。不过，他作为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要比作为哲学家写得多一些。他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为读者写作的奢望，我也从不考虑写作技巧，所以我通常都是信手写来。相反，我倒总是喜欢口头讲授，而且不拘任何形式。直到后来，我成了社会主义者，由于思想上获得了新生，我才比较渴望通过传单、应时的通信和演讲同公众交往。这些年来，这些传单、通信和演讲可说是出乎我的意料而被大量翻印出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完美的人物，而德国教授一遇到思想上新生的痛苦，就宁愿退居他那偏僻的斗室。

拉布里奥拉同这种德国教授毫无共同之处。他了解这种人，有一次曾谈起他们：“在德国，旧的封建习俗、新教的伪善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尽管拥有优越的经济条件，但既不能发扬革命精神也不拿出革命勇气）的怯懦，使国家的本质保持一种负有道德使命的骗人假象。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学究气十足的德国教授们，竟用这种国家的伦理学，而且还是普鲁士国家的伦理学来款待我们，简直使人倒胃口。”拉布里奥拉还在另外一个方面与德国教授们不同，他用下面一席话来加以说明：“有的人——他们人数不多——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献给公众，但并不认为需要把他们讲课的详情细节或者甚至把他们写作的真实过程全都披露出来。另一些人——他们是大多数——则感到迫切需要将他们讲课的全部结果刊印出

来。他们精心保存自己的笔记本，为的是使他们现在或将来的辛勤操劳不致白费。”拉布里奥拉则属于那些为数不多的人。在他声称不懂写作技巧时，他是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优越感说的，这种优越感对于写作大师来说是许可的，比如莱辛就习惯于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他的“拙著”。拉布里奥拉的著作似乎是一挥而就，然而结构严谨，令人信服，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内容清晰而又深刻！

因此，我们首先把拉布里奥拉纪念《共产主义宣言》的文章献给德国工人，我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应尽的一项义务。他们当中不会有人读了这篇文章而收获不大，也不会有人读了这篇文章而仍然对《宣言》缺少较清晰较深刻的理解；《宣言》应渗透到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血肉里去，但正由于理解它有困难，可惜还没有渗透进去。拉布里奥拉作为一位可信赖的导师，作为一位真正值得结识的导师，在这方面是能够为他们服务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翻译了他的著作。德国无产阶级不了解拉布里奥拉，甚至比德国资产阶级还不了解。他自己本来至少应当对此有所抱怨；他清楚地知道，谁有幸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旗帜下进行斗争而又期望另一种报酬，那么他会因此得到报酬的。但是，一个人在世时不曾要求的东西，理应在去世后得到的更多。

1904年，喉头病过早地夺走了年仅62岁的拉布里奥拉的生命。他坚强而沉着地忍受了剧烈的病痛。在他去世前几天写给德国朋友们的一纸短笺中，谈到他由于进食困难已经骨瘦如柴，不过短笺仍然保持了他那笔锋刚劲的特点。但是，他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最杰出继承者之一，将永远名垂国际社会主义史册。

因此，这篇短文可能有助于使他的形象永远活在德国工人心里。

1909年11月写于施特格利兹-柏林

（译自《纪念〈共产党宣言〉》莱比锡1909年德文版）

论唯物主义历史观

格·瓦·普列汉诺夫

(一)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 Antonio Labriola,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Rome, avec une préface de G. Sorel, Paris 1897)^①

老实说，我拿起罗马教授的这本书时是带有不小的成见的，因为我已经读怕了他的某些同胞的某些著作，例如阿·洛里亚的著作（特别请参看他的《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但是读了这本书的开头几页，我就觉得我的想法错了，洛里亚是一回事，拉布里奥拉是另一回事。等到我快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便很想同俄国读者谈一谈这本书了。我希望读者不要因此而抱怨我。有道是：

好书不多见！

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最初用意大利文出版。法译本晦涩，有些地方译得很糟。虽然我手头没有意大利文版，我也敢这样说。不过意大利文版的作者不能替法文版译者负责。而就是在这个晦涩的法译本中，拉布里奥拉的思想无论如何还是清楚的。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些思想。

大家知道，卡列也夫先生对每一部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稍微有

① 罗马大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论唯物主义历史观》1897年巴黎版，附若·索列尔的序言。

点关系的“著作”都非常热心地阅读，并特别巧妙地加以歪曲。想必会把我们的作者列入“经济唯物主义”这一门类，这就错了。拉布里奥拉坚定而相当彻底地坚持唯物史观；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经济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这个称呼用在著名的索·罗杰斯之类的作家身上比用在他自己以及同他观点相同的人身上更为恰当。这个看法再正确不过了，当然，初看起来，可能并不十分明了。

你们去问一问任何一个民粹派或主观主义者，什么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他会回答说：经济唯物主义者就是认为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对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解。应当承认，认为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人无疑是存在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曾经一再指出，路易·勃朗早在某些俄国门徒的某位导师⁴⁵之前，就已经讲到了这个因素的支配作用。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位年高望重的主观主义社会学家扯到路易·勃朗。他本来应当知道，在我们所谈的这一方面，路易·勃朗还有许多前辈。基佐、米涅、奥古斯丹·梯叶里，还有托克维尔，都承认过经济“因素”至少在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上起着首要作用。因此，这些历史学家都是经济唯物主义者。在现代，上述的罗杰斯在他的《经济历史观》一书中也曾自认为是一个坚定的经济唯物主义者；他也承认经济“因素”的首要作用。当然，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罗杰斯的社会政治观点和路易·勃朗之类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罗杰斯是持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的，路易·勃朗则曾经一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假使你们问罗杰斯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看法如何，他会回答说，这个制度的基础是人类本质的根本属性，因此它的发生史就是逐步排除那些曾经一度妨碍过，甚至完全阻止上述属性表现的障碍物的历史。而路易·勃朗则会宣称，资本主义本

身是由无知和暴力树立起来的障碍物之一，它阻碍着我们创立一个最后将与人类本质真正符合的经济制度。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存在重大的分歧。谁比较接近真理呢？坦白地说，我认为这两位作家距离真理几乎同样的遥远，不过我在这里不愿意，也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目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完全另外的问题。我要请求读者注意，不管对路易·勃朗来说，还是对罗杰斯来说，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因素本身用数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类本质的函数，而且主要地是人类的智慧和知识的函数。对上面提到的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们，也应当这样说。那么，既然这些人确信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而同时又深信这个因素——即社会的经济本身又是人类知识和观念的产物，我们该给他们的这种历史观点一个什么名称呢？这种观点只能称之为唯心主义的。由此可知，经济唯物主义还不排斥历史唯心主义。这种说法也还不十分准确，我说的是不排斥唯心主义，而应该说：它也许，而且直到现在为止，常常是唯心主义的简单变种。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为什么象拉布里奥拉这样一些人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也就了了了，正是因为他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们的历史观点与历史唯心主义直接对立。

(二)

库德林先生也许会对我们说：“不过，你们是按照许多‘门徒’所特有的习惯，在求助于奇谈怪论，玩弄词句，打马虎眼，大耍魔术。照你们的说法，经济唯物主义者就是唯心主义者。而这么一来，你们叫我们如何理解真正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呢？难道他们否认关于经济因素起首要作用的思想吗？难道他们承认在历史中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吗？难道他们承认我们追究其中哪个因素支配其余一切因素是徒劳无功的吗？如果真正

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喜欢到处乱套经济因素，那么我们不能不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们给库德林先生的回答是：真正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确实是不喜欢到处乱套经济因素。而且关于哪一个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本身在他们看来也是一个没有根据的问题。不过库德林先生且慢点高兴。真正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产生这个看法根本不是受了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的影响。对这些先生就关于经济因素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所提出的异议，真正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一笑置之。不仅如此，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的这些异议已经提晚了。关于哪个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提得不恰当，这从黑格尔时代起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曾经排斥了提这类问题的可能性。我们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排除了这个可能性。自从《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问世以来，特别是自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本有名的书问世以来，只有在理论方面落后的人才会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相对意义的问题上争吵。我们知道，对我们这一番话感到惊讶的不只是库德林先生一个人，所以我们要赶快加以解释。

什么是社会历史因素呢？关于这些因素的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格拉古兄弟竭力阻止罗马的富人强占公地这一毁灭罗马的过程。富人起来反对格拉古兄弟。爆发了一场斗争。斗争的双方都激烈地追逐着自己的目标。假使我想要描述这场斗争，我可能会把它描写成一场人类激情的斗争。这样，激情就成为罗马的内部历史的“因素”了。可是，无论格拉古兄弟还是他们的敌人，双方都在斗争中利用了罗马国家法提供给他们的手段。当然，我在我的叙述中将不会忽略这一点，可见，罗马国家法看来也是罗马共和国内部发展的因素。其次，反对格拉古兄弟的

人们在维护根深蒂固的不法行为方面有物质利益，支持格拉古兄弟的人们则在革除这种不法行为方面有物质利益。这种情况，我也要提到。结果我所描述的这场斗争便成了物质利益的斗争，阶级的斗争，穷人和富人的斗争。于是我这里已经有了第三个因素，这一次是最有意思的因素：著名的经济因素。各位读者，假使你们有时间，又有兴致的话，你们可以随意见论罗马内部发展的因素中哪个因素支配其他一切因素。你们在我的历史叙述中将会找到足够的资料来支持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意见。

至于我自己，只要我还扮演着单纯叙述者的角色，我就不会在因素问题上太性急。我对因素的比较意义并不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叙述者，应当做的只是尽可能准确地和生动地描述历史事件。为了这个目的，我就得在这些事件之间找出某一种哪怕只是表面的联系，并把它们按照某种透视图加以处理。如果我提到激动斗争双方的激情，或者提到当时罗马的国家制度，或者最后提到罗马当时存在的财富不平等，那么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连贯地和生动地叙述事件。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无所谓地让哲学家去解决：是激情支配经济，还是经济支配激情，还是什么东西也不支配什么东西，因为每个“因素”都遵从着“你活，也让别人活”的金科玉律。

只要我还扮演着与“故弄玄虚”的癖好格格不入的单纯叙述者的角色，一切都将会是这样。可是，假如我不局限于扮演这个角色，假如我要就我所叙述的事件进行一番议论，那么情况将会如何呢？那时我就不再仅仅满足于事件之间的表面的联系，那时我希望揭示出它们的内在原因。而我以前几乎仅仅受艺术本能驱使而明确提出的那些因素——人类的激情、国家法和经济——在我的眼里将获得新的巨大的意义。在我看来，它们正是那些所要寻找的内在原因，正是构成历史事件的原因的那些“潜在力量”。我将创

立因素论。

实际上，凡是有对社会现象发生兴趣的人从单纯地直观和描述这些现象转入研究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的地方，都一定会产生出某种变相的因素论。

此外，因素论随着社会科学中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科学的一切部门——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所考察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社会的人的活动。不过它们都是从它们各自的角度来考察。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会说，每个科学部门都“掌管”一根特殊的“弦”⁴⁶。每一根“弦”都可以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我们现在根据社会科学中现有多少单独“学科”，就几乎可以算出有多少因素。

经过以上的说明，我希望，什么是社会历史因素和关于这些因素的观念是怎么产生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

社会历史因素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关于它的观念是通过抽象化的办法产生的。由于抽象化过程，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才具有不同的范畴形式，社会的人的活动的各种现象和表现——如道德、法、经济形式等等——才在我们的心目中变成似乎可以引起和决定这种活动，构成它的最终原因的特殊力量。

一旦出现了因素论，必然会爆发一场关于应该承认哪一个因素是支配因素的争论。

(三)

“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个因素都对其他一切因素产生影响，而其本身又受其他一切因素的影响。结果出现了相互影响、直接作用和反作用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网，以致于使企图弄清楚社会发展的过程的人开始感觉头晕眼花，于是他感到非找出一个线索来引导他走出这座迷宫不可。因为痛苦的经验曾经使他知道：

相互作用的观点只能使人昏眩，所以他要寻找另一种观点，他尽力简化自己的任务。他问自己，在社会历史因素之中是否有那么一个社会历史因素是其余一切因素产生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因。如果他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他的任务实际上也就无比地简化了。我们假定，他已经确信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都决定于智力发展的进程，而智力发展的进程又决定于人类本质的属性（唯心主义的观点）。那么，他就会很容易走出相互作用的迷魂阵并创造出一种比较严整的和彻底的社会发展理论。后来，由于对事物的进一步研究，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弄错了，不能承认人的智力发展是整个社会运动的首要原因。他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也许同时会发现，他的关于智力因素支配一切其他因素的一时的认识对于他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他就不会走出相互作用的死胡同，也不会理解社会现象方面进一步。

有人试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之间划分某些等级，如果非难这种尝试，那是不公平的。当时这种尝试象因素论本身的出现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拉布里奥拉比一切其他唯物主义作家更充分地、更出色地分析了这个理论，他说得非常中肯：“历史因素是某种比真情小得多而比普通的误解大得多的东西”。因素论对于科学也曾有过它的一份贡献。“对设想的历史社会因素的专门研究，正象一切不超出事物表面运动的经验主义研究一样，完善了我们的观察工具，并使我们能在用抽象方法人为地加以孤立的现象本身中发现把它们同整个社会连接起来的联系”。现在，如果有人想恢复人类过去生活中的某一部分，他就必须通晓专门的社会科学。如果没有语言学，历史科学就不会有长足的进步。那些把罗马法看作是由理性制定的片面的罗马法学家对科学所作的贡献还小吗？

无论因素论当时是怎样合理和适用,但是今天却经不住批判。它肢解了社会的人的活动,把它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表现变成似乎能够决定社会的历史运动的特殊力量。这个理论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中起过单个物理力的理论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同样的作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导致了关于单个物理力的统一的学说的出现,导致了现代的能的学说的出现。同样,社会科学的成就也应当导致用**社会生活的综合观点**来代替因素论这一社会分析的成果。

社会生活的综合观点还不是当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特点。我们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早已发现了这个观点。黑格尔认为他的任务是要科学地解释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综合,即包括被抽象思维的人们看作是单个因素的社会的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和表现。但是,黑格尔作为“绝对唯心主义者”用世界精神的属性来解释社会的人的活动。一旦有了这些属性,也就“自在地”有了整个人类历史,历史的最后结果也就有了。黑格尔的综合观点同时也是**目的论**的观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最终把目的论从社会科学中清除掉了。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完全不是为了沿着一条预先画好的前进路线进行,也不是因为他们必须服从某种抽象的(拉布里奥拉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进化的规律。人们创造历史是为了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科学应当向他们说明,满足这些需要的各种方式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活动有什么影响。

满足社会的人的需要的方式,甚至在颇大程度上这些需要本身,都决定于人用以在某种程度上征服自然的那些工具的性质;换句话说,它们决定于人的生产力状况。生产力状况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反映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也就是反映在人们的经济关系上。形形色色的和变相的唯心主义者都认为经济关系是**人类本质**的函数;辩证唯物主义者则认为经济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的函数。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谈论社会发展

因素除了批判这些过时的虚构之外还可以有别的目的的话，那么他们首先必须告诫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者**们，他们的“支配”因素是**变幻不定**的；现代的唯物主义者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唯一符合人类本质的经济制度，而一切其他形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压迫人类本质的结果。现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就符合人类本质。反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与生产力状况发生矛盾，就立刻开始与人类本质的要求相抵触。可见，“支配”因素本身就**从属于**另一个“因素”，既然如此，它还是什么“**支配**”因素呢？

如果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显而易见，辩证唯物主义者和那些可以有理由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人们之间有一道鸿沟。卡列也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克里文柯等先生和另一些聪颖博学之士，不久之前还起劲地但并不那么顺利地反对一位不十分令人愉快的导师的那些十分令人不愉快的门徒，这些门徒属于哪一派呢？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些“门徒”完全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上。而卡列也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克里文柯等先生和另一些聪颖博学之士为什么硬要把**经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强加于他们并攻击他们夸大经济因素的作用呢？可以推断，这些聪颖博学之士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业已寿终正寝的**经济唯物主义者**的论证比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论证容易驳倒。还可以推断，这些门徒们的那些博学的敌手不大了解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这个推断甚至是比较准确的。

也许有人反对我们说，“门徒们”自己就有时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而且“**经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就是一个法国“门徒”⁴⁷首先使用的。不错。不过，无论法国门徒还是俄国门徒都从来没有把“**经济唯物主义**”这几个字同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把这几个字与之相联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只要提一下米哈伊洛夫斯基

先生认为路易·勃朗和尤·茹可夫斯基先生同我们今天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一样都是“经济唯物主义者”这一点就足够了。这简直是把观念混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四)

辩证唯物主义^①将任何的目的论从社会科学中彻底清除出去，并用社会的人的需要和当时已有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与方法来解释社会的人的活动，从而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以它的姐妹——自然科学常常向它夸耀的“严密性”。可以说，社会科学本身正在变成自然科学，象拉布里奥拉公正地指出的，“我们的自然历史科学”。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他那里生物学的领域同社会科学的领域合而为一了。拉布里奥拉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激烈反对者，认为它早就“象瘟疫一样控制着一些研究工作者和更多的律师和高谈阔论的社会学者的头脑”，并且象一种时髦习惯似的，甚至影响着政治实践家的语言。

人无疑是一种与其他动物有血缘关系的动物。人按其起源来说并不是优越的生物；他的机体的生理现象只不过是一般生理现象中的个别情况。最初，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完全服从于周围的自然环境，那时自然环境还未曾受到人的改造活动；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去适应环境。依照拉布里奥拉的意见，种族是对自然环境的这种——直接的——适应的结果，因为种族因生理特征——例如白种、黑种和黄种——而彼此不同，而并不是派生的历史社会形态，即民族。原始的社会本能和性的选择的初步萌芽也是生存竞争中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但是我们只能猜测“原始人”是什么样子。现在居住在地球上

① 拉布里奥拉采用恩格斯的用语，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

的人同从前值得信任的学者观察的人一样，距离人类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动物生活的那个时刻已经相当遥远了。例如，易洛魁族及其——摩尔根所研究和描述过的——母权制氏族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就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行程。甚至现代的澳大利亚人不仅有语言——语言可以说是社会存在的条件和工具、原因和结果，不仅熟悉火的用途，而且生活在具有一定的制度、一定的习惯和设施的社会中。澳大利亚人的部落有他们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狩猎方法；他们有某些防卫和进攻的工具，有某些贮藏食物用的器皿，有一定的装饰身体的方法；总之，澳大利亚人已经生活在一定的、实在是非常简陋的**人为环境中**，他们从孩提时起就适应了**这个环境**。这个人为的——社会的——环境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它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任何一定的部落的蒙昧或野蛮程度的尺度。

这个原始的社会形态相当于所谓的人类**史前状况**。历史生活的开始是以人为环境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的更大的支配力为前提的。已经走上历史发展道路的社会复杂的内部关系本身根本不决定于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它们是以某些劳动工具的发明，某些动物的驯化，学会提炼某些金属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为前提的。这些生产手段和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变化着，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进步、停滞或者甚至退步。但是，这些变化从来没有使人类回到纯动物的生活，即受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的生活。

“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断定和研究人为的环境、它的起源和结构、它的变化和改造。硬说这种环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继续，这只是一种十分一般的和抽象的，因而最终没有任何明确意义的思想。”

拉布里奥拉对“政治的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持否定态度，而

对某些努力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一般进化论结合起来的“可爱的一知半解者”也同样持否定态度；他曾经严正地指出，这种进化论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成纯粹形而上学的比喻。他还嘲笑那些“可爱的一知半解者”力图将唯物史观放在奥古斯特·孔德或斯宾塞的哲学的庇护之下是帮倒忙的行为：“这等于把我们最坚决的敌人拉来给我们作盟友”。

显然，关于一知半解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恩利科·费里教授。他是一本非常肤浅的书《斯宾塞、达尔文与马克思》的作者，该书的法文版书名是《社会主义和实证科学》。

（五）

总之，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当然，这些需要最初是由自然造成的；但是，后来它们由于人为环境的属性而在质的和量的方面都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受人们支配的生产力决定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首先，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关系，即**经济关系**。经济关系自然而然地造成**法**所反映的一定的利益。拉布里奥拉说：“每一种法律规范都维护着一定的利益”。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划分为若干阶级，各个阶级的利益不但不相同，而且在许多方面——同时是重要的方面——是完全对立的。利益的这种对立造成社会阶级之间敌对性的冲突，阶级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氏族组织**为**国家组织**所代替。国家的任务是保护统治者的利益。最后，在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习惯道德**，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人们起指导作用的道德。

因此，任何民族的法、国家制度和道德**直接**决定于它们所特有的经济关系。而这些经济关系也决定着——不过是**间接地**——思维和想象的一切创造物：艺术、科学等等。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善于从经济转向**社会心理**；不仔细研究和了解社会心理，就不可能对思想史作唯物主义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有某种社会灵魂或某种集体的民族“精神”在按照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发展着并表现在社会生活之中。拉布里奥拉说：“这是最地道的神秘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只存在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一定社会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情感和思想。这种情感和思想是社会关系的结果。拉布里奥拉坚信：不是人们的意识形式决定他们的社会存在形式，而是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形式决定他们的意识形式。但是，人们的意识形式一经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科学不能仅限于从经济上解剖社会；它要着眼于**直接或间接**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整个的现象总和**，包括想象的作品在内。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是有赖于社会经济而产生的；不过，说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为一定的意识状况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也同样是正确的。由此，社会心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在法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已经必须估计到它，那么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的历史中没有它也是寸步难行的。

当我们说某一个作品完全忠实于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时，这就是说，它完全符合当时在影响社会生活的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只要社会关系不改变，社会心理也不会改变。人们习惯于一定的信仰、一定的观念、一定的思想方式、满足一定的美的需要的一定的方法。但是，如果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某种本质上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发生某种本质上的变化，那么这些社会阶级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而“时代精神”和“民族性”也就随之而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表现就是新的宗教信仰或新的哲学概念、新的艺术流派或新的美的要求的出现。

按照拉布里奥拉的意见，还必须考虑到那些世代相承和只是靠传说而保存下来的观念和思潮的残余常常在意识形态中起很大的作用。此外，意识形态中还有自然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环境非常强烈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从直接的变为间接的。但是这种影响并不会消失。任何民族的气质中都保留有自然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某些特点，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改变这些特点，但不能完全消灭它们。民族气质的这些特点形成所谓种族。种族对于某些意识形态例如艺术的历史无疑是有影响的；这个情况使得对这个历史作科学的解释这一本来并非轻松的任务更加困难了。

(六)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和准确地——我们希望能这样——叙述了拉布里奥拉的关于社会现象依赖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大部分是我们完全同意的。不过，有些地方，他的观点不免引起我们的一些疑问。我们愿意就这些疑问略作评论。

我们首先指出如下的一点：按照拉布里奥拉的看法，国家是一个社会阶级统治另一个或另一些社会阶级的组织。这话不错。但是它未必能表达出全部真理。在中国或古埃及，没有控制大河的水流、洪水和组织灌溉的非常复杂而庞大的工程，文明生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些国家里，国家的出现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用社会生产过程的需要的直接影响来说明的。不平等在这些国家的史前时代无疑早已存在，而且无论在那些加入国家的部落——而且在人种起源方面常常彼此不相同的部落——内部，还是在这些部落之间，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但是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历

史中所遇到的统治阶级，正是由于有社会生产过程的需要所造成的国家机构，才占有一定程度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埃及祭司等级占有统治权是仰仗他们的粗浅的科学知识在埃及全部农业体系中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①在西方——希腊当然应当包括在内——我们没有看出社会生产过程的直接需要对于国家的出现有什么影响，那里的社会生产过程丝毫不要求有庞大的社会组织。而且在那里国家的产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应该归之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当然，这个事实并不妨碍国家同时还是享有特权的少数统治或多或少受奴役的多数的组织。^②可是为了避免对国家的历史作用发生不正确的片面的认识，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忽略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拉布里奥拉对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按照他的意见，这个发展由于种族特点的作用和自然环境对人的一般影响而复杂化。很可惜，我们的作者没有想到需要用实例来证明和说明这个意见；否则我们会更容易理解它。无论如何，这个意见用现在的这种形式表达，无疑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

当然，美洲的红种人部落和史前时期住在希腊群岛或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部落不同属于一个种族。无疑问，在这些地区中的每一个地区原始人经受着自然环境的很不相同的影响。人们本来期望这些不同的影响会反映在上述地区原始居民的粗糙的艺术作

① 一位迦勒底国王谈到自己时说：“我研究江河的秘密是为了人民的福利……我把河水引入沙漠；我用它灌满了干涸的沟渠……我灌溉了荒原，我使荒原变得肥沃而富饶，我把它们变成安乐之乡”。这个话虽然是吹嘘自己，但确切地反映了东方国家在组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② 同样，这个事实也不妨碍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结果。在一些机构代替另一些机构的时期暴力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暴力丝毫不能解释这种代替的可能性本身和它的社会结果。

品上面。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在地球的各大洲，不论它们之间情况千差万别，艺术发展中的同一阶段还是和原始人的发展中的同一阶段相应的。我们知道有石器时代的艺术和铁器时代的艺术；可是我们不知道有白种人、黄种人等不同人种的艺术。生产力状况的细节甚至也得到了反映。我们最初例如在陶器上只见到直线和折线：四方形、十字纹、锯齿纹等。这种装饰是原始的艺术从更原始的手工艺——编织那里借鉴来的。在铜器时代已经能够加工可以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几何形状的金属，随之就出现了曲线装饰品；最后，随着动物的驯化，又出现了动物首先是马的图形。^①

诚然，在人的画像中必然会反映出种族特征对原始艺术家所特有的“美的标准”的影响。大家知道，每个种族，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都认为自己是最美的，并且恰恰把自己不同于其他种族的那些特征评价很高。^②可是，第一，种族美学的这些特点——既然它们是持久的——不能以自己的影响改变艺术发展的进程；其次，这些特点仅仅暂时，即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持久的。当一个部落被迫承认另一个更发达的部落比自己优越的时候，它的种族自满心理就会消失，反而去模仿那些过去认为是可笑，甚至可耻、可憎的异族风格。在这一点上，野蛮人的表现和文明社会中乡下人的表现是一样的。这些乡下人起先讥笑城市居民的习俗和装束，到后来，由于城市开始并加强对乡村的统治，就千方百计地照着他们的样子学。

在谈到历史民族时，我们要首先指出，对于它们根本不能够，也不应当使用**种族**这个词。我们不知道有哪个历史民族可以称为纯种族的民族；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是不同的人种成分经过漫长时期的和强烈的相互混合和融合而形成的。

^① 关于这一切，见威廉·卢布克的《艺术史》前言（见俄译本）。

^② 关于这一点，见达尔文的《人类起源》，1883年伦敦版第582—585页。

指出这一点之后，现在请允许我们来判定“种族”对于任何民族的思想史的影响！

乍看起来，关于自然环境影响民族气质，而通过民族气质影响民族的智力和美学发展史的思想，似乎最简单和最正确不过了。但是拉布里奥拉只要回想一下他本国的历史，就会深信这个思想是错误的。现代意大利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就是古罗马人曾经生活过的那个自然环境，但是我们现代的梅涅里克的纳贡者和迦太基的严酷的征服者在气质上是多么不同！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拿意大利人的气质来解释意大利的艺术史，那么我们马上就会碰到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在亚平宁半岛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气质本身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七)

《俄国文学的果戈里时期概述》的作者⁴⁸在他给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所作的一条注释中说：

“我们不敢说种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达到如此精确的分析，以致于我们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武断地说，这里绝对没有这个成分。因此，知道这个钢笔尖里可能含有一丁点白金。这一点绝对不能否认。有一点是能够知道的：根据化学分析，在这个笔尖的成分中有这么多无疑是非白金的含量，以致于其中的白金含量完全微乎其微；如果确有白金含量，从实用的观点来说，可以不去管它…… 如果从实际的效用来说，你尽可以把这个笔尖当作一般的钢笔尖看待。同样，你们在实际问题上也不必去注意人们的种族，只消把他们当作人看待就行了…… 民族的种族可能对于一个民族现在处于这种而不是另一种状况有某种影响；这一点绝对不能否认，历史分析现在还没有达到数学那样的绝对的准确性；经过历史分析，正象经过化学分析一

样，还留下小量的、非常小量的残余，而这个残余需要科学现状还达不到的更精巧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个残余是非常小的。在每一个民族的现状的形成当中，不依赖于天然部落素质的各种情况的影响占极大的部分，所以即使有不同于一般人类本性的特殊素质存在，它们发挥作用的余地也是非常小的，简直是微乎其微。”

当我们看了拉布里奥拉关于种族影响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看法时，我们记起了上述这段话。《俄国文学的果戈里时期概述》的作者主要是从实践的观点来探讨种族的作用，但是他所说的一席话，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们也应当常常加以注意。假如我们最终放弃了把某个民族的精神历史中我们还不理解的一切东西统统推到种族问题上这种坏习惯，那么社会科学是会大有进展的。部落的属性也许对于这种历史有过某种影响。但是这个假定的影响当初想必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为了研究上的方便，最好承认它等于零，并把在某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所见到的特点看成这个发展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把它看成种族影响的结果。当然，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况，我们无法说出是什么条件造成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特点。但是，今天不服从科学的研究手段的东西，明天就会服从。推说是种族属性是不妥当的，因为种族属性会使研究工作恰恰在本来应当开始研究的地方停顿下来。为什么法国诗歌的历史和德国诗歌的历史不一样呢？原因非常简单：法国民族的气质使它出不了莱辛、席勒、或者歌德。好啦，多亏这么一番解释；现在我们一切都明白了。

当然，拉布里奥拉可能会说，他根本不能同意这类什么也没有解释的解释，这样说是对的。总的看来，他完全明白这类解释的无用性，而且清楚地知道，从何处下手来解决类似我们举例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承认民族的精神发展因其种族属性而复杂化，他这样说就有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危险，并且表明他准备——哪怕只在细

枝末节上——向某些有害于社会科学的陈旧思想方式让步。我们的评论就是针对这种让步而发的。

我们把我们所驳斥的关于种族在思想史中发生作用的想法说成是陈旧的看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只不过是上一个世纪非常流行的那个用人类本质的属性说明整个历史过程的学说的变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同这个学说是完全不相容的。按照新观点，社会的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类本质的一般属性不能解释历史。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热烈而坚定的拥护者拉布里奥拉在一定的程度上——哪怕程度很浅——也承认了旧观点的正确性。难怪德国人说：谁若说了一，就必定得说二。拉布里奥拉既然在一种场合承认了旧观点的正确性，那么他在另一个场合也得承认旧观点的正确性。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势必损坏他的世界观的严整性，这还用得着说吗？

(八)

任何一个社会的组织都决定于生产力状况。生产力状况改变了，社会组织迟早也一定要发生变化。因此，凡在社会生产力正在发展的地方，社会组织总是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之中。拉布里奥拉非常正确地指出：正是这种不稳定性，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各阶级的斗争使人避免了智力的停滞。他重复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⁴⁹的思想说，对抗是进步的主要原因。可是他马上又作了保留。按照他的看法，设想人们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地位并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地位向他提出的社会任务，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说：“这种想法等于设想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某种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请求读者对于这个保留予以密切的注意。拉布里奥拉以下述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从过去到现在，法律形式、政治行动和建立某种社会制度的尝试有时是成功的，而有时是错误的，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与具体现实是不协调和不适应的。历史充满着错误；这就是说，如果历史上的一切在那些不得不克服困难或寻找解决在其道路上出现的问题的办法等等的人的一定的理智发展水平上是必要的，如果历史上的一切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么，从大发抽象议论的乐观主义者所赋予合理一词的意义上来看，并不是一切都是合理的。决定社会变化的原因即发生变化的经济条件，最后迫使人们去寻找，有时是通过曲折的道路去寻找相应的法律形式，适当的政治制度和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社会适应手段。但是，不应当认为：能思想的动物的本能的智慧，直接地曾经表现为或正在表现为对一切情况的充分的和清楚的理解；我们只要简单地以演绎的方法从经济状况中引出其余的一切就行了。无知——这本身也是有原因的——是历史朝着不同道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无知，还应当有远没有被战胜的粗暴的动物的本能，以及情欲、不公正和各种形式的道德败坏；所有这些东西曾经是和继续是按照人统治人是必然的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必然的产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扯谎、伪善、无耻和下流是同这种统治分不开的。我们不会变成空想主义者，只是由于我们是批判的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所以我们能够预见并真正预见到将来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它脱胎于现代社会，而且脱胎于它的对抗性，由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最后将摆脱阶级矛盾而达到联合。这种联合本身的功能就是调节社会生产，把生命从迄今在历史上以各种复杂的意外事件和事故的形式出现的盲目偶然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这是未来的事情，而不是过去和现在的事情。”

整个这段话含有许多正确成分。但是，真理本身和谬误莫名其妙地交织在一起，在这里以不能完全成立的怪论的形式出现。

拉布里奥拉说，人们根本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明确地意识到由社会地位所引出的社会任务，这话无疑是对的。但是，当他根据这一点而说无知或迷信是许多社会生活形式和许多习俗的历史原因时，他就不知不觉地回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的观点那里去了。指出无知是“历史朝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前，应当弄清楚这个词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用在这里。如果认为这个词是不言自明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这个词绝不是象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请看一看十八世纪的法国吧。它的第三等级的所有的思想代表都热切地追求自由和平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废除许多陈旧的社会设施。可是，废除这些设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很难说是自由和平等的王国。因此可以说，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的崇高目的并没有达到。同样也可以说，哲学家不能够指出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手段；所以，可以指责他们无知，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也这样做过。拉布里奥拉本人对当时法国实际经济趋向和法国思想家们的理想之间的矛盾感到诧异。他感叹说：“这是多么独特的景况，多么独特的对照！”但是这里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法国启蒙运动者们的“无知”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他们对于达到普遍幸福的手段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看法不一样呢？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根本就谈不到这些手段——人类的历史运动，说得更正确一点，即**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把它们创造出来**。请读一下马布利的《向哲学家兼经济学家提出的疑问》，读一下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你们就会发现，由于这两位作者在对人类幸福的条件的看法上与绝大多数启蒙运动者有分歧，由于他们梦想废除私有制，所以，第一，他们同自己时代的最重要的、最迫切的、全民的需要处于明显的惊人的矛盾之中，其次，他们模糊地意识到了要废除私有制，但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自己

的梦想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再问一次：启蒙运动者们的无知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时代的社会需要并正确地指出了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废除旧的特权等等），但过分夸大了这些方法的意义，即认为它们是达到普遍幸福的途径呢？这还不是很不合情理的无知，而从实践的观点看来，甚至必须承认它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启蒙运动者们愈是相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具有普遍的意义，他们必定愈是起劲地去争取改革。

启蒙运动者们的**勿庸怀疑的无知**表现在他们找不出一条线索把他们的观点和意图同当时法国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甚至没有料想到有这样一条线索存在。他们把自己看成**绝对真理**的代言人。我们现在知道，绝对真理是没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取决于地点和时间；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无知”时应当非常谨慎。不同历史时期的无知既然是表现在它们所特有的社会运动、意图和理想方面，所以也是**相对的**。

（九）

法律规范是怎么产生的呢？可以说，任何法律规范都是某个旧法律规范或某个旧习俗的更替或改变。旧规范和旧习俗为什么会被更替呢？因为它们不再适应新的“条件”，即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形成的新的实际关系。原始共产主义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消亡的。但是生产力只能逐渐地发展。因此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新的实际关系也只能逐渐地发展。因此旧规范或旧习俗的束缚，从而给人们的新的实际（经济）关系制定相应法律条文的需要，也只能逐渐地发展。能思想的动物的本能的智慧通常总是追随着这些实际的变化。如果旧的法律规范阻碍社会里的某一部分人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那么社会

的这部分人必然非常容易地意识到它们的束缚。意识到这一点所需要的智慧，比意识到穿了小鞋或携带很沉重的武器之不舒服所需要的智慧多不了多少。当然，从意识到某种法律规范的束缚，到**有意识地追求废除它**，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起初，人们只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设法回避它。现在我们来回想一下，我国农民大家庭里因受新生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出现了家庭各个成员收入来源不相等的情形。通常的家法这时便成为对挣钱比别人多的幸运者的束缚。然而，这些幸运者要下决心反抗旧习俗并不是那么容易和那么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只能耍小计谋，向家长隐瞒他们所赚的一部分钱。可是新的经济制度逐渐巩固，旧的家庭生活愈来愈动摇；那些与废除旧家庭有利害关系的家庭成员的头抬得愈来愈高；分家的事情愈来愈多，最后旧习俗归于消亡，而为新的情况、新的**实际关系**、新的**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新的习俗所代替。

人对自己的地位的意识的发展，通常多多少少总是落后于那些会改变这种地位的新的实际关系的发展。但是意识总是追随着实际关系。哪个地方人们对废除旧制度和建立新法制的追求还不自觉，那个地方就是新法制还没有完全被**社会经济准备好**。换句话说，在历史中，意识的不明确——“不成熟的思想的失误”、“无知”——常常只是表示应当意识到的对象即新的、正在产生的关系欠发展。总之，这种无知——对于尚不存在的东西、尚处于发生过程中的东西不认识或不理解——显然只是**相对的无知**。

还有另外一种无知——对自然的无知。这种无知可以说是**绝对的无知**。衡量它的是**自然对人的支配**。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支配的增强，所以生产力的增长显然表示绝对无知的减弱。人们不了解的和因而不受人们支配的自然现象引起各种各样的迷信。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迷信观念同人们的道德和法律观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时人们给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

涂上一层特殊的色彩。^① 在斗争过程中——这个斗争是由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新的实际关系的发展所引起的——，宗教的观点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革新派和守旧派都祈求神的保佑，将各种制度都置于神的庇护之下，甚至把这些制度说成是神意的表现。大家知道，曾经被希腊人看作是母权制拥护者的攸曼尼德士为保卫母权所做的事情，和米内华为了她仿佛喜爱的父权的胜利所做的事情同样少。人们祈求神和偶像的帮助是白白浪费劳动和时间，但是使人信仰攸曼尼德士的那种无知并没有阻碍当时的希腊守旧派了解到旧法制（更准确地说，旧习惯法）更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同样，使人把希望寄托在米内华身上的那种迷信并没有阻碍革新派意识到旧生活方式的不适当。

婆罗洲岛上的达雅克人不曾知道用楔子劈木柴。当欧洲人把楔子带到那里时，土著当局严禁使用，^② 这显然是他们的无知的一个证明：拒绝使用能够减轻劳动的工具，岂不是愚蠢之至吗？可是，你们想一想——也许就会说，这是情有可原的。禁止使用欧洲的劳动工具可能是反对开始破坏旧的土著秩序的稳固性的欧洲影响的表现之一。土著当局模糊地意识到，如果引入欧洲的习俗，土著秩序就会彻底崩溃。不知为什么楔子比其他欧洲工具使他们更强

① 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在他的《高加索的法律和习俗》一书中说：“对北萧胡人的宗教信仰和迷信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正教这个正式旗下，这个民族至今还停留在泰罗很恰当地称之为万物有灵论的那个发展阶段。大家知道，这个阶段通常伴随着无论社会道德还是法律对宗教的绝对服从”（第2卷第82页）。但是问题在于，泰罗认为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对道德、法律没有任何影响。在这个发展阶段，“道德和法之间不存在相互关系或这种关系还处于萌芽中”。“粗糙的万物有灵论几乎完全没有在文明人的心目中构成一切实际宗教的本质的道德因素……道德法有它自己的基础”等等。（《原始文化》1876年巴黎版第2卷第464—465页。）因此正确的说法将是：宗教迷信只有在一定的相当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才会同道德和法律观念交织在一起。很遗憾，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② 见爱·伯·泰罗《原始文化》，1876年巴黎版第1卷第82页。

烈地意识到欧洲影响的破坏性。于是他们严禁使用楔子。为什么正好是楔子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为危险的改革的象征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作出满意的回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楔子的概念在土人的心目中和威胁他们的旧生活方式的危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有把握地说，土人担心他们的旧秩序的稳固，是完全有道理的。欧洲影响的确正在迅速地和严重地改变——如果不是摧毁——受到这种影响的蒙昧人和野蛮人的习俗。

泰罗说，达雅克人虽然公开谴责使用楔子，但还是背着人偷偷使用。这样，在你们看来，除了无知之外，又加上了“虚伪”。而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这显然是由于认识到劈木柴的新方法的优越性，而又害怕舆论或当局的追究。这样一来，能思想的动物的本能的智慧就批判了从它那里发生的办法本身。它的这种批判是对的，因为禁止使用欧洲工具决不等于能消除危险的欧洲影响。

用拉布里奥拉的话，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达雅克人是采用了与他们的情况不相符合的、不相称的办法。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给拉布里奥拉的这个论点补充上一句话：人们常常想出一些与情况不相符合的、不相称的办法。但是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努力去发现，在人们的这种错误同人们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性质或程度之间是否有某种依赖关系存在。这样的依赖关系无疑是存在的。拉布里奥拉说，无知本身也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我们说，只要社会科学能够变成一门严格的科学，无知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得到解释。如果“无知”可以用社会原因来解释，那就用不着拿无知作论据，用不着说它是对历史为什么朝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这一问题的解答了。解答不在无知，而在于那些产生无知和赋予它以这种而不是另一种形式、这种而不是另一种性质的社会原因。你们有什么必要用那种简单的、什么都解释不了的关于无知的谈论来限制自己

的研究呢？在有了科学历史观的情况下，拿无知作为论据，只能证明研究者自己无知。

(十)

任何的实在法规范都保护一定的利益。利益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它们是不是人类意志和人类意识的产物呢？不是，它们是人们的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利益一经产生，便无论如何会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为了保护一定的利益，必须意识到它。因此，任何的实在法体系都可以，而且应该看作是意识的产物。^①法所保护的利益的存在不是人们的意识造成的，因此，法的内容也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的；但是一定时代里的社会意识状况（社会心理）决定着一定的利益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将采取什么形式。我们不考虑社会意识状况，就根本无法弄清法的历史。

在法的历史中，始终应当细心地把形式和内容分开。就形式方面而论，法和一切其他意识形态一样，要受一切其他的意识形态，至少是其中的某一部分——如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等——的影响。光是这种情况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时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使人难以发现人们的法的观念同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之间存在的依赖关系。不过这还没有什么了不起。^②真正的不幸，

① “法象所谓的物理力、自然力一样，不是存在于人的行动之外的东西……相反地，它是人们为自己建立的制度。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是否服从因果律或者自由地、任意地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反正一样。不论怎样，法根据因果律和自由律反正不能绕过，相反，必定通过人的活动，通过人本身才能创立”（尼·米·科尔库诺夫《法律总论讲义》1894年圣彼得堡第279页）。这句话虽然很不通顺，但非常正确。不过，科尔库诺夫先生忘记补充说，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人们为自己创造的”，而决定于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② 虽然这一点甚至对象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高加索的法律和习俗》这样的著作也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柯瓦列夫斯基在这本书里常常把法看作是宗教观点的产物。正确的研究途径则不同：柯瓦列夫斯基应当把高加索各民族的宗

在于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每种一定的意识形态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程度上极不相同。例如，古埃及法、罗马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宗教的支配；在现代历史上，法是在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发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并请大家注意，这是从形式方面说的）。哲学为了排除宗教对法的影响并代之以自己的影响，不得不经受剧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只不过是第三等级同僧侣之间的社会斗争在观念中的反映；然而这个斗争大大地妨碍了制定对法律制度的起源的正确看法，因为由于这个斗争，法律制度看起来似乎是抽象观念斗争的一个明显而无疑的产物。当然，总的来说，这种观念的斗争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实际关系，拉布里奥拉是很清楚的。可是当涉及细节问题时，他就在困难面前放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武器，而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认为归结于无知或传统的力量是可行的。另外，他还说“象征”是许多习俗的最后原因。

象征诚然是某些意识形态的历史中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但是，说它是习俗的最后原因是不恰当的。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在高加索的北萧胡人部落中，女人在兄弟死去的时候，要剪下她的发辫，但是在她丈夫死去的时候却不这样做。剪发辫是一个象征行为，用以代替在死者墓前做牺牲的更古老的习俗。那么，为什么女人要在兄弟墓前，而不在丈夫墓前举行这个象征行为呢？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话说，这个特殊风俗“不能不认为是远古的一个遗迹。在远古时氏族集团——它是用起源于女始祖的真实的或假想的事实联合起来的——的首领是最年长的母系亲属，最近的亲属”。^⑤ 由此可以看出，象征行为只有在我们了解了它所象征

教信仰和法律制度看成是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为了说明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应当竭力去寻找这种影响的唯一原因。柯瓦列夫斯基先生似乎本来更应当倾向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因为他本人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断定法律规范对生产方式的因果关系。

^⑤ 《高加索的法律和习俗》第2卷第75页。

的关系的意义和起源时才可以理解。这些关系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能在象征行为里寻找，虽然象征行为有时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在兄弟的墓前剪下发辫这个象征性习俗的起源，可以用家庭历史来说明，而家庭历史的说明则应当到经济发展史中去寻找。

在我们感兴趣的这个实例中，在兄弟的墓前剪下发辫的仪式，还保留了它由以产生的那种血缘关系的形式。这就是拉布里奥拉在他的书中指出的传统的影响的例子。但是传统只能保存已经存在的东西。它不仅不能解释一定仪式或一般地说来一定形式的起源，甚至也不能说明它的保持。传统力量是一种惰性力量。在意识形态的历史中，人们常常不得不向自己提出问题：一定的仪式或习俗，在不仅那些产生它的关系已经消失，而且由同一些关系所产生的其他同源的习俗和仪式也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为什么能保留下来呢？这样提问题也等于问：新的关系的破坏作用为什么清除了别的仪式或习俗而偏偏放过了这个仪式或习俗呢？用传统力量来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以一个肯定的方式重复这个问题而已。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应当求助于**社会心理学**。

当人们进入新的相互关系时，旧的习俗便消失，旧的仪式便崩溃。社会利益的斗争表现为新旧习俗和仪式之间的斗争。任何一种象征性的习俗或仪式，**就其本身而言**，既不能在积极的意义上，也不能在消极的意义上影响新的发展。如果说守旧派极力维护旧习俗，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关于对他们有利的、宝贵的和习惯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同关于这些旧习俗的观念牢牢地联合（结合）在一起。如果说革新派憎恶和嘲笑这些旧习俗，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关于这些习俗的观念同关于那些束缚他们、对他们不利的、为他们所讨厌的社会关系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因此，整个关键在于**观念的结合**。当我们发现，某种仪式不仅在产生它的

那些关系消失之后，而且在由同一些关系产生的与它同源的仪式消失之后，还保留下来，我们便应当作出结论：在革新派的心目中关于这个仪式的观念同关于可恶的旧习俗的观念的联系不如同关于其他习俗的观念联系得那么紧密。为什么没有那么紧密呢？这样的问题，有时是容易回答的，有时由于缺少必要的心理学资料而根本无法回答。但是，即使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知识状况下是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仍须记住，问题并不在**传统力量**，而在于社会中人们的一定的实际关系所产生的观念的一定的结合。

在社会力量的一定的联合的出现、变化和崩溃的影响下发生的观念的结合的发生、变化和崩溃，在颇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拉布里奥拉对问题的这一面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哲学的看法上。

（十一）

按照拉布里奥拉的看法，哲学在它的历史发展中，一部分同神学相融合，一部分则是人类思想在它同我们的经验范围内的对象的关系上的发展。既然哲学和神学是不同的，哲学研究的问题就和科学研究——本来意义上的所谓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或者力图赶在科学的前面提供自己揣想的解答，或者只是对科学已经发现的解答加以归纳和做进一步的逻辑加工。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不过这不完全正确。举新哲学为例。笛卡儿和培根都认为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加自然科学知识，以加强人对自然的支配力。因此，在他们那个时代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正是那些成为自然科学的对象的问题。所以人们可以认为，哲学所提供的解答决定于自然科学的状况。但是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不能向我们解释笛卡儿对某些哲学

问题比如灵魂问题等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倒是从当时法国的社会状况那里得到清楚的解释。笛卡儿把信仰领域同理性领域严格地区别开来。他的哲学和天主教并不冲突；相反地，他还努力用新的看法来论证天主教的某些教条。在这一方面，他的哲学很好地表现了当时法国人的情绪。经过十六世纪的长期流血动乱，在法国人们普遍要求和平和秩序。这种要求在政治领域内表现为对专制君主制的同情，在思想领域内表现为一定的宗教的忍让和渴望避免那些可能使人想起不久前的内战的有争论的问题。宗教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为了不涉及这些问题，必须把信仰领域同理性领域加以区别。我们已经说过，这一工作笛卡儿已经做过了。但是，光作这样的区别还是不够的。为了社会和平，哲学必须郑重地承认宗教教条的正确性。它通过笛卡儿也做了这一工作。正是因此，这位思想家的至少有四分之三属于唯物主义的体系得到许多宗教人士的同情。

从笛卡儿哲学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但是从它那里同样可以引出唯心主义结论。如果说法国人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原因，即十八世纪法国第三等级对僧侣持否定态度。如果说笛卡儿哲学是从社会和平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那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预报了新的社会动荡。

由此就可以看出，法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不仅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解释，而且还可以用正在发展的社会关系对哲学的直接影响来解释。当我们从另外的方面仔细研究法国哲学史时，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明显。

我们已经知道，笛卡儿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人对自然的支配力。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则认为它的首要责任是用某些新的、可以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关系的新观念来代替某些旧观念。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法国唯物主义者几乎都没有提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十八世纪法国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陈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古老的社会制度的非常严重的束缚。废除这些制度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当时法国社会运动的整个意义，就在于废除这些制度。这种废除的必要性在哲学中表现为反对那些在旧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陈旧抽象观念。

在笛卡儿的时代，这些关系本身还远没有陈旧；它们，以及在它们的基础上生长的其他社会设施，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时根本没有人想过要废止它们。正是因此，哲学直接向自己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实践任务。

我们说出这一点是要反驳拉布里奥拉。但是，我们的反驳也许是多余的，也许他只是表达得不很准确，而实际上意思和我们一样吧！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将非常高兴；人人都会为自己的观点得到智者的赞同而感到欣慰。

如果他的意思和我们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要遗憾地再说一遍，这位智者错了。我们这样说可能会给我们的主观主义者老先生们提供口实来再一次嘲弄我们，说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中间难以分辨“真的”和“假的”。但是我们可以回答主观主义者老先生们说，他们“是在嘲弄自己”。任何人，只要很好地掌握了哲学体系的意义，都能够很容易地分辨这个哲学体系的真假信奉者。假如主观主义者老先生们花力气研究一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自己就会知道谁是真“门徒”，谁是徒有其伟大名字的冒充者。既然他们过去和将来都不花这个气力，那么他们必然始终只能糊里糊涂。这是一切掉在行进中的进步大军后面的落后分子的共同命运。顺便谈一下进步问题。读者们，你们还记得吧，有个时期“形而上学者”已经背时，人们“根据路易斯”和在某种程度上根据斯巴索维奇

的《刑法教程》研究起哲学来了，并且为了“进步”读者的方便，想出了一些非常简单的，甚至黄口小儿都明白的特别“公式”。这是多么光辉的时期啊！可是它已经过去了，已经烟消云散了。“形而上学”又在开始吸引俄国人的头脑，“路易斯”没有人使用了，臭名远扬的进步公式被所有人遗忘了。现在就是在已经成为“尊贵者”和“年高望重者”的主观主义社会学家们自己那里，也很少提出这些公式。比如说，正是在显然迫切需要这些公式的时候，即我们这里有人辩论我们是否会从资本主义道路转向空想主义道路的时候，也没有人提起它们，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空想主义者躲藏在那个鼓吹杜撰的“人民生产”，而同时又冒充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徒的人的背后。于是，这种诡辩化了的辩证唯物主义便成为空想主义者手中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武器。因此，讨论一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们在“进步”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有益的。诚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报刊已经讨论了多次。但是，第一，现代唯物主义的进步观还没有为许多人所了解，其次，拉布里奥拉的书中虽然通过一些极其恰当的例子作了说明，通过一些极其正确的观点作了解释，但可惜解释得还不系统和不详尽。拉布里奥拉的看法是应当加以补充的。我们希望在比较空闲的时候来做这件事，而现在该停笔了。

但是在搁笔之前，我们再一次请求读者们记住：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所反驳——这种反驳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的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同现代唯物史观很少有共同之处。从因素论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件沉重的行李，由各种“力量”——道德、法、经济等等——各自沿着历史的道路抬着。而从现代唯物史观来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历史的“因素”是纯粹拍象的东西，等到它们周围的云雾一消散，便真相大白，原来人们根本没有创造若干互不相同的历史——法的历史、道德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等，

而是仅仅创造了一部由每个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历史。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历史在人的头脑中的各式各样的反映而已。

（本文采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中文版）

注 释

- 1 拉布里奥拉使用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经济唯物主义”、“经济社会学”等用语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唯物史观。——第3页。
- 2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有教养的”人士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是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人。他们否定阶级斗争，鼓吹用“爱”解放人类。——第3页。
- 3 “古版书”原文来自拉丁文 *incunabula* (“幼年”，“初步”)，指欧洲十五世纪以前最初印刷的书籍。拉布里奥拉认为《共产党宣言》是简要叙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本书。——第5页。
- 4 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是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国际的、革命无产者的组织，是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们受同盟的委托起草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第8页。
- 5 正义者同盟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的秘密革命组织。它1836年成立于巴黎，前身是1834年在巴黎成立的流亡者同盟。它的领导人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埃·鲍威尔等人。——第9页。
- 6 平等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它企图通过平分私有财产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第9页。
- 7 宪章运动是英国第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开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因提出“人民宪章”而得名。其左翼领袖乔·哈尼和厄·琼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9页。
- 8 让·梅叶(1664—1729)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当过牧师。他死后才发现他的告教徒书——《遗书》(1664年问世)。他在这本书中愤怒地揭发了僧侣和贵族的横行不法，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并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第14页。
- 9 《新莱茵报。民主派的机关报》是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性日报。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发行，编辑是马克

- 34 即现在的澳大利亚。——第 72 页。
- 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1—472 页。——第 77 页。
- 36 阿西涅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 1789 年至 1796 年使用的纸币。——第 100 页。
- 37 牧月起义是巴黎民众 1795 年牧月 1—4 日(5 月 20—23 日)反对热月国民公会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国民公会的大厦,颁布恢复 1793 年雅各宾宪法。5 月 23 日被镇压。——第 101 页。
- 38 指 1789 年至 1794 年的巴黎公社。——第 101 页。
- 39 死手权是中世纪的封建主在农奴死后接收其财产的权利。由于农奴所占用的土地和财产在他死后实际上是留在他的继承人手中,所以继承人应以实物或现金向封建主缴纳一笔极沉重的贡赋,即所谓死手。——第 101 页。
- 40 野蛮人法典是五世纪至九世纪编成的,是日耳曼部落(法兰克人、弗里茨人)的习惯法的记录,是研究西欧从原始公社向封建制度过渡时期各个阶段的重要史料。——第 114 页。
- 41 教会法是基督教教会法规的汇编,它规定了教会和教会机构的内部组织、教会同国家的相互关系和教徒的某些生活问题。它最初是在十二世纪编纂的。——第 114 页。
- 42 指意大利的自然科学院。它在 1657 年至 1667 年的十年期间是意大利第一批科学中心之一。——第 127 页。
- 43 弗·赫尔瓦尔德(1842—1892)是德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在四卷本的《文化历史》一书中支持进化论,并在社会学上接近认为社会发展类似生物体的发展的有机学派。——第 135 页。
- 44 指 1895 年至 1896 年的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意大利军队 1896 年 3 月 1 日在阿杜阿战役中的失败。——第 145 页。
- 45 这是为了逃避书报检查而在合法书刊上使用的隐语。导师指马克思,俄国门徒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第 155 页。
- 46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 1894 年第 1 期《俄国财富》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文艺与生活》,文中使用了“经济弦”这一术语(见《文集》1909 年圣彼得堡版第 7 卷第 750 页)。——第 159 页。
- 47 指保尔·拉法格。他曾经把自己的一本小册子称之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第 162 页。
- 48 《俄国文学的果戈里时期概述》一书的作者是俄国民主义先驱之一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下面一段话引自车尔尼雪夫

斯基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49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25页)。——第170页。

49 指卡尔·马克思。——第172页。

斯基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49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25页)。——第170页。

49 指卡尔·马克思。——第172页。

斯基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49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25页)。——第170页。

49 指卡尔·马克思。——第172页。

斯基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49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25页)。——第170页。

49 指卡尔·马克思。——第172页。

斯基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49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25页)。——第170页。

49 指卡尔·马克思。——第172页。